

夏踏

公共社會學與新世代參與

| | | | | | |
|-----|-----|-----|-----|-----|-----|
| 王若帆 | 江欣樺 | 李少彤 | 李學明 | 何友倫 | 吳璠 |
| 郭申睿 | 高洁茜 | 許菡芸 | 陳其農 | 陳岱嶺 | 陳薇仲 |
| 黃彥瑄 | 黃贊文 | 張詠瑛 | 詹智涵 | 劉承易 | 劉貴全 |
| 劉家甫 | 蔡曉林 | 歐乙平 | 盧意婷 | 鍾予晴 | 戴佑勳 |
| | | 謝佳榮 | 蕭玉欣 | | |

2015年2月

夏踏：公共社會學與新世代參與

作者 王若帆 江欣樺 李少彰 李學明 何友倫 吳 璠 郭申睿
高洁茜 許菡芸 陳其農 陳岱嶺 陳薇仲 黃彥瑄 黃贊文
張詠瑛 詹智涵 劉承易 劉貴全 劉家甫 蔡曉林 歐乙平
盧意婷 鍾予晴 戴佑勳 謝佳榮 蕭玉欣

美術編輯 王奕蘋

文字編輯 陳惠敏 林昕樺

出版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公共社會學出版計畫

信箱 publicsociology2012@gmail.com

網站 <http://publicsociology2012.blogspot.tw/>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夏踏：公共社會學與新世代參與／陳惠敏、林昕樺編，王若帆等人著，何明修序——初版.

台北市：公共社會學出版團隊，民104.02 面；公分 ISBN 978-986-04-4307-3 (平裝) 1.公共社會學 2.公共參與 3.社區行動

目錄

《序》

公共社會學的召喚 何明修

不只是一場田野一場夢：那年夏天之後，公共社會學的基進實踐可能
陳惠敏

《社區與行動》

五味屋：那個夏日的酸甜苦辣鹹 蔡曉林 蕭玉欣

埔里原促會：往復城鄉的「公共社會學徒」 江欣樺

部落托育 高洁茜 王若帆

彭婉如基金會：一段公共托育與反思之旅 陳其農 劉承易

五甲自治幼兒園：在童趣中學習溝通 李少玢

《公民社會與創新》

新頭殼：新聞媒體的新實踐 黃彥瑄

四川社會科院五一二辦公室：在國家與 NGO 之間尋找自我定位 戴佑勳

彭婉如基金會：公共托育二三事 鍾予晴

卡債受害人自救會：聽他們的故事，探究自己的心 何有倫

女宿異性訪客規範公民會議：理念與現實的公因數
李學明 陳岱嶺
黃贊文 謝佳榮

審議繁星：誰是台大學生？
吳璠 郭申睿
許菡芸 陳薇仲
張詠瑛 詹智涵
劉貴全 劉家甫
歐乙平 盧意婷

公共社會學的召喚*

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在我十三年的教學生涯中，在 2014 年春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期間，大概是我以身為社會學家最感到驕傲的時刻。在長達二十四天的佔領立法院行動中，台灣年青世代的熱情熾熱燃燒。社會學系的同學積極投入這場「自己國家自己救」的熱血運動，社會學師的教師義無反顧地擔任地後勤支援的角色，無論是在街頭民主教室演講，帶領審議式民主。儘管面臨教育部與校方的打壓，包括台北大、清大、東海、中山、政大等學校的社會學系所都發起了罷課活動。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動機可能很多元，有些人是反黑箱、堅持程序正義，也有人是為了捍衛台灣主權，反對中國因素的干預，更有些人則是從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立場，反對一切自由貿易。無論站在民主、台獨、左翼的價值，要投身於一場集體行動，總是意味著擱置私人的切身關切，為了一個更廣大的社群或者是某種道德願景效力。社會學系師生的投入，顯示這個社群的活力旺盛，我相信很多現役的社會學家會有相同的感覺，身為這個社群的一份子是件光彩的事。

在太陽花學運落幕之後，反動勢力立馬上場。某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在質詢時，批評社會學系學生在街頭上亂搞，他不知道「社會系、社會所在『衝啥』」。社會學理事長王宏仁撰文回應(<http://goo.gl/dlNomz>)，他強調社會學向來是批判「批判不公不義的社會」以志業，因此比較容易看見「讓我們看透社會的結構」。台大醫學系雙修社會學系的陳亮甫更進一步指出(<http://goo.gl/hWrIkM>)，社會學讓我們看見體制、尊重多元、起身行動，以維護人的價值與尊嚴。這兩篇文章清

* 本文後半部曾發表於，何明修、陳惠敏、阮俊達、黃贊文，2014，「從適應社會到改變社會：尋找公共社會學的學生」。《台灣社會學通訊》79：14-18。

楚地勾勒出社會學的規範性關懷；在致力於剖析眼下的社會問題時，每一位社會學者都有一幅良善社會的圖像，而且也希望自己所處的社會能一步步朝向那個理念邁進。我個人認為，也很難找出比這兩篇文章更有力的「為社會學辯護」。

改變社會與適應社會之矛盾

隨著激情的抗爭結束，例外狀態也要回歸到尋常無奇的例行規律。一個不能不正視的問題在於，如果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是社會學的志業，那麼我們要如何從日常的職業中實踐？社會學的祖師爺馬克思告訴我們，用不同方式詮釋世界的重點在於改變世界。而曾啟發馬克思的黑格爾也指出，在當今社會，要成就大業，就要先懂得自我設限。綜合馬克思與黑格爾的觀察，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在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中，從事改變社會的志業。

如果社會學有專門對應的職業，社會學系的畢業生壟斷某種工作的人場券，那麼這個問題就很好解決了。問題正在於，即使社會學的學生再怎麼有崇高的理想，他們仍無法扮演人權律師、在偏鄉服務的醫師之角色，在實踐利他主義的召喚時，仍能維持自己的生計問題。必需要承認的是，社會學就是一門充滿緊張的學科，一方面，社會現狀的剖析使我們看穿了被掩飾的真相，也激發出參與改造社會的熱情；另一方面，這種批判知識卻是在勞動市場不討喜的，並無法直對應到某一種工作類型。

面對這樣的矛盾，實務主義很有可能是最常見的處理方式，畢竟如連工作都找不到了，能夠奢談志業嗎？但是難道一定如此向現實妥協，而放棄試圖改變現實的可能嗎？或許，我們應該換一種思考方式，從「幫社會學系學生媒合性質相似的職業」移轉到「社會學系訓練能夠創造出那些工作」，換言之，就從「適應社會」到「改變社會」。這樣講似乎聽起來很超現實，全台的社會學系不是在種種系所評鑑、招生競爭、人口懸崖威脅下力圖生存，維持現狀似乎就不錯了，怎麼可能有餘裕來改變社會？是的，這些壓力是真實的，但是並不意味著，社會

學系能做的就只是消極地適應職場的需求，提供一些生涯輔導、求職介紹等轉銜服務。

公共社會學的課程實驗

社會學系老師常在課堂上揭露公眾所不願意面對的真相，我們所處的社會就是處處充滿了階級剝削、性別歧視與族群壓迫；但是一旦遇到了職業出路的問題時，我們卻又只能期待畢業生暫時不要在意這些不公不義，先想辦法找到一份薪水穩定的工作。此外，各種社會學理論也指出，沒有一種社會秩序是「自然的」與「神聖的」，很多時候人為的介入可以帶來正向的社會變遷。難道這一整套洞悉體制運作，並且願意相信參與帶來變革的社會學知識，不正是我們畢業生的寶貴技能之一？

在美國的社會學教學領域中，已經有這樣的課程創新。在 2009 年，Kathleen Korgen and Jonathan M. White 出版一本 *The Engaged Sociologist: Connecting the Classroom to the Community* (Thousand Oaks, CA : Pine Forge Press)，即是將公共社會學的理念轉化成為教學手冊的企圖。在其中，作者將「公共參與」(civic engagement)視為社會學最核心的概念，並且試圖從各種美國社會問題出發，引導學生的知識啟蒙與實際參與。

問題在於「公共參與」真的可以融入科系的正式課程嗎？為了解答這樣的疑惑，我們申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計畫」的補助，從 2012 年開始執行一系列的「公共社會學」課程，2013 年的主題為「重訪社區、新世代參與」，2014 年則是「安居於市、從社會運動到社區行動」。課程設計的重點在於，讓學生能在暑假期實際參與原住民部落、農村社區、NGO 之運作，從中獲得實作經驗，並且在事後進行理論性的反思與書寫。

經過兩年多的嘗試，相關課程引起不少迴響，學生的修課回饋算是相當正面，也促使系上師生與更多倡議團體、社區組織有直接互動。於是，我們進一步

想問：台大的課程實驗是具有代表性，可概化嗎，亦或只是一個特殊的個案？

測試「台大例外主義」的命題

社會學的反思告訴我們，「公共參與」必然是附著於特定的社會條件，理想主義的情操也往往是立基於某些物質基礎。講白了，如果學生都要忙著打工賺生活費，要他們關切弱勢群體，不啻是緣木求魚。此外，要進行課程創新，搭建教室與社區的橋樑，也需要各種有形與無形的資源。

社會學家 Bourdieu 研究法國六〇年代的大學生，曾有如此的發現：巴黎的大學生比法國外省的大學生更願意認同自己是屬於左派，也更傾向從事異議運動。在巴黎，大學生多數來自於富有階級，他們與家人共同居住，也接受家庭的經濟支助，很少在外頭打工。與外省的大學生相比較，巴黎大學生擁有更多的知識資源，如眾多的圖書館、博物館和教授。相對地，鄉下的大學生則更依賴學校的課程，很少有機會挑戰教授的權威，因而缺乏參與運動的動機。

究竟，台大學生之於公共社會學，是否如同巴黎大學生之於左派運動，都是基於特定情境的產物？為了解答這樣的疑問，我們在 2013 年 5 月至 7 月間進行問卷調查，希望能夠瞭解台灣各大學社會系學生的學習表現自我評估、對公共社會學的認知與意願、就學基本資料，家庭狀況與經濟狀況。問卷選擇在台大、政大、台北、輔仁、東海、南華、中山、佛光、東華等九所學校社會系的必修課發放，回收有效問卷共 508 份，其中 441 份問卷為社會系本科系學生填答，33 份來自雙主修學生，其餘則為非本科亦非雙修的學生。

九校社會系學生之背景差異

九所學校的社會系本科學生，在基本背景及自評表現上有何異同？首先，

學生的來源有地域差別：除了台大、政大和東華外的六所學校，其社會系學生較可能來自學校所在地區，其中台北大與輔仁社會系多數學生來自北部，東海社會系的中部學生略多，中山及南華社會系的南部學生明顯最多，佛光社會系則有許多東部學生，說明多數社會系吸引不少在地學子就讀。

此外，各校社會系學生之間，也存在部分家庭或經濟背景上的差異：台大、政大、台北大和東海等四校學生的家庭月收入明顯偏高，與最低組的差距至少有新台幣 3 萬元；相較各校，台大學生最顯著地來自核心家庭（75%）而非單親或隔代家庭（僅 3%）、雙親教育程度和個人月開銷也偏高，並且有 92% 學生沒有負擔學貸；政大的學生，雙親教育程度也高，並且相對依賴家庭供應生活費；對比之下，南華社會系有 40% 學生負擔學貸、30% 學生經濟獨立、51% 學生現在有打工，比例較他校來得高；輔大社會系雖有 55% 學生現在有打工，但仍然多數居住在家中。進一步分析後發現，負擔學貸者家庭月收入較低（差距約 2 萬元），家庭月收入高的學生則較可能就讀學費低的台北大、政大和台大，這符合一般的預期：家庭經濟狀況與進入哪所學校就讀顯著相關。

在系所認同、就讀壓力與學習表現自我評估方面，台大（71%）、中山（65%）和南華（63%）三校社會系學生，相較他校學生更可能認為現在就讀的科系「壓力非常大」或「壓力不小」，尤其是台大學生，在學業表現上的自評分數也顯著較低（滿分十分，台大學生平均為六分，與最高組差距達一分）。

除此之外，各校社會系學生倒是相對一致地對自己就讀的科系保持正面態度，在「是否喜歡系上老師」、「同儕相處是否融洽」、「科系是否比就讀前的預期好」、「科系是否讓您更有自信」、「家人是否支持就讀現在科系」等題目的態度上，都有過半受訪學生支持，並且各校間的差異不大。需要留意的是，高年級學生似乎比低年級學生更和社會系「契合」，或許就讀數年後產生了轉化效果；另一方面，申請入學者比指考入學者更可能認同社會系，推甄與繁星生則意外地在相關變項均沒有顯著傾向。這些結果，都值得進一步解讀，或再日後繼續進行抽樣上

更完整的調查。

對公共社會學的認知與意願

即使各校社會系學生的基本背景與學習自評結果略有差異，不過，在對社會學公共性認知的部份，則有相當一致的態度。在這個題組裡，我們以滿分十分的量表（零分代表非常不同意，十分則代表非常同意）測量受訪者對以下幾個問題的態度：「社會學應該關心弱勢」、「社會學應該避免介入各種社會爭議」、「社會學知識提昇了我參與社會運動的動機」。測量結果發現，整體來說，受訪者大多贊同社會學具備公共性，各題均有超過 72%受訪者給出偏向支持此一立場的評分，其中更有 92%受訪者傾向認為社會學應該關心弱勢。校際差異方面，除了介入社會爭議最大差距達 1.8 分，其他題目的最高分學校與最低分學校的差距都不超過一分。

問卷中進一步詢問：「如果 0 代表『非常不願意』，10 代表『非常願意』，請問當學校開授『公共參與』相關課程，例如組織弱勢社區、在非政府組織實習，您選修的意願如何？」結果顯示，有 82%學生給出偏向願意修習課程的分數，說明了無論學生來自哪所學校，都對類似課程有一定程度的興趣或需求。

有差異或許值得進一步分析，高年級學生、來自於核心家庭的學生、無學貸負擔的學生對於公共社會學的興趣較高。最後，女性學生自評校外議題參與情況較男性學生低，但修習「公共參與」課程意願較高，可能反映出女學生有實踐關懷，卻相對欠缺公共參與機會的現況。當然，即使有這些差別，各種背景的學生仍然普遍支持社會學的公共取向。

公共社會學課程的潛力

儘管我們調查無法做到科系普查或隨機抽樣，但仍已初步反映出各校社會系學生的基本背景及表現自評，可供作為未來社會學界對大學課程設計與創新的

參考。一如期預，我們發現各校學生的經濟狀況、家庭形態、家長教育背景、地區來源是有明顯的差異；但是儘管有這些差異，各校學生都一致地認同社會學應介入社會爭議、關心弱勢，也對於「公共參與」的課程有普遍興趣。

基本上，這樣的發現讓我們感到很興奮，這似乎顯示，公共社會學仍有值得進一步開發的市場潛力，而不只侷限於台大。或許，這樣的課程創新會能幫助於我們重新思考社會學系的出路。(完整的調查報告及課程資料，請見台大社會系「公共社會學」系列課程網頁。網址：<http://publicsociology2012.blogspot.tw/>)

五味屋——那個夏日的酸甜苦辣鹹

五味屋？日本料理店嗎？

懂一點點日語和汽車的人，就會知道「豐田」這個如此偏遠的小鎮，其實跟著名的豐田汽車（Toyota）是同樣的名字。然而在這個距離花蓮市區也有一段距離的小鎮，有的不是日本車，而是豐厚的人情味與鄉間色彩。

一九四五年日本政權離開了臺灣島，卻帶不走他們留下的建築、田地與生活方式，於是在豐田村這樣的移民村，漸漸地由客家族群掌握，陸續有來自全台灣各地的客家人移居此地，因此除了具有日治色彩之外，豐田也可以說是個客家村。這群愛護土地與社區的居民們，開始組成了「牛犁工作群」，有組織地規劃與經營豐田社區豐厚的歷史與社會資源，他們的默默地耕耘吸引了花蓮師院與縣立文化局的關注，於民國九十年正式改名為「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而五味屋就是在如此積極的社區活動與工作隊的支持下所創立，為一社區公益二手商店，提供社區兒童與青少年課後遊玩與學習之處。其位址為舊時日式閒置空間「風鼓斗」，一出了豐田車站就可以一眼看見它。五味屋的名稱是英文的諧音「5 ways」，不是味覺上的酸甜苦辣鹹，而是五種獨特的經營方式，分別為「掛羊頭、賣狗肉」、「老闆不在隨便賣」、「銀貨不兩訖」、「吃人夠夠」以及「把五味屋視為『黑店』」，顧名思義可以知道五味屋絕對不是一間普通的商店，而是將重點放置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每一件商品背後的故事。此外，五味也有另一個含意，即為五種孩子應該擁有的味道：「天真」、「勤儉」、「感心」、「親切」以及「好用」。

到底這樣「憑感覺」的商店該如何經營？而且還成功地吸引許多觀光客與志工前來參訪？簡單來說，五味屋的孩子們把這裡視為第二個家，隨著自己的行程

自由來到這裡，可以與朋友玩耍、進行課業輔導、自行開發興趣工作人員也會依著孩子完成的工作，分配相對應的點數，孩子可以用點數去換取他們想要的物資，甚至是籌自助旅行的費用。而進行工作的過程當中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例如：如何跟客人討價還價、補齊物資、與其他孩子們和平相處，這些問題會於每一天的早上的「小老闆會議」一併討論，讓孩子們學會與其他人溝通與討論。

五味屋從 2008 年成立至今，它的名聲持續地在擴大，並廣招國內與國際志工以及實習生參與組織的運作，也持續在開發各式各樣的學習計畫，為的是讓在豐田的孩子們能擁有更多的學習資源以及一個更溫暖的多元成長環境。

社會學的實習 --- 我們去做什麼呢？

台大社會系在公共社會學的系列課程中，首次提供學生實習的機會。成立實習的初衷一方面是期待學生們可以實際進入有興趣的機構來參與跟觀察，另一方面，也提供了「體驗」生活的機會，尤其是離開自己舒適圈、進入陌生組織的學生，除了要跟上組織中的規則之外，適應不同的生活軌跡又需要更柔軟、更有彈性的身體，這些對於學生而言都是重要的學習。如同大多數學生選擇實習的原因，我們想知道「如何動手做」。

社會系的學生，透過理論工具跟閱讀文章來了解社會，甚至可以驕傲地說，我們可以比別人看到社會運作更深層的邏輯，了解某些群體所遭受的不平等何以幾乎像基因遺傳一般不斷再製。但我們大多只能用一般人不熟悉的詞彙來說明某個艱澀的概念，除了走上街頭、投書，我們似乎鮮少知道「改變社會」的方式。然而，那些組織起這個社會的，每天參與著社會變遷的大小事，除了抽象論述外，更是透過日常生活的身體力行進行著。

因此，我們是不是可以在「發現問題」的基礎上，知道「解決問題」的方式？

結合理論的知識跟實作的經驗，解決基礎學科的學生面臨出社會的焦慮，也回應社會系學生對於社會的關懷？於是我們暫時離開校園與書本，來到陌生的東台灣，開始了在非營利組織實習的生活。而我們在實習過程中所經歷的也都在不知不覺中，都不斷以所經歷的感覺與體悟試著回答這些最初的提問。

在五味屋實習的日子於 2012 年八月展開，那個時候正好碰上華隆罷工的抗議事件，我們在台北往花蓮的月台上對大批警力感到震驚，接著就在搖搖晃晃的火車中半睡半醒中抵達了花蓮。一出豐田站，蘇拉颱風過境的痕跡還殘留著，一路上沒有什麼燈光，靜謐的夜裡沒有半個人影，我們在黑暗中摸索著前往住宿點的路。那是在五味屋第一個夜晚，也是最安靜的一天。

五味屋以經營二手商店的方式，透過陪伴小孩進而把社區串連在一起，讓小孩整理物資、成為小老闆，不再將之視為單純受照顧的對象，而二手商店的收入，也將再度回饋到五味屋本身的經營所需。這樣一個堪稱為「社區經濟組織」的商店，實為我們當時心目中的理想組織典範，我們一直很好奇這個地方是透過什麼方式運作？組織怎麼經營？其中人與人之間、商店與社區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

正式實習第一天充滿屬於花蓮陽光的味道，我們跟五味屋的工作人員還有小老闆們互相認識之後，就依著實習生不同的興趣，被分派到不同單位中。雖然如此，五味屋的工作人員間其實並沒有很明確的分工，很多時候仍需臨場互相支援幫忙。很快的我們就進入到五味屋忙碌的、繁瑣的日常生活中，包括與小孩相處、協助辦理活動、整理物資、整理合作的民宿以及當時剛開始不久的「大學小革命計畫¹」。

生澀實習生碰到鐵板

在五味屋的實習，除了完成我們每天被分配到的工作之外，也經常協助處理

¹ 「大學小革命計畫」為教育部底下「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的一部份，主要希望大學透過計畫，搭配課程的方式，帶著學生進入社區進行實踐。

其他突發的狀況，包括辦理活動、陪伴與照顧來到五味屋不同背景的小孩，以及民宿「外婆之家」的清潔與管理。

- 辦活動的二三事

我們抵達五味屋的第二天，事實上就是我們開工的第一天，上午很快的跟督導討論實習生各自的興趣以及將來主要負責的工作，當天下午就展開了我們的第一個任務：協助一個三天兩夜由五味屋與一個基金會的童軍團合辦的營隊活動。童軍團當天才從臺北抵達花蓮，帶來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童軍，參與成員的年齡層從國小跨至中年，其中許多擔任隊輔的童軍都只有高中年紀，各個看起來都相當害羞、沈默寡言，在許多活動進行當中，身為實習生的我們，經常需要協助帶動活動的氛圍。

營隊的活動包括大地遊戲、闖關等，其中也結合豐田當地的地標以及歷史故事，希望透過活動促進五味屋小孩與童子軍之間的交流。初來乍到的我們立刻被交付救火隊的工作，從一開始的破冰，到臨時被安排擔任大地遊戲的關主等，都在考驗我們隨機應變的能力。無奈在準備不充足的情況下，我們雖然被分配到碧蓮寺、客家文化庄、壽豐國中等地點進行簡單的講解、協助闖關活動，但這個幾乎在前一天才拍板定案的闖關活動，在進行的過程並不順暢，最後也沒有順利結束。不過一起追、趕、跑、跳已經讓童子軍跟五味屋的小朋友漸漸熟識。

整個活動過程中，我們也觀察到許多城鄉孩子互動的小細節，比方說在大地遊戲的闖關時，可以發現五味屋的小孩在自己的社區內，因比較熟悉而比較有自信，相對的，台北來的童子軍就需要花比較多時間才能進入狀況。另一方面，我們也很明顯地感受到兩地孩子的思考邏輯也不同，當孩子們討論人有哪些器官可以呼吸時，一個五味屋孩子說：「除了嘴巴、鼻子之外還有耳朵！」這時一個童子軍孩子就默默地說：「耳朵沒有連接到肺，不能呼吸。」

與外面的單位合辦營隊，是五味屋的首次嘗試，這樣的合作經驗無疑是對雙

方的刺激，不僅是對於孩子，對工作人員來說也是嶄新的考驗。為期三天的營隊最後終於圓滿落幕，但從會後檢討的談話中，我們發現負責這次營隊的五味屋工作人員對於這活動並不滿意，主要是因為籌備時的聯絡與現場執行有很大的差距，那些對方事前保證沒有問題的活動，在現場卻狀況連連，比方說他們的孩子不能下田、不能曬太陽等等。事實上，這些問題後來都沒有發展出實際解決的方法，而我們在五味屋的生活，也就沿著些許混沌的營隊而展開。

五味屋作為一個社區型的組織，除了透過辦營隊，讓參與的人多多了解豐田之外，也積極地與社區居民互動與合作，參與這樣的社區互助活動也是我們的工作之一。花蓮到了下午就可以看到分明的藍天和白雲，那天下午，由工作人員帶領孩子們前往豐田一位種花生的大哥家中，這次的任務是要幫忙剝幾大袋的花生。參與了才知道，剝花生聽起來簡單，做起來卻不簡單，需要不斷地重複相同的動作。孩子們因為工作並不有趣，做不到二十分鐘就全部跑去玩耍了，剩下的大人們就必須把工作完成。對五味屋來說，社區互助的活動很重要，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讓孩子們親身體驗日常生活的必要工作，也讓他們明白一些生活的道理，更可以因此跟社區的人們有所互動。

這次的活動之所以稱為社區互助，是因為五味屋的孩子們去幫忙剝花生後，種花生的大哥也帶著材料和工具來到五味屋，教大家怎麼做米布丁跟米苔目。米布丁的做法很簡單，利用中午吃剩的米飯，加入豆漿打成泥，就可以做出美味的點心了！大家吃著吃著，想到由五味屋小孩種的洛神花所釀成的果醬，正好可以拌入剛做好的米布丁，這次的體驗便多了一種勞動過後的甘甜滋味。

類似的社區互助活動因應社區需求所舉辦，另一位和五味屋有連結的社區居民是斜對面的理髮廳伯伯，伯伯每天下午都會來幫五味屋收垃圾、做資源回收，伯伯認為幫忙維護社區環境是好事，資源回收也可以賣錢，對彼此來說都有受惠。透過互相幫忙，無論是種花生的大哥或是理髮廳的伯伯，都跟五味屋產生緊密地

連結。

- 是房客，也是管理員

「外婆之家」是我們在花蓮留宿的地方，是五味屋的「子企業」，是一間委託給五味屋經營的民宿，主要提供五味屋的志工、實習生或辦活動旅客住宿的空間。「外婆之家」裝潢樸實，主要以通舖為主，也有少數客房，簡單但不失舒適。身為實習生的我們，也在使用者付費的約定下，談好為期三周的住宿及費用負擔，不過事情在我們抵達的第三天因為一通電話而有了出乎意料的發展。

在我們預定留宿「外婆之家」的時日中，有一個團體要來五味屋辦活動，對方提出民宿包棟的要求，因此五味屋的工作人員們請我們搬離民宿，改住在提供短期住宿的貨櫃屋，並表示住宿費用會因此減輕許多。同時，在我們搬離之前，因為管理「外婆之家」的孩子去環島，所以整棟民宿清潔的責任也轉移到我們身上。依規定付費住宿的我們，在五味屋面對外來訪客時，我們的身份就從「房客」變成了「自己人」，必須配合安排搬遷，更要像地主一般打掃空間、招呼客人。

對於這個突發的狀況，我們多少對五味屋的處理方式並不認同，但迫於無奈必須配合，這使我們去思考實習生這樣的角色對於五味屋而言究竟是什麼？是付費住宿的房客還是五味屋的工作人員？是人手不足時的儲備人力還是被劃定在界限之外的外來人？或者，其實是更複雜的多重身份呢？也許就是身份界定的模糊，我們偶爾是外來的實習生，所以無法參與核心團隊的討論；偶爾是五味屋的自己人，必須彈性配合工作與住宿的調動。經常經歷納入與排除的我們時時刻刻面臨著社會學家高夫曼（Goffman）²所說的「前／後台³的轉換」，對於何時要有何種表現、何種心態，光是轉換調適的過程就讓初入五味屋的我們精疲力竭。

²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從戲劇表演的角度來看社會互動，並稱之為「戲劇論」。他認為生活世界是一個舞台，每個人與其他人的互動都是一種表演，互動的雙方會因為所給出的不同印象而有不同的反應。

³ 前台與後台標示著不同的角色，在前台，人們是表演的角色，需要表現出特定角色該有的樣子；在後台則因為沒有觀眾，大家都是自己人，而較可以無拘束的展現自己。

在五味屋工作的人們：平行分工下的個人行事風格

五味屋的組織大體而言符合我們想像中「美好的」平行組織架構，少了科層制度的上下權力關係，也讓五味屋的各項分工充滿了個人風格。工作現場很難感受到那些媒體所報導的各種理念以及有趣的制度設計，例如：我們已經很難看到小老闆在顧店的景象，而五味屋的點數制度在實際操作上，往往是用來約束小孩的一種工具，似乎感受不到小孩們為了換得一樣物品、一趟旅行而努力扮演小老闆的用心。

此外，在五味屋實習的日子，我們經常在當天才接到工作的通知，之後便到處奔走幫忙。面對不熟悉的工作，再加上對於指令與標準的不了解，我們經常像是亂了呼吸的馬拉松跑者，手忙腳亂卻不得其門而入。

- 貌似有彈性卻一絲不苟的舍監

在五味屋實習的日子裡，我們總是很期待下班後能到附近去尋找有趣的景點，或是好吃的料理。那一天，我們就如一般日子的行程，飽飯後滿足的到處散步，途中突然接到了五味屋工作人員的電話，希望我們隔天可以協助打掃我們所居住的「外婆的家」，我們爽快地答應。

隔天一早，我們吃過早餐之後就開始賣力工作，打包整棟樓的垃圾，接著掃地，然後拆洗二樓跟三樓的床包、枕頭套並收拾被子。不久後負責打掃工作的舍監來了，讓我們去掃二樓跟三樓的通鋪，由於我們不清楚要掃除的範圍究竟多廣，就快速的完成了木板的清潔。

舍監對於我們清潔的效率感到不可置信，便檢查了我們掃除的區域，發現角落頭髮跟毛屑，並不滿意我們打掃的成果，便要求我們再掃一次。然而在沒說清楚打掃的標準跟範圍的情況下，舍監此時念著我們說「掃得很沒效率！」、「做

事情是有方法的，你要從高的地方掃到低的地方，知不知道？」、「這個電扇怎麼沒有洗？民宿最重要的就是每個地方都要很乾淨！」、「你們有沒有辦法維護？如果沒有辦法的話，你們就搬去貨櫃屋，因為那邊的公共空間比較少。」，這些話語聽起來格外刺耳。我們一直掃到出現中暑症狀，才扶著牆坐下休息。

這一天，我們都很失落，半是原本出於好心的幫忙卻被視為義務，半是被冤枉成偷懶。也許我們真的做的不夠好，但無法完成基本的溝通，才是指令與成果有所落差的主要原因，而那些因人而異的規範與標準加諸到我們身上時，經常令人無所適從，而感到十分無助。

- 「小」老闆與「大」工作人員

五味屋陸陸續續也辦了很多小型的社區活動，這些活動的海報通常都是由五味屋的小朋友一起畫的，雖然五味屋有許多繪圖的物資，但像是紙張這種消耗品就很少出現在寄來的物資包裹中，經常需要出去買。這天，五味屋的大人工作人員讓女孩詠芹去買三張圖畫紙，並要求她五分鐘要回來，請我們陪同。可能因為天氣炎熱，也可能因為需要走一段路才能抵達商店，詠芹一路上都走的不太情願，不停地抱怨太熱太遠，在我們半哄半騙下才好不容易抵達商店。詠芹卻開始在商店亂走，我們叫她也不回應，甚至忘了要買什麼東西。接著男孩賀麟突然出現在商店中，這才發現他竟然也被託付要買圖畫紙，只是兩人完全無法決定要買些什麼。我們問：「紙是要拿來作什麼的？」賀麟只有說要做海報，我們追問要哪一類的紙質或顏色，賀麟也答不上來，一旁的詠芹則持續不受控制的亂走。我們花了好些時間才讓詠芹過來選顏色，最後挑了藍色的紙回去。

不料，回到五味屋，工作人員卻很嚴肅地對詠芹跟賀麟說：「你們為什麼買這個回來？我要的是圖畫紙不是這麼貴的紙。圖畫紙一張只要兩塊，這個一張要四塊很浪費！你們是怎麼決定要買這張紙的？」此時，兩位孩子都沈默地低下頭，不敢回答。工作人員於是要求孩子先思考，五分鐘後再問他們，然後就拿起計時

器計時！我們向工作人員解釋整個採買的過程，卻得到這樣的回答：「這就是你們的責任了，是你們引導了小孩去決定了不符合規定的事，小孩子沒有權力決定這些，他們應該要被訓練遵守時間規定、遵守大人指示買回正確的東西。這樣才能當個守信用的人。」此際響起了計時時間到的聲音，工作人員關掉計時器後就轉向詠芹：「你會忘記要買什麼，一開始就應該跟大人拿紙記好。」接著對賀鱗說：「你買東西就應該問大人，清楚的知道要買什麼回來。」

五味屋希望讓小孩可以從生活中學習，然而對於這些小孩來說，也許教育需要多一點的陪伴，每個在五味屋工作的大人對於小孩都有不同的教育方式，他們時常給小朋友任務，卻不是每一位大人都會給予詳細的指令。很遺憾的，這一次買紙的任務並沒有按照工作人員心中理想的方式達成，但無論是我們或是小孩都沒有得到詳細指令，這種情況下，即便作為有能力完成任務的實習生，也難以達成要求，卻同時得承擔所有責任。我們很困惑小孩在這種引導方式下能有多少的學習成效，工作人員的個別行事風格變成了孩子學習過程的關鍵。

- 市場價格之外的標價？各有定價標準的店務人員

整理物資是我們在五味屋的例行工作，首先要拆箱，接著拿出收到的物資，整理過後決定要裝箱進倉庫，或者立刻標價、上架。某次我們整理的差不多之後，工作人員 A 就請我們幫忙標價，後來被工作人員 B 發現後，他驚慌的跟我們說了一番關於標價的道理：一般不會請小孩或是短期的志工處理標價的事務，商品的標價應該要先問過工作人員 A，才不會浪費每一樣物資對於五味屋的價值。

我們在工作過程中陸續觀察五味屋的上架流程，發現很難掌握五味屋定價的原則，大多是依照個人觀點來決定價錢。工作人員 A 比較是隨意的在喊價：「那個五塊就好，那個要一百！」；另一方面，工作人員 B 則是以市價打折的方式在思考定價，而這樣思考收入的方式，讓很多東西的訂價偏高。我們還觀察到，其實許多客人只將五味屋視為普通的二手商店，如果沒有小老闆來結賬，一般客人

很難接收到五味屋的理念。

我們也觀察到，兩種不同的定價方式，跟物資大量地湧入有關。在必須快速處理物資的情況下，流程變得非常仰賴工作人員的直覺反應，無論是隨意定價或是用市價去評估價值。在這樣的情況下，五味屋最初讓小孩透過協助經營店務達到生活學習的理想，顯得難以執行。

- 必須保持彈性的我們

面對各式各樣的行事風格，也許隨時保持彈性成為我們必須學習的重要課題。三個禮拜的時間相處下來，會發現五味屋的運作需要很多彈性，因為充滿了人的互動，不僅是工作人員與小孩子，也包括外面來的志工、工讀生、訪客、一般客人等等，許多事務都需要隨機應變，而每個人也都必須保持彈性去接受。也許就是因為五味屋不是以營利為目的，而是希望營造一個充滿「關係」的空間，因此「有機的互動」很被鼓勵，好讓每個人都可以發揮所長來完成工作。

但這樣的彈性在實際執行時會出現許多的兩難：你可以選擇命令指派或者選擇細心說明；你可以選擇有效率、有條不紊按著規矩來，或者選擇接受受混亂，耐心地慢慢來（又或者，在五味屋工作的人們被生活的節奏推著走，其實並不真的擁有選擇的機會？）。雖然跟五味屋的工作人員們共事也有一些趣事，但當下多少有些無法接受的情境，或是因著個人工作習慣不同，對情境往往不知如何回應，此外，我們經常也有很多的疑惑與矛盾心理，甚至無法接受這樣突如其來的彈性。

這一切複雜的情緒，在當下無法消化，在我們離開花蓮後，才漸漸體會到，原來那些計畫趕不上變化、時時刻刻解決突發狀況的日子，教會了我們更加日常、更加真實的生活智慧。

貨櫃屋的小革命

五味屋旁的空地，在 2012 年的夏天搭起了一區貨櫃屋，東華大學的老師與學生們共同申請了教育部「大學小革命」的計劃，並與新竹貨櫃合作，希望在五味屋旁邊打造一個社區型的改造據點。這個用民間捐贈的貨櫃屋所拼成的口字型空間，他們稱之為「見性工坊」。希望招募擁有技藝的人們來貢獻專長，這個計畫當然結合社區居民，也將計畫的全台推廣到放在整體的時程表中。

由貨櫃屋以及青年所組成的「見性工坊」，預計在貨櫃屋的牆上漆上五味屋大人、小孩的身影，在這裡，大家一起修理從東華大學回收來的腳踏車，縫補、改造他人捐贈的舊衣物資，並且修繕瑕疵的傢俱。見性工坊希望給這些物資再一次被使用的機會，也提供五味屋大一點的小孩從中學習操作工具的基礎能力，甚至是修繕、改造的技術。

我們抵達花蓮的第三天開始了在工坊的工作。炙熱的陽光總是在上午七點就把我們從床上叫醒，起初總是對過度熱情的天氣感到不習慣，漸漸的，我們也養成了這裡需要的生理時鐘。在工坊的工作總是很有趣，除了可以遇到其他的大學生之外，也經常需要動一點腦筋，不只是機械化的重複操作某些工具而已。之後我們經常跟著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的博士生，智明大哥整理貨櫃裡的木工材料，盤點新竹貨運在運送過程中所產生的 ikea 瑕疵傢俱，看看有哪些瑕疵物、損壞程度如何等等，我們對這樣分類、記錄的過程都很感到興趣。

接著幾天，五味屋陸陸續續出現了年紀稍微大一點的小孩，就讀國中的他們早已過了玩扮家家酒的年紀，尤其是男孩，木工以及特殊工具的操作，對他們來說有相當大的吸引力。我們跟著智明大哥、東華的學妹們以及五味屋的小孩俊辰一起做木工。負責把書架拆裝，塗上白膠之後再組裝起來。俊辰是個力氣大的男

孩，比較沒有耐心，一直把玩不同的工具，尤其是電鑽這種看起來嚇人的傢伙，工作過程中，不夠細心又動作粗魯的他，經常讓我們得重新來過。不過這樣的過程確實提供小孩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雖然需要耐心地去引導不大能夠專心的孩子，但花上一些時間去完成這樣的事情，我們都認為是很有價值的。大家後來又共同彩繪了書架的夾板，賦予瑕疵傢俱新的生命，這樣的工作相當具有五味屋的風格，路過的居民還問我們翻修後的傢俱怎麼賣呢！

除了木工之外，也改造了很多的回收腳踏車，這些源自東華大學的腳踏車也許已經不能騎了，但只要加以改裝，就可以重新組裝成足以安全上路的腳踏車了。我們鮮少參與腳踏車的修繕，卻幸運地加入一次車隊郊遊。我們從豐田出發，往山的方向前進，一行人浩浩蕩蕩地騎著改造好的腳踏車往鳳林出發，遇到下雨就停下來休息，山路太陡時就牽著車互相打氣前進，爬坡途中一度有人車鏈斷了，立刻有學長幫忙處理。在森林中紛亂的鳥語中，也有學長教我們如何辨別不同鳥類的聲音，大家在路上滿足地吃了午餐跟冰淇淋，滿身臭汗的我們一直到下午才回到豐田。

無論是木工或者是腳踏車，換個角度看，都可以成為珍貴的資源，同時這種接近手工業的改造過程，可以立刻回應社群的需求。馬修·柯勞佛在《摩托車修理店的未來工作哲學：通往美好生活的手工精神與趨勢》一書中提到，因為修理摩托車的人幾乎就是你的左鄰右舍，面對故障的摩托車時，你必須檢驗出關鍵病徵，進行處理；而你成功修繕的摩托車，也會回到你看的到的地方，同你一起接受客戶的感謝與笑容。而這正是此書作者離開學術工作，投身摩托車修理店的原因。在見性工坊，大抵就是這種氛圍吧！

- 介入社區藝術行動

在貨櫃屋總是有新鮮事，有著藝術相關背景，就讀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的鈺予是貨櫃屋計畫的負責人之一，他總是有許多藝術介入社區的點子，那天他

提議要做社區地圖，地圖上標示出豐田的幾處特色地點，希望透過社區地圖闖關的方式，讓參與者對社區有更多了解。工坊的人們來自台灣各地，相處的時間也不長，卻因為共同勞動而有了深刻的情誼。完成社區地圖的那天晚上，我們和工坊的學弟們以及東華大學的學妹們一起吃火鍋，同時我們也成為盛夏夜晚蚊子的晚餐。在五味屋累積幾天的困惑，需要陌生人的慈悲提供排解的出口，於是火鍋湯頭加了很多的故事，那一晚我們吃了好久好久，才終於結束。

騎腳踏車回來的那天下午，疲憊萬分的我們立刻接到了一個新的任務：為了準備隔天在社區舉辦的「蚊子電影院」活動，我們必須繪製一個布幕。根據釵予的說法，「布幕也是 style」，所以大家就開始共同創作布幕，接著在大帆布上構圖，最後再用油漆來彩繪。彩繪到一半，天就黑了，遠方開始傳來把玩樂器所發出的聲音，才知道隔天放電影前有一個小小的音樂會，大夥兒於是放下了筆，開始跟著音樂打節拍、哼唱。為著一個活動共同準備的感覺很好，熱鬧歡愉的氣氛也讓我們忘了時間。

播放電影的當天，大夥兒再次出動宣傳，我們實習生跟工坊的學弟、妹們還有五味屋的小朋友，在日落時分，踩著腳踏車，帶著大聲公，在五味屋前筆直的道路沿路喊著宣傳口號，邀請居民共同來觀賞。電影在一片熱鬧的音樂中開始播放，夜幕幫大家關了燈，投影在我們共同創作布幕上的電影，是一個法國導演執導的動畫片，叫作〈枕邊故事〉，用剪影的方式呈現好幾個小故事。對我們來說，這個活動並不特別達到特定的社區意義，卻很有趣，也讓這個工坊又有了一個把人們都聚集在這裡的誘因了。

見性工坊緊鄰著豐田火車站，步行一分鐘的時間就可以抵達，似乎是因為改建的關係，怪手進到車站內進行拆除的工程，進行到一半的工程可以看到幾處斷垣殘壁，鋼筋也都露出來了，黃色的封鎖線隔絕我們與施工的區域。事實上，豐田車站的改建面臨很大的問題，政府施工的方向是整修建築的外觀，但地方居民

都因為鐵路涵洞經常淹水而苦惱，認為與其金玉其外的做外觀的拉皮，不如對症下藥把車站遷往其他地方，徹底解決淹水問題。這個事件在 2012 年 4 月引發了居民的抗議行動。藝術介入社區，除了透過藝術的方式吸引更多人來參與社區之外，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藝術的方式，表達地方的聲音，因此工坊夥伴們選定一個晴朗的晚上，準備透過「藝術」的方式，傳達我們的想法。那晚，我們一行人趁著夜幕低垂，附近的人家都休息的晚上，帶著已經裁剪好的紙板跟噴漆，沿路留下我們的訊息。有一張紙板想要諷刺台鐵的怪手為了利益拆掉豐田的日式平房，另一張紙板則是希望傳達對於豐田的愛。

雖然當晚路上幾乎都沒有人的蹤跡，我們仍小心翼翼的選定一些醒目的位置塗鴉，要避免敏銳的家犬聽到我們的聲音而嚎叫，也要避開偶然撞見的路人的懷疑。由於我們都是第一次參與這樣的行動，過程當中所感受到的緊張之大，使我們一時忽略這次行動的重要意義。圖像所要傳達的訊息，以及行動背後的訴求，是在我們離別前，一次偶然的聊天中才問出來。帶領我們的夥伴說：「塗鴉一方面是反抗的（破壞的），另一方面也是建立的（有正面意義的）」，雖然這樣的概念未必在行動之前就深深烙印在塗鴉行動者的心上，但那些留在地上、牆上斑駁的圖像，終究承載了某些訊息，那是透過藝術幫忙說出的無聲的抗議。

來到這邊的人都有一些故事

- 難以捉摸的么女：文怡

文怡是一位外籍配偶的小孩，在我們到五味屋的時候，還是國小低年級生。剛到五味屋就有工作人員告訴我們，文怡的人際關係出了一點問題，被所有五味屋的小孩排擠，工作人員說因為她年紀小不懂事，而且是獨生女，很受父母嬌寵，所以跟其他小孩都處不好。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陪她，起初跟她也沒有很好的互動。個性難以捉摸的文怡，偶爾很黏我們，緊抱著我們、要我們陪他玩，偶爾情緒反覆，甚至對我們有暴力的攻擊。有一次，因為受不了她一直咒罵，我們於是趕緊跑到屋內，想要避免衝突，沒想到她居然拿著椅子當武器追了進來！把椅子舉到臉的高度，把椅子當作機關槍一般，搭配著扣板機的動作跟嘴巴發出的聲音，直往我們這邊衝，作勢攻擊我們！一位實習生大聲跟她說：「我看不到你的臉！不想跟你講話！」她竟然立刻放下武器。「要當好朋友就過來！」我們對她說。文怡竟然立刻興沖沖地跑了過來，好像剛剛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變臉的速度讓我們驚訝不已。

類似情緒反覆的例子不勝枚舉，有一次要讓她和大家一起去整理物資，卻一直被她拉著做其他事情，被她弄的快要昏頭了，後來索性不理她，她才自動跑到大家工作的地方。還有一次，她把閱讀角弄亂了，我們希望她自己收拾，才有機會學習，但收拾任務卻一直無法順利進行，場面常常無法控制。更有一次，在一個社區走訪的活動，孩子們分組完後只剩文怡一個人，因為其他小孩不想被拆散，也不想跟她同一組。一開始跟著地圖指示的任務到處跑來跑去很是有趣，直到我們抽到一個籤，必須要在「老校長的家」完成任務，卻怎麼找都找不到，文怡竟然拉著我們跑到了自己家。不熟當地路線又不知如何是好的我們，一直等到後來工作人員發現我們沒有回去，騎機車來找，我們才終於離開那個神秘的地方。

但也因為這個社區尋寶遊戲其中一項任要我們去訪問一個社區的人、了解他對於社區的期待，並且善用五味屋的工坊去滿足這個期待——文怡這組選到了她的爸爸。我們這時才發現，原來文怡家的收入是靠政府補助才能維持下去，雖然滿嘴檳榔的父親沒有工作在家中待業，很容易被一般的社會想像分類到某種好吃懶做、遊手好閒的類屬中，但在短短的訪問中，我們卻可以感受到父親疼愛女兒所流露出的情誼。透過五味屋的活動，以及這位小女孩，我們似乎進一步的進到社區中，看到這些處於社會弱勢的家庭，如何面對結構上的困難，進而影響了教

養的風格以及子代的人際關係。事後我們幾個實習生聊了很多，但恐怕也不能否認魯迅所言「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雖然我們帶笑一致同意這有點「扯遠了。」

- 想當導遊的民宿小管家：小熊

在我們到達五味屋的第一天稍晚，一位孩子帶著鑰匙出現，原來他是「外婆之家」的小管家，那是我們在花蓮認識的第一個孩子，他叫做小熊。

小熊十六歲，太魯閣族，已經不算是小孩，他的工作是擔任民宿「外婆之家」的管理員，當時處於休學的狀態，卻有著成為導遊的目標。小熊總是跟我們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已經很習慣民宿有人來來去去的他，在我們問及家庭狀況時，他提到自己的爸爸是西班牙人，我們很困惑，原住民外貌與口音的他，怎麼會有一個西班牙裔的爸爸呢？幾經詢問之下，才發現是先前來到五味屋的志工，這個問題也帶出了小熊複雜的身世。小熊是非婚生子女，在他出生之後，父母兩人相繼與其他人結婚生子，生母在小熊三月的時候就過世了，但他在爸爸家裡也像個外人，只記得小時候好像常有不同的「媽媽」出現在家裡，沒有得到我們習慣的家庭溫暖。因此高中外出住校念書之後，小熊就很少回家，五味屋成為他渡過日常生活的重要地方。

這樣複雜的家庭關係似乎並不罕見，小熊提到他有個同學在 16 歲時已經有一個 3 歲的小孩了，而小孩的父親現在 18 歲，沒有婚姻關係。這樣的情況，在現在的法律跟社會價值觀中都不怎麼被接受，甚至被定調為非法的行為，但卻常常發生在相對弱勢的家庭裡。我們討論著各種文化差異與肇因，想著或許在部落的觀念裡會有共同教育的想法，因此複數家庭成員的組成是彼此照顧的基礎，這跟漢人對於家庭的觀念很不同。就因為這些觀念上的差異，進一步的使不同文化中的人對於教育或是生育孩子有不同的做法。雖然我們有許多的討論，卻無法去評判各種觀念與價值的高低，但在現實生活中，漢人的規範就是以一種相對拙劣且粗暴的方式套到所有的人身上。

在小熊身上，我們沒有看到自怨自艾，而是大餘同年齡小孩的多愁善感。實習期間，因為跟小熊一起住在「外婆之家」的關係，相較於其他五味屋的小孩，我們有很緊密地接觸，同時也因為年齡較為相近，我們聊了很多。相對的，他對我們的依賴也更為深刻，雖然平時嘴上都說著沒有關係，道別前卻不停地找我們擁抱，主動唱歌送我們，甚至在離開之後，也持續用網路媒介試圖與我們的聯繫。五味屋的工作人員說，五味屋的小朋友都已經很習慣志工來來去去，小熊大概也發展出一種不要過於緊密的相處策略，但仍讓我們去思考，這些希望「給予」孩子或是「陪伴」孩子的志工，對於當地的小朋友而言究竟是什麼？

- 其他小朋友的故事

五味屋的宗旨在於加強當地學童的教育，以及彌補部分學生的家庭所無法給予他們的照護功能，並期待能透過假期的活動填滿他們的生活，以促進向上流動的可能。由於實習只有短短的三週，無法觀察到這麼長遠的變化，於是我們向工作人員問起這部分的成效。其中一位研究生表示，他認為五味屋提供一個比較多元的環境，和小孩子在家裡面的環境比較，五味屋有各式各樣的活動能讓小孩子探索，進一步發展潛能。五味屋確實讓許多社區小孩接觸到以前不到的事情，但通常是一個課程或是完成任務的形式，有些活動甚至是強制小孩參加的，例如月底的營隊。同時，這位經驗豐富的研究生也告訴了我們兩個故事：

首先是丸子的成長。原來現在是五味屋孩子中大姊大的丸子，剛來五味屋的時候是個很害羞、內向的小女孩，卻在五味屋中找到了交朋友的方式，逐漸成為孩子們的領導人。我們跟丸子的接觸並不深入，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看到她指揮孩子們整理閱讀角的樣子。那一天，閱讀角有些髒亂，丸子看到了就指著閱讀角問：「是誰弄亂的？快點收一收！」，同時要求我們實習生不可以幫忙收，因為：「如果你們幫忙收了，那那些玩的人就會覺得之後玩完都會有人幫忙收，自己就不用收，所以一定要他們收好才行」。丸子在講這些話的時候，我們都感到很驚訝，儼然是一個也可以教育他人的小大人，我們完全無法想像眼前的這位受其他

孩子尊敬的大姊頭，曾經也很害羞被動。

另一個是秀萍的轉變。秀萍一直很喜歡狗，但家裡一直不允許養寵物，小時候她在路邊撿到了一隻狗，卻因為無法養育牠而親眼看著牠死去，這對秀萍造成了非常大的創傷，後來變得有點內向寡言。五味屋的工作人員一直記著這件事情，決定舉辦「狗醫生」的活動，這個活動類似於「寵物治療」，希望讓秀萍有機會與活生生的狗兒們一起玩耍，經過這次活動，大家發現秀萍的日常表現有顯著的差異，越來越活潑。

事實上，這些改變都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被我們看見的，通常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可以發現這些也許細微也許劇烈的改變。慢慢聽了越來越多的故事，讓顯然只看到一段時間切面的我們不禁開始思考，五味屋或許能給予孩子們的，就是在這些細微之處，也許在五味屋日常生活中對於孩子們所造成的改變，很可能就是他們生命歷程的一個轉捩點。

- 一位新任工作人員的期待與願景

讓我們印象很深刻的工作人員是麗玲，她是所有工作人員當中最年輕的，也是最新上工。麗玲提到自己才來三個月，剛進來五味屋時經常也會感到很混亂，不確定該以什麼樣的態度教育孩子們——若是過於放縱，會被外頭的人責備沒教養，但若太嚴厲，五味屋又失去了家庭的感覺。有出身心理輔導專長背景的她歸納出一個結論：教育孩子必須先與孩子們建立關係，讓他們能夠信任你，觀察並了解每個孩子需要學習的議題，再進一步給予引導。

麗玲也提到五味屋營運上的困難，因為來到五味屋的孩子們越來越多，五味屋午餐的費用也提高了，這對五味屋來說慢慢變成一種負擔，工作人員們甚至還想過是否該篩選孩子們。但這並不符合五味屋的初衷，因為五味屋就是希望成為一個陪伴孩子們的地方。不過麗玲也表示，她曾經質疑許多五味屋的經營方式，但又總是想著，「難道這些問題先前的人都沒想過嗎？」。有一次跟顧老師會面，

她告訴顧老師這個想法，老師則人為，五味屋順利經營了五年，當然還是有很多做得不夠好、不足的地方，但顧老師認為這樣就夠了，因為孩子們至少有在這裡得到溫暖。

我們也詢問麗玲，是否相信五味屋種種做法真能幫助孩子們脫離結構上的處境，未來能向上流動？麗玲答道，這樣的願景畢竟還是必須靠時間來醞釀，目前五味屋成立五年，有些孩子們有成效，但或許還不夠明顯，這些都是該繼續努力的。如同教育社會學「水龍頭理論⁴」，五味屋等等的組織，無不是想在這些孩子們的假期中，多補強一些技能與知識，以期許他們都能夠向上流動吧！

以麗玲的故事作結，某種程度上也間接回應實習期間所面臨的困惑，我們也慢慢理解，來到這裡的人多少都帶著一些理想跟抱負，希望可以貢獻自己的專長。同時，我們也慢慢的發現，大家所關注的現象跟問題不同，所想到的解決方式多有差異，而這些行事作風之間難免有矛盾。我們在麗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對這些事件的反應，多少成為一籌莫展的我們的小小出口。

結論：此時書寫著那個夏日

離開花蓮的那一天，就如同平凡的其他日子一樣，我們在市區吃了名產扁食，帶著小熊送的畫著「洄瀾⁵再見」的漂流木，隨即坐上火車。我們幸運地搭到直達車，從花蓮到臺北看似遙遠，火車竟然在短短兩小時內就將我們送回了城市的喧囂，一路上我們雖然疲累萬分卻都沒有睡著，想著我們離開的出發地，想著過程中離開我們的志工，想著與幾個工作人員默默建立起的友誼，想著這段雜揉著太多感受的實習生活，而在在，這些都已經成為回憶了。

⁴ 水龍頭理論指的是暑假期間的學習差異，是造成優勢學生和劣勢學生之間學習成就差距的主要原因。

⁵ 花蓮的舊稱。

實習大概是一個需要很多溝通的過程，實習的成功與否需要實習機構以及實習生共同去努力，共同去定義情境。半是因為對於五味屋的期待，半是因為在實習現場缺乏足夠的溝通機會，實習的日子中我們深感身心遭受擠壓。然而，回頭看的時候似乎又看到了真實生活不得不面對、微小卻不可說無意義的雜事；而那些屬於五味屋的故事，也得透過實際參與而展開，不是由理念或者是規則就可以完全表現出來的。

這短短三個禮拜的實習，究竟實際上帶來什麼樣的學習成果？若僅僅只是幫忙整理物資、打掃民宿，與小孩玩耍，又如何可以稱這個實習為一門正式的課程？五味屋的工作人員告訴了我們，實習生與志工不同的地方，或許在於實習生即便在做同樣的事情，也要積極地展現他的專業。這也讓我們進一步去思考：社會學的專業是什麼？社會學這門學科的本質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實習經驗讓我們暫時脫離如溫室般的校園，給予我們機會去探索這個我們研讀著、卻又如此不熟悉的社會，也讓起先各自對於組織或教育感到興趣的我們踏進五味屋，在實際操作的過程當中不停地激盪更多的想法與火花。那段時光，我們不停地質疑自己，學了社會學的理论與方法，認為某些理想的達成好似有一套操作的準則，但我們卻不知道在實際的組織中如何應用。理論與實務之間的差距，比想像中來得更大，那並不如我們在不停整理物資時，隨口玩笑一聲說：「我們也正在被『異化⁶』！」那樣地輕鬆。

離開五味屋之後，或許被花蓮的那些日子有所有啟發，再度返回熟悉的校園之後，我們各自投入了所申請的教育部「大學小革命」計畫當中，實際感受到維持一個組織與理念之間的平衡，是一件多艱困的事情。也因此，從我們現在這個位置再回想五味屋的那段日子，又是別有一番感受，與當時很衝動、本能的反應，又再多了份沈澱與思考。

⁶ 社會學理論家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認為資本主義底下，強調生產力的分工模式，會使得人們與勞動過程、勞動所生產的產品以及人類本質產生疏離。

好像都是這樣的，當往前走了一段，再去看曾經的經歷，往往會覺得過去所發生的一切，無論是好是壞，無論當下的情緒多麼激動，批判的語彙如何劇烈，都為現下構成了某些意義，因而感到自己有所成長。但過去的負面感受也都是無比真實不假，即便是因為受到某些事件所誘發，也不可以假裝這些並不存在。相信這些感受需要被說，被書寫，被理解。

而回應到社會學、實習、知識與實作這些很大的概念，現在的我們回想花蓮的生活，其實最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些平凡無奇、瑣碎、一再重複的日常生活。我們所學的理论如同一把篩子，將社會的規則、習慣與結構用語言的方式論述，然而有些細微、平凡的經驗現象，往往可能會被篩子所遺漏。而實習的過程，就是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去體驗這些渺小卻有重量的日常生活，它們鮮少被書寫，卻是如此真實地在支撐著這個社會。

埔里原促會——往復城鄉的「公共社會學徒」

社會學的知識源自於人和人的社會生活，然而在尋求理論化的過程當中，經常又因過於抽象而難以重新連結到真實世界當中。我跟其他「圈外人」介紹自己學社會學的時候，得到的回應往往不脫「出去以後能幹嘛？」，甚至當社會學針對社會現狀提出一些批評的時候，也會被社會學社群之外的群眾批評為紙上談兵、「沒有替代方案」。然而真的沒有替代方案嗎？暫且不論誰有責任提出替代方案的問題，社會學教我們分析和思考的能力，但我認為，也是建立在觀察與剖析之上，我們才能做出更「切合實際」的想像。

以我的學科背景而言，生傳系（前農業推廣學系）和社會系可說是台灣鄉村與都市社會學的兩個分支。在農業推廣的背景之下，我們除了社會學和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之外，尚需很多直接和人（可能是農民或消費者）接觸的經驗知識，課程上也花很多心力和資源在學習「實作」，雖然因此得以累積不少經驗值，但有些課程實作性質一多，往往就失去了基礎理論的深刻思索，變得只是照既有的作法代入操作。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我的公共社會學實踐當中。在課堂上閱讀、參訪的案例，和我自己的行動場域，剛好是很微妙的對比；課堂上學「社會創新」、「社區介入」，都是脫離既定組織架構的新思維，但實際進到場域當中，卻發現實際的「公共生活」，其實無處不受到官僚體制權力機構的影響與限制。例如政府設計的「計劃案」機制，原本確實有鼓勵社區自主營造的美意，社區卻為了爭取資源，不得不走入具有專業門檻和的各種階段性規範要求的「體制」，而未能充分伸張自己的主體性。

因此，我期待的公共社會學應該要更能深入公眾，以在地公眾的生活為主體思考，而這除了社會學、人類學式的觀察、分析之外，也要從當地的文化出發、挖掘更多問題，尋找更多解決方案，並建立起更多元的想像。「與公眾對話」乍看平易近人，實際操作起來談何容易？社會學將複雜的社會現象濃縮成不同理論

架構，而當我們又回到「公共的」實作場域，既是公眾、又是學院一員的身分，使我們在面對其他公眾時，往往又被推崇（或是推擠）成學院的一部份——我想這種「二重斷裂」應該是每個公共社會學實作者或學習者都會面臨到的。

我的公共社會學實踐幾乎是以「原住民」為核心，面對的「公眾」，從一開始的原住民小孩、原住民社區營造，到研究所階段的弱勢自立支援，往往都是社會上比較少數、弱勢的群體，因此，讓這些族群在面對「主流」的時候，能為自己發聲、讓多數人聽見，便成為重要的課題。在我自己的公共社會學經驗中，有很多資本和機運讓我得以順利開展、有充足的揮灑空間、許多貴人相助，最大的問題反而落在如何「說再見」。我自認是個很不知道要怎麼好好「道別」的人，因此接下來提及的每一個故事，大多走向了「開放式結局」。

初探部落：南投·曲冰

- 「我來了，所以我看見」

我第一次接觸社會學，是在高一人文社會資優班的導論課上，也是拜人社班之賜，剛好有同學的家長創建組織從事部落工作，每年舉辦城鄉交流的「數位人文關懷營」，讓部落小學、都市小學和大學生用「數位家庭」的模式互動，透過網路平台，希望能建立長久持續的陪伴關係。

我們待的部落名為「曲冰」，位在南投縣仁愛鄉，除了教學、康樂活動外，也教小朋友操作對外數位相機、騎腳踏車遊部落，並在營期結束後利用「數位平台」持續和大哥大姐保持聯絡。

當時有一句學姐傳下來的名言：「我來了，所以我看見」。第一次進到位於深山、手機幾乎收不到訊號（但在前人努力下有無線網路）的部落，舉目所見都是低矮的平房、跑來跑去的小孩和狗，還有一天來一兩次的卡車蔬果販；低矮圍牆環繞的小小校舍中，一個年級只有六、七個同學，大家都很清楚誰是誰的兄弟姐妹、誰是頭目家的小孩、誰是貴族，每家每戶彼此熟識。各種都市裡面見不到的

景象，對一群天龍國高中女生而言堪稱「文化衝擊」，彷彿一腳踏入桃花源般夢幻而緩慢的生活。但或許對於部落小朋友來說，見識到這群嬌生慣養、完全追不上自己腳步、「台北俗」的都市大姐姐，才是一種文化衝擊。

第二年開始加入的都市小朋友，為我們帶來許多新的火花與衝擊。雖然在高二時負責部落藝術家的紀錄片拍攝，下午取材、徹夜剪片、睡到中午，幾乎和其他人作息顛倒，與小朋友的直接接觸機會也較少，但從用餐時間的觀察、晚上例會大家的分享與討論，還是能略知一二。「城鄉交流」是協會的中心目標，但對我們這些大姐姐來說，都市小朋友的加入等於是同時「伺候」兩個小孩。在我的經驗中，雖然都市家長都是滿心歡喜送小孩來「成長」一番，但這些小公主、小王子大概也是第一次體驗到電腦、麥當勞、手機都非唾手可得的生活，各種不習慣就很明顯地表現出來。雙方小孩之間常常產生的意見不合，也讓許多「家庭」面臨崩解的危機。

高三那年，因為部落有些中生代居民嘗試結合傳統的狩獵文化，推出「獵人行程」，而我們幾個學測壓力剛剛解除、對野外生活完全沒有經驗的都市千金，就自告奮勇成為獵人行程的「試玩員」。由兩位部落獵人帶領，揹著帳篷、睡袋、生活用品，前往布農族的聖山——干卓萬山。那裏完全沒有步道、涼亭之類給「觀光客」用的舒適設備，只靠獵人們沿途砍著蔓生的野草開道，向我們介紹如何辨認可食植物和山羌足跡，也在一些特定地點用繩子架設陷阱。旅途中經過幾處狹窄山路與崩塌地形，光是我一個人就跌落了兩次，所幸獵人大哥們身手矯健，總是能在第一時間把我們推回正軌。原先只安排兩天一夜的行程，但在獵人大哥的「慫恿」下，硬是到了第三天才下山；而最初有些令人期待的「狩獵」體驗，也因為我們實在太「菜」了，獵人大哥索性在深夜自己出發，讓我們在第三天醒來出帳篷時，便有飛鼠迎接，以現煮飛鼠湯為行程畫下句點。

坦白說飛鼠並沒有特別好吃，而在我們之後，聽說還有一群政大的同學上山體驗獵人行程。但女性進入聖山當「獵人」（雖然並沒有什麼作為），實是觸犯部

落禁忌，也引發部落內部不少爭議，最後這項行程便不了了之；至今翻閱旅遊書，對於曲冰的介紹，仍只停留在「曲冰遺址」、「天使瀑布」、「有機農場」等部落附近的景點。「獵人行程」胎死腹中，或許反映了在地理阻隔、不均發展下，部落被都市領導的經濟結構排擠，難以在整個大社會的階級分布中流動。成本相對較低、可直接利用部落自然文化資源的「觀光」，或許是一種出路，但小則北一女高中生及其他「服務」團隊，大至未來開放後可能湧入的觀光人潮，部落的傳統文化和主體性，能否得到充分的保留和尊重？我想，在現今原住民地區充斥「歌舞秀」、「風味餐」等扁平的文化展現之外，曲冰居民亦是絞盡腦汁地尋找不同方向。「獵人行程」就結果來說或許不是成功的嘗試，但在部落內部的爭議、討論中，一道維護自身主體「邊界」的力量似乎正在浮現，這是任何外來者都無法加以「指導」、破壞的。

- 「城」「鄉」反思

每一年的到訪，都以部落傳統迎接貴客的「殺豬分享」儀式開始，但我們到底去部落「做什麼」？「做了什麼」？作為一群因為穿著綠衣服而被部落視為「老友」、充分信任的高中生，每一年都在重新反思「意義」的問題，我一直到今天都還是覺得很疑惑。

大四那年，因為高中同學突然的邀約，便以營隊顧問身分，和初生之犢的高一學妹重回曲冰，每天看著她們和小朋友跑來跑去，努力完成精心策畫的活動，時而歡笑時而挫折的樣子，彷彿又經歷了一次青澀懵懂的高一時光。也是在每晚老師、學姐、學妹促膝長談的反思時間，又重新提起我對「來部落」這整件事情的思考。

我們在面對城市學生與原鄉小孩交流的活動時，從最早期探險式的「拓荒隊」、到十幾年前如雨後春筍般興起的「山地服務團」，以至近年來高中、大學盛行的「服務學習」，在論述上，彷彿都還不脫一種自我本位的想像。不少學生在對部

落缺乏了解的狀況下，以社團長年傳承的「經驗」，撰寫看起來都很類似的「教案」，在學校裡由社團學長姐帶領驗收、籌備（中間自然少不了各種彰顯老鳥權威與菜鳥之菜的權力實作），一行人浩浩蕩蕩到部落，完成大多以一週為期的「育樂營」，經驗短暫的相聚、互動與離別。雖然一年固定舉辦一兩次，仍形成一種穩定的週期，參與學生也能從中獲得與日常不同的體驗，但對作為「服務對象」的在地兒童而言，在這些城市人一廂情願、與在地脫節的活動中，是否又一次次經歷了都市文化強勢的殖民？

對「部落服務」的批判所見多聞，但我還是覺得，單純把「來部落」這件事情，當成都市學生對純樸原鄉的剝削、進而將此剝削歷程轉化為個人生涯發展的勳章，還是顯得太過消極，彷彿學生辛苦準備的活動對當地只有傷害而無貢獻。我們在營期當中常常聽到孩子看著姐姐說「我也要上北一女！」，當時只當是孩子有了積極向學的目標，也是對自己言教身教的肯定，但我大四那年重回曲冰時，竟然與以前同小隊的小孩重逢，七年過去，他已不再是當年那個靦腆的小胖弟，而是長成英俊挺拔的少年，甚至考上了台中一中，趁寒假空閒來營隊擔任志工，協助活動進行。和他聊天時才知道，他至今仍清楚記得當年帶過他的兩位姐姐，這對我和後來知情的同學來說，都是莫大的鼓舞，但也愧疚於自己在離開部落之後，沒有持續參與他的成長。

回到「公共社會學」的討論，雖然我曾經參與過的這些團隊，不論是高中、大學，都在營隊籌劃時努力與在地合作，籌備期間和部落小學的老師、校長不斷溝通課程與活動內容，並嘗試結合耆老教授傳統技藝、簡單族語及歌舞，也要求隊輔用平等互惠的精神與小朋友互動，甚至邀請族人為我們導覽部落遺跡、實際走過新舊部落遷徙的道路，但總覺得侷限在都市與部落校園內部、以「部落小孩」為中心的設計，較欠缺與青壯輩、耆老等「在地公眾」的對話；到了大學，我在屏東莎卡蘭部落的實作，便積極地走出學校、「加入在地」，希望能攪動更大的社區力量。

走向社區：屏東·莎卡蘭

我們這群曾經一起去部落的高中同學，在升上大學之後，在學校成立了新的社團，也被分配到新的合作部落——屏東莎卡蘭。

「莎卡蘭」是口社部落的排灣族名，但我們實際接觸的範圍，是以口社國小為中心，該校學童分別居住的口社、馬兒、安坡三個部落。由於是初次接觸的新據點，在第一年暑假，為了先和部落建立起合作關係，我們籌組了田野調查工作隊，分為自然生態、部落文化和部落農業三組，我因為就讀生傳系，便擔任農業訪調組的小組長，和三位組員一起共事；工作隊的時間只有八天，而部落的耕地散佈在群山之間，一開始實在不知如何著手。好在有位胡爸爸主動來找我們聊天，在部落閒逛時又認識了小學生謝慎，透過農民間的社交網絡，我們才得以一窺部落農業的堂奧。

我們和胡爸爸及其友蔡爸爸一起探訪深山中的山蘇園，除了加建的簡陋工寮、羊圈之外，在原始林相之中很難看出「農園」的存在。蔡爸爸的山蘇多半直接賣到山下的飯店、餐廳，嫁到外地的女兒也協助架設網站，胡爸爸則是在退休後以種植芒果為消遣，兩位農民的經濟狀況相對充裕。但身陷傳統產銷結構中的農民，往往就顯得比較困窘。

謝慎的祖父柯爸爸是口社果樹產銷班的班長，同時也是前任村長與社區發展協會會長，某天早上七點，他開著廂型車載我們駛過曲折山路，探訪他引以為傲的香蕉園。柯爸爸採用有機肥料、減少農藥用量，但因為無法通過有機認證，且在香蕉成長期的十三個月內，只要有一次風災，加上市場價格波動，很容易血本無歸。如八八風災後至我們探訪時已經過兩年，流失的土壤仍然沒有回覆，嚴重影響香蕉和芒果的種植。和台灣其他地區的農業相似，口社地區的農產品價格亦受到大盤商多層銷售的剝削，而所屬之農會也因管轄範圍太廣，難以深入照顧每位農民，相關輔導不足，產銷班的幫助也相當有限。

第二年的寒假開始，我們便在大學校園內招收隊輔，舉辦部落營隊。不同於

高中時有大學隊輔、老師協助，面對自己的社團，眼前便成了一片行政事項的瑣碎。好在部落小學師長非常熱心，不但對我們的課程提供許多建議，也協助安排族語、歌舞、手工藝、技藝體驗的師資，讓我們能將數位教學與在地知識同時融入活動；營隊期間，學校從校長到替代役男更全員投入支持，我們「對話」的對象，少數時候反而變成強勢的都市家長。

「一條網路，一條道路」是協會的重要理想之一，也是我從高中到大學一直被灌輸的理念；然而，就如同所有的道路一樣，網路為部落開了一扇門，讓地理形勢較為封閉的部落，可以透過虛擬世界，使新的資訊、科技得以流入部落，但對小孩而言，網路的大量使用（特別是遊戲和臉書），也讓不少孩子成天沉溺在部落唯一或唯二的網咖、謊報生日申請臉書帳號，經濟狀況好一點的，甚至拿起了智慧型手機。正如我們無法阻擋小朋友接觸各種未經篩選的網路資訊，都市文化對部落文化的入侵更隨著網路一同擴張。

由部落都市化的角度，我不禁思考，那個我心目中想要為其付出、甚至保護的「部落」，是否只是我自己一廂情願的浪漫想像？小孩們升上國中，終究還是隨著早上六點準時從雜貨店出發的校車下山，到了高中時，更有不少人選擇舉家遷往都市。如果他們終究無法避免成為「都市原住民」，在小學階段介入的我們，到底要讓他們看見什麼樣的世界、什麼樣的自己？

我想到之前修習劉華真老師「發展社會學」時讀到的「互惠」概念。這是一種建立在情感、信任、對等關係之上的交換，我心目中理想的「部落活動」（而非由上對下、出於某種善念施予的「服務」）也應該是這個樣子，透過開放、對等的活動平台，讓不同年齡、文化的思考都能互相交流激盪。只是，城—鄉之間與志工—小朋友之間—長久以來存在的不對等關係，每一個進到部落裡的人都必須時時反思。

機構實習的初次挑戰：埔里·原促會

● 重訪埔里

升大四的暑假，惠敏老師開設「公共社會學暑期實習」課程，看到機構名單中的「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簡稱「原促會」），馬上很興奮地查詢相關資料，發現它是偏向跨部落統籌的單位，同時處理產銷和社區發展的議題，剛好和我的科系專長與興趣相符。而且因為在部落營隊、部落地方文史記錄的實際經驗中，看到一些架構完整、努力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的在地組織，也看到一些部落因為人口外流、產業蕭條，無力推動部落發展的狀況，而有些部落由於地處偏遠，和都市地區的消費者千里之遙，產生許多產銷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若要透過網路平台行銷，部落在地的培力、消費者教育和產銷管道設計都缺一不可。我希望可以藉由實習機會，把視野放大到整個原住民部落發展的面向。

高中畢業很久之後再次經過彎彎曲曲的台十四線來到埔里，辦公室位在安靜的住宅區內，但從辦公室到二樓的宿舍，有浴室、廚房，生活所需的設備一應俱全，最好的是，上班路程只要十秒鐘！這對不時會睡過頭匆忙出門的我來說，簡直是一大福音。我的宿舍房間位在二樓角落，裡面陳設很簡單，因為住在對門的惠雯學姐經常在外工作，仔細算算我在埔里度過的夜晚，幾乎只有兩天不是獨守辦公室。

第一個晚上就可以感受到埔里的好。冰涼清甜的水、晚上不用開電風扇也相當涼爽的天氣，第一天下班後，辦公室秘書阿純姐⁷便騎車帶我熟悉環境，隔天和實習夥伴仲皓借了腳踏車，搭配一張地圖，自己就可以在埔里市區趴趴走了。

原促會可以說是原民會的民間單位，五花八門的公部門計畫案構築起這個單位的運作。第一天的會議中大概了解現行部落 e 購、活力計畫、農村再生、部落市集等專案的施行狀況，也確定了接下來的實習走向：完成五個標竿部落的社區營造深度訪談和報導。其中安坡因為大學期間曾在此參與營隊活動，是我比較熟悉的部落，司馬庫斯則是在課堂上討論過案例，我一直很想實地走訪，遂成為最

⁷辦公室人名使用化名

後的選擇。

- 新手上路

實際上的實習經驗，卻和我當初的預想落差非常大。一方面因為擔任督導的惠雯學姐過於忙碌，無暇為實習生安排比較明確的工作方向，一方面也是辦公室同仁雖然身兼多項專案，工作卻難以切割。我們每天在辦公室最固定的工作，就只有早上將公文彙整登錄。第一週的適應期過得很快，第二週便開始隨同仁到桃園竹頭角部落訪視、到南港展覽館賣葡萄。

訪視是「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輔導計畫」中很重要的一環，由原促會承辦人、縣府人員及陪伴顧問，定期到部落聽取進度簡報、觀察執行情形並提供建議。這天早上六點，我、實習夥伴必修加上兩位同仁在辦公室集合，大約十一點多到達以泰雅族人為主的竹頭角部落。

本次重點是部落誌和樂舞觀光的進度，部落誌蒐集了一些神話故事、遷村歷程，還有珍貴的老照片，期待完成後能使原住民研究更加豐富。另外，目前部落推廣傳統樂舞的作法，是把傳統的打擊樂器固定調性，試圖發展出比較有組織的合奏樂，也請來音樂系老師訓練，以簡譜的方式保留一些傳統古謠，也有流行樂的改編。當西方樂理遇上部落音樂，也是一種「學院—公眾」的對話，用西洋音樂的教學方法來「教授」部落傳統音樂，雖然有機會讓部落樂舞透過這樣的「理性化」過程，變成一套更有系統的知識技藝，卻破壞了原本以口傳、實地操演為主的音樂傳習方式。

實習期間，在資策會計畫下，我們受邀到南港軟體園區商店街的臨時市集展售葡萄，這也是我實習中的一大活動。我們和台北辦事處的同仁合作，提供由豐丘 (TOYOKA) 部落的布農族農民生產、無農藥殘留的巨峰葡萄試吃並推銷預購。

剛開始時，我們即便在川流人潮中，努力宣傳「TOYOKA 的巨峰葡萄，歡迎試吃噢！」還是乏人問津，甚至很多人拿了葡萄就匆匆離去，所幸後來人氣有稍

稍回升。光顧者以女性為主，大概都是中年媽媽，也有一些二三十歲的「小資女」感到興趣；男性部分則是以中生代居多。大家最常見的問題是「這個可以直接吃嗎？」，最多的讚嘆是「好大顆！」。但詢問細節的人大概不到三分之一，我們只好在客人試吃的時候就連珠砲般地把產地、品種、甜度、價格、優惠方案一口氣介紹完。幸好最後業績還不錯，一日的「葡萄西施」也可說是有點貢獻了。

實習的最後一週，期待已久的司馬庫斯採訪終於要成行！因為從台北出發比較方便，加上中間要去南港軟體園區再做一次葡萄展售，我便提早離開埔里，回到台北家中進行前置作業。幾週以來，我花了不少時間蒐集、閱讀相關資料，也將訪談計畫寄給辦公室、司馬庫斯秘書，希望能得到一些修改意見。然而，就在第二次的南軟市集結束後，我回家致電辦公室詢問隔天行程，卻得到計畫必須暫緩的答案，而對於我已經整理一部份、想要完成以後提供給辦公室的相關文獻，他們也回答：「不需要」。結果因為各種協調上的問題，我的實習就這樣草草結束了。

在部落相關社團打滾這麼久，我第一次進入實際進行部落營造的組織，一方面遇到了更多對部落充滿熱情、願意持續服務的人，一方面也看到現有 NGO 組織仰賴政府專案來養活自己。原促會每一個員工身上往往背負兩三個專案，每天沒日沒夜地跑部落、趕報告，這不只是責任制，更以一種幾乎是自我剝削的方式在工作。因為我就住在辦公室樓上，常常可以看到同仁出差一整天回來以後，還得加班到半夜，工作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我進原促會的時候，剛好有三位年紀相近的新進員工，但到後來都陸續離職另尋出路，我想或許不是因為他們太「草莓」，而是要換個方向，思考 NGO 本身面臨的侷限，以及些限制對於其中工作者生何種影響。

而以原促會而言，雖然只是成員近十人的小組織，卻執掌了幾乎是全台灣的部落營造工作！或許，以部落營造而言，在比較小的地理尺度上，各地有自己的小組織，針對在地事務運作，會比較好的方式，但就像公司一樣，不努力接案

「積累資本」，很難讓組織繼續維持下去，因而擴大經營似乎是難逃的宿命？不過，原促會並不是沒有進行別的嘗試，比如「部落 e 購」就以類似「大王菜舖子」的「CSA」（社區支持型農業）模式，加上參與彎腰生活節等市集擺攤，試圖發展成類似社會企業的模式，目前也有一定銷量，但要支持整個組織的經濟基礎，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的努力。

都市原住民托育機構的小實踐：五股・伯特利

與伯特利的相遇，是在大四「公共社會學」這門課上，同學柏宏剛好在該處擔任課輔老師，上課時提到了這個都市原住民托育組織的案例，讓從來沒有接觸過都市原住民的我，只讀過一本社工專業的論著之後，便懵懵懂懂地跟著進到教室裡。

伯特利位在五股成州工業區一帶，從公館出發需要搭捷運到蘆洲站，再轉乘往五股的公車；過了成蘆大橋後，便是一片工廠林立的地景，伯特利位在小小的商業街區上，一開始是來自屏東的傳道士秋月老師，因為教會活動，連結了五股地區以屏東大武魯凱族人為主的都市原住民族群，後來便轉而成立托育機構，教師也都是青壯輩的原住民女性。後來，至善基金會引入各種善款和捐贈物資，也透過網路宣傳，讓伯特利在社會上得到不少關注；我在伯特利的幾個月間，就曾經接過童書、衣物襪子等資源，後來伯特利為了達到政府立案的標準，對室內環境進行大幅度改造，也增設了一間小小的兒童圖書室。

伯特利的孩子們雖然年齡從一歲到國中以上都有，但都以一種原鄉部落「共同照顧」的精神被教育；以幼稚園小孩為例，在用餐以前，老師們都會讓大班生牽著幼幼班的「學弟妹」去洗手，延續原鄉習慣的混齡教育，成為伯特利的一大特色。

這裡的小學生大多就讀成州國小，校內有大量原住民學童，因而秋月老師每週都會有幾天早上到小學為孩子上母語課；放學時刻，低年級由老師接送，中高

年級則自己走向伯特利，不少中高年級小孩會在路上買飲料、餅乾當點心，寫作業的時候，在老師視線未及的桌子底下，便不時有「姐姐，我要吃餅乾！」的「內線交易」。根據我粗略的觀察與估計，伯特利大約有五十位國小以下的小朋友，其中幼稚園包含幼幼班到大班約有二十位。因為我多半是週間白天到伯特利去，全天都能接觸到的「公眾」，只有不用上學的零到五歲小朋友；為了不干擾原本安排的課程，和老師們溝通後，決定安排我在幼稚園小朋友的上課時間，白天先跟著上課，下午幫忙檢查三、四年級小朋友的作業，到中間的點心時間，再讓我自由設計活動給幼稚園的小朋友。幼稚園小朋友一日行程大概是這樣的：

| 時間 | 小班到大班 | 幼幼 | 我的活動 |
|-------|------------------------|---------|-------|
| 7:00 | 陸續上學（秋月老師 7:30 到國小教族語） | | |
| 8:30 | 開場，禱告、寫日期和天氣，洗手、吃早餐 | | |
| 9:00 | 分到不同教室上課 | 自己思考、玩 | 跟小班幼幼 |
| 10:00 | 玩積木、跳舞、跑來跑去跳來跳去滾來滾去 | | 姐姐時間 |
| 11:00 | 洗手、吃午餐 | | 餵食時間 |
| 12:00 | 午休，小學生回來吃午餐 | | |
| | 幼稚園 | 小學生 | 我的活動 |
| 15:00 | 上課／自己思考、玩 | 寫作業、評量 | 姐姐時間 |
| 16:00 | 「視聽」、點心時間 | 吃點心、寫作業 | 幫忙改作業 |
| 17:00 | 放學 | | |

由於面對的「公眾」是三到五歲的幼稚園小孩，我一開始就沒有要「做大事」

的打算，而是希望能透過「一起玩」來達到寓教於樂、公共實踐的效果。有別於先前帶小學營隊必須有縝密的「教案」，全體成員反覆討論、演練活動的流程和玩法，這個沒有計畫、單純「一起玩」的過程，幾乎是完全開放「公民自決」，讓作為參與公民的小朋友自己討論要講什麼故事、由誰先開始講、用什麼樣的順序輪流一人說一段……每次遊玩都成為全新的互動嘗試，其中不難發現居於領導地位的，往往都是年紀稍大的女孩子，而最大的反抗動力往往來自最小的那群人，正因他們「不懂規矩」，有時反而可以扭轉既有的權利秩序。

後來，我從生傳系學到的「食農教育」出發，設計了一套鬆散的飲食教育計畫。我從伯特利的藏書中，挑選幾本與食物有關的故事讀給小朋友聽，雖是童言童語卻對孩子們非常有說服力；後來又看到了小時候讀過的繪本《媽媽買綠豆》，便一時興起，決定和小朋友們一起孵豆芽。

不知道是不是天性使然，當小孩們看到比自己還要小的「豆芽寶寶」，或多或少都萌生了一些母性和父性，特別是稍微大一些的小女生，還會像個小媽媽一樣將裝著綠豆的瓶子揣在懷裡，叫它們要快快長大。綠豆必須在陰暗的地方才會發芽生長，和老師協調過後，決定先放在教具櫃內，每天再定時讓小爸爸小媽媽們澆水探視。

由於故事時間正值廚房媽媽準備午餐的時候，有幾次便直接借來食材，讓小朋友撥開高麗菜的葉子、捧著沉甸甸的南瓜、摸摸玉米的鬍鬚、把雙手伸到白米堆中聽米粒落下的聲音，這些對幼稚園小孩來說都是很新鮮的體驗。雖然他們自從入園開始，就被嚴格教育要愛惜食物、不可以有吃剩的飯菜，而且食材本身，或者我能對這群「公眾」使用的「幼兒語彙」都有限，但認識了午餐的「源頭」，我想除了單純的「珍惜」之外，多少也能激起一些對飲食的新鮮感和好奇心吧！

在「食育小計畫」的尾聲，便準備了一疊圖畫紙，希望讓他們畫下「自己最喜歡的食物」。在開始之前，他們各自分享了自己最喜歡吃的東西，一位具有領導氣質的大班女生率先舉手答道「青菜！」，之後統計三到五歲的前三名分別是

蘿蔔、高麗菜和米飯，或許也是他們生活中最常出現的食物。原以為伯特利的孩子在飲食偏好上真的比較「天然」，但在第一個人喊出「洋芋片」、「蛋糕」之後，幾乎呈現全班倒戈的狀態，想是他們也慢慢知道什麼是老師期待中的「標準答案」，只是還沒辦法把自己真實的心意隱藏好而已。

原以為這個繪畫活動會像平靜的美術課一樣，但如廣告中所言，「想像力」果真就是孩子們的「超能力」：

「我可以畫玉米寶寶嗎？」

「我可以畫一個人在煮飯嗎？」

「我可以畫棒棒糖嗎？」

「我只會畫餅乾……」

管孩子的幻想總是無邊無際，從中還是可以看出來一些早期性別化的痕跡，比如說同樣喜歡甜食的小男生和小女生，男生往往將蛋糕堆疊成一層層的城堡，從中伸出砲管來場大戰；女生則有人畫了美人魚上街買菜，棉花糖是浮在空中的雲……，畫到一個階段以後，大家開始彼此七嘴八舌地交換意見，於是美人魚的家也長出手槍、畫面空白的地方開始填上許多可樂與漢堡。

或許他們尚沒有辦法用言語精確地描述「飲食」這件事情，但於他們而言，食物不只是滿足口腹之慾，更是無限的想像空間。繪畫活動結束後，小朋友們紛紛說想把自己的作品帶回家給爸爸媽媽看，若是這股童心也能找到個安放、成長的所在就好了。

孩子的成长究竟能不能「等」呢？對比我之前曾在大安區某安親班面試小學日文教師，與家長互動的經驗，伯特利的孩子幾乎很少有在「菁英家庭」中，三歲開始補習學鋼琴、學英文的行程，而是花不少時間大家一起跳舞、堆積木、跑來跑去。看似大量的「留白」，反而在都市忙亂擁擠的生活中，找到一方如原鄉開放、自由的空間，讓孩子發展出自己的遊戲，從中自然學習與人的互動、團體行動的規則，亦未嘗不是件好事。伯特利也讓這些家庭生活可能不甚完滿的小孩，能在擁有一群一起嬉戲，像兄弟姐妹一樣互相照顧的朋友，成為彼此的一點依

靠。

只是，伯特利做為一個都市原住民的照護機構，其特殊性也受到相當的關注；但我在整理捐贈物資的時候發現，通常對方的「好意」並不盡然適合真正的需求，而介入者來來去去、媒體反覆報導，是否孩子們也被變相地消費？

呼應到前文對「部落服務」的思考，我在伯特利印象最深刻的，是秋月老師說「我覺得我們現在已經很好了！」在城鄉不均發展的結構下，作為都市「天龍人」的我們，往往習慣用自己覺得「好」的標準強加於他者，而忽略「了解」才是所有互動的第一步。而這種對於「了解」的渴望，以及對「行動」的期待，也或多或少影響了我之後的升學選擇。

新的啟程：台大·城鄉所

延續這股對於鄉村、農業、城鄉關係的熱情，也想在實作之外，為自己累積更多的理論基礎，在大學畢業以後，我便進入（至少在名字上關聯最密切的）建築與城鄉所就讀。當時在準備研究所甄試的時候，城鄉所與社會所曾經讓我猶豫許久，最後選擇城鄉所的原因，一方面是自忖能力不足以通過社會所甄試的激烈競爭，一方面也是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我還一直處在三心二意的狀態。

在城鄉所的第一年，我參與了萬華「三水樓」與坪林「臺灣藍鵲茶」兩項社區行動，前者是實習課以萬華為基地，與支援流浪者的在地社工組織「芒草心」合作，透過房屋空間改造、引入活動，建立起一個弱勢者的「自立支援中心」，這個「以小博大」的嘗試，到後來開展出了名為「街遊」的街友導覽，芒草心也持續拓點、擴大服務範圍；臺灣藍鵲茶則是以社會企業的概念，協助茶農以友善環境的方式耕作，並以公平的價格收購、向都市消費者推廣環境保護的理念。

從高中以來，我的「公共社會學」行動及嘗試中，作為行動與對話標的「公眾」，並不是在經濟、資源不平等的結構下，被貼上「部落小孩」、「社造者」、「農民」等粗略標籤的模糊面目，而是一個個有著生動表情、確實活出自己的「人」，因而更多時候是我在學習他們的生命經驗與思考、在反思之中學習怎麼「做一個

人」。

要先成為「人」，才是一個社會學徒，才是一個公共的實踐者。社會學教我們觀察、分析和理解，也正是在看似基本的「同理心」與人文關懷之上，我們才能珍視每個對象身為「人」的主體與價值，從行動中不斷自我反思與觀照，在「公共」的思想世界裡，看見自己的位置。

彭婉如基金會：一段公共托育與反思之旅

根據教育部統計數據，台灣的公私托育園所比例為 3：7，懸殊相當嚴重。這樣的比例將造成大部分幼兒無法進入公立幼兒園，使家庭必須負擔高出許多倍（3 倍以上）的學費就讀私立園所，這樣的情況間接地導致生育率低瀾。另一方面，在教保產業中，工作者面對低薪（月薪一萬八至兩萬三不等）、低成就、低保障的惡劣勞動環境，使得此產業有沒落的趨勢，幼兒教育系因而轉換為兒童福利與家庭照顧學系或其他相關輔導學系。簡言之，不論在家庭負擔或教保人員勞動條件上，台灣現今的產業現狀，皆是有極大的改善空間。

各方人馬面對這個問題，百家齊鳴地提出解決之道，而在這裡，我們將主要說明「托育公共化」之理念，並闡述其被提出的理由以及如何藉此改善托育整體環境。

為了減低民眾的負擔、提供更多元的托育選擇，民間團體（如彭婉如文教基金會）以及部份學術界教授提議，推動平價、受政府依法監督、有品質保證的托育園所，促成托育公共化。而所謂的「公共化」，可以是公立幼兒園，也可以是「公辦民營」或「非營利園所」型態，另外，有理念的私立園所也有成為「公共化」中的「非營利園所」的可能性。在理念的層面，公共化意指「養兒育女不再是家庭獨自的責任，而是整個社會的責任」，於是公共托育計畫透過公共資源的挹注，期望可以營造出更友善的扶養孩子的環境。

再者，面對產業的勞動條件惡化，許多人可能會問「明明幼兒園學費日益高漲，那為什麼教保人員的待遇卻反而惡劣化呢？」，而這便要回到雇傭間的不動等關係。在市場惡性競爭的狀況下，資方為了維持利潤，必定先損失基層勞動者的權益，例如：壓低教保人員的薪資以平衡成本收益。而托育公共化強調的是整體改善的環境：透過訂定人性、友善的工作契約，重新定義教保人員的勞動價值，

使教保人員得以重獲自身勞動尊嚴，以升教保產業的工作意義。

一段公共托育之旅

彭婉如基金會引入「托育公共化」概念，強調「照顧孩子」不僅僅是一位婦女或一個家庭的責任，應該是整體社會共同承擔。於是成立「社區自治幼兒園」，例如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作為非營利幼兒園，試圖在較為低廉的費用下，提供更多家庭照顧的協助。「幼兒照顧從社區自治開始」是一個新的概念，也是根本性的作法，讓年幼的幼童就讀在地社區幼兒園，不用舟車勞頓由娃娃車跨區接送，如此一來可以減少通學過程的意外及費用負擔。而社區自治幼兒園期望以社區共管的力量，結合社區資源進行幼兒托育服務方案、安全共治、健康營造、弱勢扶助等等，營造一個安全的社區托育服務機制，讓幼兒平安健康長大，並提供社區公共托育服務。

反映台灣現況下的問題，彭婉如基金會認為，社區自治幼兒園可有效矯正過去數十年政策所造成之學前托育高度營利化、目標偏差、工作人員受嚴重剝削、地域及階級差距過大等弊病，而達成妥善照顧並教育每一個學齡前兒童、支持家長就業、保障服務者權益之多重目標。唯有建構社區自治幼兒園，推動托育照顧公共化，才能平價、普及社區化的照顧幼兒，減輕家庭托育負擔。這便是承辦幼兒園等行動的初衷，社區自治幼兒園可能提供不同的托育可能性，也讓我們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在我們實習的期間，走訪基金會接手的公共托育單位，以下將以「公共托育之旅」的形式，紀錄我們實習過程中的所見所聞。

- 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

位於高雄市鳳山區的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是以非營利、社區化且平價的方式，提供一個安全健康的托育照顧與教育環境。

幼兒園座落於社區之中，由多種灌木圍起矮小的圍牆，降低與社區隔離的距離感。走進園區，便可以看到一片提供騎腳踏車的空地、城堡般的遊樂器材以及小朋友最愛的小山丘。幼兒園分為三班，每班約 20 人，各由兩位專業教保人員帶班。

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以「同村共養」的理念照養孩童，每個人都是村莊中的一份子，彷彿回到舊有的社會般的彼此關係、彼此協助。第一天實習，早早的到達園區，準備好參與在這個社區生活了噢！進園所的每日要務是小健康檢查：測量體溫及注意是否有腸病毒，並且每個人的手都將噴上酒精，以避免病毒入侵園區。五甲許多家長會陪同小朋友一起進入園區，整理書包、與小孩在園區玩耍，也與老師一同照顧孩子們安全。在這樣的氛圍下，家長很容易認識其他班的小孩子及其他家長，而建構出有交疊性的人際網絡關係。進而，家長彼此之間也可以有互助的行為，例如有一天，可貞的媽媽帶著浩洋一起來上學，這給了我們大大的驚喜。

與小朋友的相處其實也不全然幸福、夢幻。對於小孩子，什麼事都不能用常理去推斷，簡單的原則與常識也都不是這一回事。在進班的實察中，陪伴小朋友日常生活的上廁所、洗手、擦臉等行為，而須注意有沒有分心的玩水、玩泡泡，或是排隊的時候有小糾紛等。另外，最重要的生活行為—喝水(有規定一天一定要喝一壺水，故有固定時間叫小朋友喝水)，更有許多突發狀況，如小朋友喜歡用手伸進去杯子裡玩水，或潑溼其他小朋友的衣服。在五甲，園所致力於讓小朋友有責任心、自己來(大人僅只是協力)，所以儘管簡單事情變複雜、快的事情要慢慢做，但是都是培養孩子能力的開放課程。

幾天完整的實習中，我們深刻體會到基層現場教保人員的辛苦。教保人員並不是一個輕鬆快樂的工作，需要極大的情緒與體力勞動付出。教保老師們幾乎什麼都會(美工、演戲、健康、自然、正音、唱歌、跳舞等等)，也必須定期的進修、參加研討會，這都是從前我們所不知曉的——原來教保人員更是賦含專業的勞動

者！見識了教保人員的專業後，不知不覺地升起敬佩的情感。在吵吵鬧鬧的每一天，不但要照顧、記錄小朋友的狀態，更要輔以課程激發大家的創意與想像力，尤其在沒有特定紙本教材的五甲，尚須規劃各式各樣的活動。教保人員對孩子成長的貢獻相當大，不但提供一個適切的發展環境讓小朋友成長茁壯，更要與家長、園所有相對應的互動。於是，我們開始漸漸關心教保人員權益的問題，並且開始觀察社會對教保人員的印象與想法為何，而這些想法又對教保人員造成何種實際影響。

傍晚放學時間，我們也達成了期待—「小朋友拉著我們的手去認識家長」。其實我們相當希望認識家長，但不論是透過老師們的介紹或我們自己的毛遂自薦，都有刻意的不自然感；反之，由扮演橋梁的小朋友做為媒介，是最親近、不做作的方式。儘管只有與家長短暫的聊聊，但也是建立了友善關係的好開始。

五甲的課程規劃十分有趣，有兩天的課程是請到高師大性別所的老師及學生來說故事帶活動，讓小朋友接觸到性別議題。我們對於這樣的安排相當驚訝——這真是一個非常好的課程安排！回想自己的成長經驗，我們都是在國、高中才開始些許接觸的性別相關課程（而且往往不太精實），但是五甲居然有如此貼近幼兒園小朋友生活的性別課程。課程以說故事、玩活動的方式帶來許多性別平等的基礎觀念，例如女生不一定比男生弱、男生也可以玩洋娃娃等，這種方式使小朋友的性別友善概念從小紮根。除了小朋友之外，其實那兩天的課程也讓我和老師都受益許多。

除了性別課程之外，另外，我們也協力主辦了畢業生回娘家的活動，藉此希望可以了解畢業生在小學生活的狀態。我們與歷屆畢業生一起看公視的紀錄觀點（主題探討從小學英文對未來的影響），藉此討論幼兒園教學性質的差異對小朋友上小學後的影響。這次有九位年齡分布由小四到國一的畢業生參與討論，討論後初步發現，五甲畢業的孩子在往後的課業上並不會有落後的問題，而在人際相處面向，則似乎更願意付出與幫助班級事務。

漸漸習慣五甲的生活作息之後，我們反而有點捨不得離開了！因為五甲總是會有很善良很有趣的老師、實習生，以及小朋友。對我們來說，與其說五甲是一個幼兒園，不如說是一個獨立於高度競爭社會的桃花源。這裡的步調不快，但是人們總會停下腳步、回過身，帶著其他人一起前進。

- 鳳山社區自治幼兒園

鳳山社區自治幼兒園位於五甲多功能活動中心一樓，基金會於 2012 年 12 月接館營運。甫營運五個月的鳳山是從居民向政府提議開始的，由於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的教學及互動模式得到許多居民、家長的認同，於是在大家的力量下，基金會得以在鳳山拓點。

其實要即將離開五甲的時候，我們有點不捨，畢竟已經習慣了五甲的生活步調，輕鬆、歡笑、簡單、溫馨。我們既期待又有點害怕地踏入鳳山幼兒園，試圖去掌握裡面的生活。不過由於之前已經待過了一個幼兒園，自己對於幼兒園的基本運作已有一定的認識，所以，我們應該是帶點基礎、又有點無知的進入鳳山幼兒園吧。

在進入鳳山幼兒園之前，其實已經對於鳳山充滿了許多想像，這些想像大多是從先前的五甲經驗而來，我們想像鳳山也擁有廣大戶外空間、小朋友在戶外跑跑跳跳。不過當我們真正進到鳳山幼兒園時，才發現其實跟自己想像的不一樣。自己必須重新調適、重新以新的態度與心情進入這個環境，感覺到自己必須改變以面對不同環境，而不是期望環境一成不變地來適應自己。所以，此時我們要求自己馬上重新適應環境，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融入這個環境，而非花太多時間「想東想西」。

在鳳山，我們真正的體察到除了安撫小朋友的情緒外，教學規劃與呈現方式同樣挑戰著幼保老師。如同看似簡單的角落教學，在我們閱讀《角落教育的介紹與原則》後，才真的了解身為老師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何引導小朋友有效

的自主成長。幼兒教育，是相當困難且非常需要老師豐富、專業的經驗。除了教學之外，幼保老師要負責掃地、拖地等繁瑣又反覆的勞動，往往在一天內便拖了兩次地、用漂白水擦拭全數桌椅與櫃子。或許有些勞務是可以與小朋友一起做的，例如掃地、擦桌椅及盛餐等等，一方面，讓孩子可以學習日常生活各種技能，另一方面，可以減輕幼保老師的負擔，讓老師有更多時間與力氣去照顧孩子們。

而在幼兒教育的過程中，家長的意見與配合也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有些小朋友在家裡被寵得太嬌氣，遇到學校中各種不如意的事，就哭著要找媽媽，而非自己想辦法。因此，幼兒園必須與個別家長有頻繁地聯繫與互動，進而一起營造整體友善環境下的教育氛圍。

在星星班，有位新進的幼保老師—小惠，小惠老師原本在私立幼兒園服務，但是後來決定來到非營利幼兒園。小惠老師與我們幾乎是同時進來鳳山幼兒園的，於是我們聊了許多，她也分享自己轉變路線的經驗。相較於鳳山社區自治幼兒園，私立幼兒園以教材、習作簿為主要的課程內容，給定了標準答案，反而拘束了小朋友的想像及創造力。老師發現部分小朋友不太能適應這樣的教學方式，導致上學對小朋友而言成為一件不快樂的事。彭婉如基金會理念為實行目標的鳳山自治幼兒園並沒有現成的教科書，而是透過教學現場的環境營造，讓小朋友可以自由地摸索與思考，在這樣的學習活動中，孩子們不但快樂學習，更是有意想不到的創意展現。由於這樣的體悟，小惠老師決定嘗試新的方式，因而來到鳳山。

我們經常看到小惠老師在做筆記、規劃與準備稍後的教學，除了可以觀察到她的融入與進步外，也覺得她著實把原有作法拋下，不斷嘗試新教學方式。或許如小惠老師這樣的幼保老師，在教學模式的跑道轉換時，應該都是遇到相同的問題，而這時候最重要的除了老師自己的決心外，更需要整體幼兒園的協助。

鳳山幼兒園和五甲很不一樣，由於是與社區活動中心結合，所以幼兒園的範圍是整個社區活動中心的一樓，樓上有許多弱勢群體、老人的照護所。一進入社區活回動中心的大門口，便會看到幼兒園的辦公室，左邊是給早上早到的小朋友

玩樂的室內遊樂場，右邊則是幼兒園的教室（一共有三間）。鳳山幼兒園的三間教室是各自分開的，分別為幼幼班、小中班混齡、中大班。總體來說，鳳山幼兒園的玩具、硬體設備都比較新，也許因為是新開幕的幼兒園，因此環境比較明亮，也增添了不少現代感。不過在空間規劃上，也許是因為三個教室彼此分開的關係，三個班的小朋友互動都沒有五甲來的熱絡，五甲幼兒園每到下課時間，不同班級的小朋友都會走出教室，共同在戶外玩樂。鳳山幼兒園則是因為離戶外玩樂區有些距離，再加上共同活動的空間的不足，所以三個班級平常很少有一起互動的機會，班級之間的聯絡比較沒有那麼熱絡。

此外，鳳山的小朋友家境以中產階級家庭為主，因此，運用語言的能力比五甲的小朋友還要好。不過雖然鳳山幼兒園的小朋友比較會運用語言，但是有些時候會比較容易亂跑、不遵守規矩，給人有一種小聰明的感覺，我們常常又生氣、又覺得他們很可愛。而或許是因為鳳山幼兒園班級教室空間較大的關係，一個老師往往比較難顧及全部的小朋友，所以有些小朋友如果在擾亂秩序的當下沒有受到糾正，之後就會習慣如此，很難再矯正回來。

在鳳山幼兒園跟小朋友互動的日子，有時候會被他們弄得有點生氣，但是又自知不能太兇，或以「太講道理」的方式跟孩子溝通，因此，我們遇到了很大的難題：就該如何與小朋友溝通？在進到班級的時候，老師問我們是不是社工系的學生，或有沒有修過青少年心理學相關課程，只能笑笑的回答自己是社會系的學生，對幼教這個領域不是很熟悉。當下，只能不斷反問自己在這個情境中的角色是什麼？沒有幼教背景，更不是社工專業，來到這個地方究竟自己可以派得上什麼用場？很可惜的是，那時似乎沒有想出一個比較可以說服自己的答案，只能默默地繼續下去。

在和小朋友們一起製作由襪子人偶的過程中發現，小朋友們非常有創意！做出許多我們可能一輩子都設計不出來的特殊玩偶。每位小朋友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也有自己特別的製作方法、理解方式。當時覺得小朋友都好厲害，他們的創

意比起我們還要多了許多！也或許是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因為現行的教育模式使我們原生的創意不斷受到打壓吧，總覺得鳳山幼兒園小朋友的創意真是人類天生的純真本質！我們心裡由衷的希望，這些小朋友能在成長的過程中保有這一些獨特的創意，以及對創作天生的熱忱，希望他們不要在制度、結構的擠壓下喪失這一些與生俱來的美好東西。

- 前鎮愛群社區自治托育資源中心

愛群社區自治托育資源中心取經於瑞典的社區家庭中心。「你不會孤單地成為父母」，斯德哥爾摩市家庭中心社工員簡單地道出瑞典托育及家庭環境的魔法，不同於台灣及其他已開發國家，在瑞典，養兒育女是國家與父母雙方的共同大事。透過提供全面性、家庭友善的福利政策，以及普及、人均可負擔的公共托育制度，瑞典維持生育率約 1.9 的完美人口替代率。瑞典總共有 13 所社區家庭中心，並皆附設了開放幼兒園，數量依當地人口及需求編定。社區中心提供的四大服務有：女性健康(產檢等等)、小兒健康(BBC)、小兒托育(開放幼兒園)及社工。另外，也有準爸媽的預備課程的教育，男女雙方必須共同積極參與，這也展現了瑞典較為平等的性別關係。此外，幼兒照顧也是有友善分工的機制，教導家長如何與小小孩溝通。

在這樣的前提想像下，愛群中心是台灣第一個以瑞典社區家庭中心為模板所設計的具體案子。期望由此可以創造對家庭更友善的環境與資源。位於愛群國小的後門的「前鎮愛群社區自治托育資源中心」，是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協辦，主要服務對象為有 0~6 歲小朋友的家庭，提供安全、舒適的空間給小朋友與家長使用。

不斷想像以瑞典社區家庭中心為藍圖的愛群現在以及未來會是什麼樣子，終於，我們要來拜訪「尚未開發的」的愛群了！愛群中心其實還沒開幕，一切將從零開始，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很期待不同的體驗與學習，也希望我們或多或少能

為愛群的規劃幫上一點忙。

來到愛群中心的第一天，在稍微整理出來的臨時辦公室，三個實習生及五位姊姊們，在些微有「人氣」的空曠空間中，各自做各自的工作，共享著一同努力的氛圍。在愛群的6天，我們幾乎都在勞動，包含漆油漆、拖地、掃地、種花、澆水、搬桌椅、洗積木、整理教具及組裝童用小廚房及工作桌等等。這些工作，代表這個中心真正「從零開始」，以及後續一步一步持續完善。我們滿心歡悅的組裝各個小東西，也希望未來來家庭中的小朋友們可以感受到我們的心意，在這裡安全、快樂地玩耍

除了勞動的時間外，我們還籌備了「小志工培力營」的活動，招募附近放暑假的小朋友一起來中心幫忙。誰有能力做小志工幫助別人呢？小朋友就可以！最初開始興高采烈地規畫時程，我們設想了許多整潔勞動及穿插的遊戲，設法讓勞動與遊戲做連結。但後來與簡老大討論後，整個大修正我們的提案。與簡老大討論的過程中，我們才真正理解營隊的初衷與目的。營隊顧名思義是為了「培力」小志工們，更重要的是，要讓孩子不斷回來——不論暑假或是開學後的周末時段，都能持續回來當志工。這四天的營隊不是僅以豐富課程與活動支撐，更希望將人(小志工)、地(愛群中心)、事(各活動及未來的開幕後營運)三者連結，建立愛群新社群。

我們於是將小志工的活動融入我們日常的勞務工作，活動設計不是只追求多采多姿、吸睛效果，而是要真正的「做事」。小志工們的年齡由幼兒園大班至小學五年級皆有，大多是附近的居民或五甲幼兒園的畢業生報名。儘管都還是孩子，但在我們的志工營落實了「任何年紀的人都有能力幫助別人」的想像，就如同弱勢群體其實需要的是平等機會而非一味救濟，適時的讓孩子們自己來、與他們一同協力完成任務，其實更可以看到小朋友們的潛力。

小志工營期間中一整天的與孩子們相處，體會到面對另一個階段的孩子的辛苦，比如說，有些孩子不乖乖地掃地、不睡覺、一直玩牌。在姐姐與老師角色的

定位與尊重上，我們必須因應小志工們的興趣與需求，對行程做了些許的變動，讓大家在遊戲、勞動中仍可以學得開心。營隊最後的分享時間孩子們的分享了彼此的學習，包含學習到團隊精神、清潔打掃能力與行動力(貌似大家都很少做家事)及幫忙的態度。我們很驚訝孩子們認為收穫最多的是打掃，但是這或許便是被我們課程設計所遺忘的、應該要教導孩子們的事物。學習並不是營隊最重要的目的，而是精神的傳遞。最後，我們問小朋友們：誰願意/想要/只要可以就會回來幫忙，當真正的小志工呢？孩子們彼此在愛群相識，一起打掃環境、討論分工，偶爾也吵架、形成小圈圈，但是，最後大家異口同聲的說「會再回來！」。

在高雄的日子遇到許多不同的人，除了認同彼此的點子、可以合作無間的好夥伴外，也與抱持著不同想法的人相互對話、理解。在愛群的日子中，我們開會、討論及佈置，不時地也會有不同的看法。或許，交流想法、討論問題是很重要的，但我們偶爾仍必須提醒自己，太驕傲地認為別人應如何做才是好的，其實缺少了包容與理解。有時候可能覺得他人沒有效率、無法不能贊同對方的想法，但我們也應該反思，處處都需要磨練與學習。偉大的事情都是逐漸發生的，我們時常認為那些令人拍案叫絕的發明是一個人剎那間的構想，但是事實上，這些發明卻都是一群志同道合、滿腔熱血的人一起努力許久的結果。愛群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我們在參與時幾乎不曾感受過有什麼「偉大的事情」正在發生，直到將離開之時，我們才漸漸體會到這段時間中，大家一起完成了什麼。

- 美濃社區自治幼兒園

美濃社區自治幼兒園位於美濃鎮中正區，從政府建設(美濃鎮立幼兒園)至民間承包，歷經許多變革，如今是為由台灣公共托育協會與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共同協辦的幼兒園。

翻山越嶺的穿過山洞，一路從大路彎進小路，再拐進小道，一座四樓高的城堡矗立於一片綠油油的田之中；一點點斑駁的油漆、進門要自己動手推的破舊大

鐵門，這是我們對美濃社區自治幼兒園的第一印象。

走進這座應當充滿小朋友歡笑聲的城堡，聽到的卻是老師們此起彼落的麥克風聲。在二樓以上的走廊旁，我們望著應該是美麗的藍天白雲風景，卻看到許多稍有斑駁而尖聳的鐵欄杆，而應該是潔淨小手、避免細菌與病毒滋生的洗手台，卻破舊又推積了成年污垢的。由於學生人數減少，教室空間的使用集中於一與二樓，三樓成為整棟建築的環境大死角，二樓的球池與三樓音樂教室中有著許多尚可使用的樂器與遊樂器材，卻都沒有人使用。另外，還有約莫五間沒有使用的教室，積累的是歷史的痕跡讓人很難想像曾經的風光。

班級中，教材與玩具少的可憐，卻有一個大黑板。小朋友背著裝滿課本的書包，每天來幼兒園「上課」，教保人員的工作顧名思義為「教學」與「保育」，而在美濃幼兒園，幾乎是以教學為主。相較於五甲、鳳山幼兒園的小朋友，美濃的孩子認識的字或許比較多，但卻少了孩子的無憂無慮，看著學習單發呆的孩子們多了許多，此外，美術等其他面向的創意也被限制。

我們的工作首先要改變美濃惡劣的環境，我們動手開始一番大整理。清理水槽、洗積木、打掃教室、佈置辦公室、整理要與不要的教材與樂器，甚至，靠牆的櫃子翻過來後，竟然看到讓人意外的不同生物.....整理美濃幼兒園環境的過程中，處處可以發現令人驚嚇的事物，如辦公室中的青蛙、護理室的蝙蝠、牆角的壁虎與蜘蛛，以及其他不應該是死角的死角。面對這樣的狀態，我們不時感到心灰意冷，不斷問自己：「這是我想要的實習嗎？為什麼這樣努力，不論對老師們或對環境都沒有顯著的影響呢？我這樣做是對的嗎？語言、信任的隔閡下，要如何達成好的互動呢？」。但這些問題都簡單地被一個想法回答：「做，就對了！」看著簡老大與基金會的姐姐們幾乎一肩承擔起整所幼兒園的行政事務，整理小朋友的資料並建檔、與各個合作單位聯繫等，我們也有著做不完的雜事，在這樣的過程中，或許不能直接說出確切習得了什麼，卻是未曾有過的經驗，並讓我體察到幼教工作最前線生態的樣貌。

日復一日，才了解到「辛苦了」是多麼有力量的話語。記憶猶新，那一天是父親節，當從前冷冰冰的幼兒園老師們對我們說：「你們都工作這麼晚，為了幫我們整理環境，我們這樣不算什麼的。希望趕緊整理好，讓小朋友可以上軌道的正常使用」。當下，真正深切地感受到彼此之間有什麼正在改變，感受到老師們逐漸不再把我們當「外人」來看待，而是包容、成為一家人，作為一起努力的夥伴吧。互動過程中，我們不斷給予老師們信心與鼓勵，也接受到老師回饋，逐漸取得彼此的信任。我們因此慢慢了解美濃的教保人員、學生及家長的狀態及心情的調適。組織交接的過渡期必然需要面對流言蜚語及疑問，在這個時期，簡老大及彭婉如基金會的姐姐們有耐心的輔導老師們，並且與這些質疑的聲音溝通。

教保老師們在面對改變教學機制的挑戰下，往往擔心自己的位置被人取代，而形成自衛性的劃界區隔效果。小朋友也在適應學習環境的變化，家長則對新教學方式充滿疑惑，擔憂是否會對小朋友的智能發展造成負面影響。而一次次的磨合，我們得以建立了解彼此的資料庫，美濃幼兒園是第一個接二手的案子，面對「古堡」既有的成規與問題，我們為恢復孩子們的嬉戲天堂而努力。

第一次聽到基金會即將在美濃接收一個公立幼兒園的時候，心裡很好奇，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公立幼兒園無法再經營下去，是因為近年來鄉村地區的少子化危機嗎？自己當時大概是這樣猜想的。至於對於美濃這個地方的想像，一開始覺得是一個前高雄縣一個很寧靜、很適合觀光、度假的小鎮。雖然自己是高雄人，但是其實對於美濃這個地方不是非常的了解，始終保存著有對於台灣典型鄉村的印象。

但其實美濃最需要加強、最難改善的部分，其實不在於硬體設施，而是在「人」上面。美濃幼兒園所留下來的，不只是老舊破敗的設施而已，還有已經許久不變的教育方式。美濃幼兒園還是採用很久以前的教學法，讓小朋友在幼稚園階段就開始學習注音符號，在這樣的教學中，小朋友被要求乖乖坐好，手拿起筆一撇一撇的描繪注音符號。但是，要幼稚園的小朋友乖乖坐好是不太可能的，因

此，老師被迫要開始大喊、去叫每一個小朋友又遵守秩序。除此之外，此種傳統教學方式只增進小朋友智育的發展，但其他面向卻沒有任何的培育。在這樣的情況下，小朋友的自我行為控管、情緒管理可能都是比較不足的。

一剛開始進入美濃的時候感覺面臨到相當大的困難，畢竟要改變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老師、家長常常懷疑新的教學方法是不是有效。在這段期間，我們常常在美濃忙到晚上七八點才能結束。不過在大家的努力之下，美濃幼兒園慢慢開始有新氣象，這種巨大的改變，真的會讓自己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回想起來，美濃幼兒園在幾個禮拜前還是百廢待興的樣貌，如今，事情都逐漸上了軌道，心裡實在有些成就感。

我們最後要離開美濃的時候覺得很感動，因為這畢竟是第一次真正脫離城市的脈絡，進入鄉村的托育。大學課堂中提到城鄉教育資源的差距真真實實的浮現在自己的眼前，而教育資源的差異，使得這裡的孩子從小就可能就落後許多，差距可能不是單純反映在智育上，包含小孩子的抗壓性、認知能力等等，也可能與城市的孩子有所差距。雖然這個問題已經存在許久，也有很多人在關注，不過整體而言鄉村的資源依然不足。這個問題也給了我們繼續思考，從學齡前的教育改變或許是一個解決方法吧。

教保人員勞動權益之旅

在台灣的托育照護方面，基金會處立的面相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托育是否是平價、普及性，這部分的重點在於托育是否擁有包容性，使得一般大眾能夠負擔的起？第二個部分是實質的教育內容，處理的議題如：幼兒的教育環境是否普遍良好？幼兒的教育方式是否能夠以角落教學等新穎的方式來培養小孩子的能力？有別於一般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新的教學方法是否能夠使小孩子的智育、德育都能兼顧？

最後一個部分是幼保人員的勞動權益。有一件事我們都知道，要有良好的幼

教環境，就必須要有優良的教保人員；但是在現今惡劣的教保勞動環境下，教保人員時常必須付出大量的心力，卻得不到足夠滿足基本需求的報償。照護產業高工時、低薪資的情況層出不窮，實在是讓人很難想像第一線的教保人員是在這種環境下照護每一個父母的心肝寶貝。

自由市場的運作邏輯可能忽略了第一線教保人員與園方的權力不對等關係。我們可以看到在許多收費昂貴的幼兒園中，老師的薪資卻是極低，此外在工時方面，幼兒園的老師時常必須加班，甚至在小朋友下課後還必須留在園區幫忙其他事務。甚至在休假方面，有些幼教老師在懷孕期間，還被雇主逼得要辭職，部分老師甚至沒有育嬰假。幼教產業的惡劣勞動情況每每出現。

職業工會在勞動權益爭取的過程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我們都知道工人必須要有組織，才能一起聯合起來與資方協商，每一個工人或許都是微小的個體，在勞資糾紛中常常屈居於弱勢，被迫接受不合理的對待。但是在其他職業中，我們可以看到該產業的工會往往站在勞方背後，提供一個資訊、勞資對話平台，並協助糾紛的解決。

但是在目前的教保產業中，我們卻到的卻是由資方所佔據的教保產業相關的職業工會。在勞資糾紛當中，我們看不到工會站在勞方這邊為勞工發聲，而是順著資方更進一步擴大他們的權力優勢。因此，我們期望幼保人員不是隻身面對這一些勞資衝突，能有更多資訊、資源去處理。此外，在勞動條件的改善方面，組織性的勞工也更有機會可以爭取更多的工作保障，唯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幼保人員的權益才能真正被保護，幼兒才能得到妥善的照顧。

- 高雄市教保人員職業工會

在第一天實習的時候，我們就跟隨著園長到五甲、愛群，以及高雄市教保人員職業工會去拜訪。教保人員職業工會離五甲幼兒園非常近，幾乎是在同一個社區裡面了。辦公室裡面整體的空間不大，職員大概只有三四位而已，全部都是女

性，辦公室裡面還擺滿了許多教保人員職業工會的會刊，以及許多標語。

教保人員職業工會會刊寫滿了許多積極參與教保人員的議題、勞動相關社會運動，以及相關法律、政策的討論與解釋，還會加入一些新開幕的托育中心、非營利幼兒園的介紹。會刊大概每季出一刊，分別發送到許多教保人員的手上。會刊中其實沒有充滿太多學術名詞，而是以淺白、易了解的詞彙向讀者解釋繁雜的政策法律問題，除此之外，還加入了許多第一線教保人員的心聲以及他們所經驗到的不良勞動處境，如此一來，或許可以讓更多教保人員知道他們整體所遭遇的困境十分相似，組織於是更容易把散落在各地的教保人員凝聚起來，一起來改善勞動環境。

第一天拜訪教保人員職業工會是我們第一次實際到工會的辦公室裡，仔細了解他們平常如何運作、如何有效地與其他單位溝通、如何凝聚團體的意識，這些其實都是課本上不太會提到的細節。其實我們在此之前不覺得 NGO、NPO 相關工作需要投注太多的心力，這一天的參訪使我們感覺到這些非營利組織，尤其是與勞動權益相關的工會，必須比其他性質的 NPO 花更多的心力在階級凝聚、與政府溝通等面向上。

以往我們都認為，第一線的勞動者在面臨雇主直接的壓迫時，應該會很直接的溝通或者反抗。但實際上，我們看到其實要反抗沒有這麼容易，所以教保人員才必須組成一個工會，藉由團結力量、有組織的行動來爭取勞動權益。工會必須持續運作、取得穩定資金來源，還要有更多的組織活動來凝聚成員們的感情以及訴求方向，而社會運動、會刊其實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但是大部分的工會還是有資金上的限制，所以不論是辦公環境、專員雇用人數都顯得略為吃緊。目前大多數的教保人員都還是私營單位的雇員，因此，以非營利幼兒園的教保人員為主的高雄市教保職業工會在資金、成員方面，都還在很小的規模；不過小組織也有好處，例如：成員之間的網絡會相當密集、活動的參與率也相對比較高。

- 台中教保人員組織籌畫

八月初，我們跟著園長以及相關教保產業的職員、在地組織工作者一起到台中，組織當地的教保人員職業工會，並展開為期兩天一夜的一連串組織行動。

第一天，一行人來到台中市勞工局、教育局拜訪相關的政府首長，希望他們支持我們在當地籌組真正屬於教保人員的職業工會。教育局長其實非常樂見我們籌組相關的工會組織，還與我們分享了一個經驗：在她與其他相關教保人員的互動當中，她感覺到，目前台中的教保人員職業工會多半是以資方為主體的職業工會，所以每當台中觸及教保產業政策相關立法決議時，為政府機關找來討論、協商、溝通的，都是代表資方利益的職業工會人員，真正表勞方與第一線教保人員權益的組織，其實非常稀少。在政策的相關公聽會以及討論上，往往看不見勞方聲音的。因此，局長非常希望可以在台中組成代表著勞方的職業工會，以便在相關政策討論時，能多一個代表第一線的教保人員的聲音。

緊接著，我們來到了台中市的勞工局。台中市的勞工局位於新蓋的台中市政府中，外觀看起來相當氣派、豪華，整棟建築前面有大廣場，裡面有精心設計的樓梯，給人的感覺非常壯觀、有威嚴感。但是這樣氣派、豪華的建築也使我們感覺到與這裡有點距離，彷彿是平民進到大官衙的感覺，或許在這個建築設計之下，也反應著現今政府與人民的隔閡。

一向勞工局局長提到我們想在台中創立與教保人員工會，局長馬上表示支持，也非常同意一個代表勞方的組織出現。雖然是如此，不過局長也和我們說明，必須在成立申請書上面說明這個職業工會和台中當地已經成立的「職業公會」有什麼不同，如果我們無法在工作性質上區分兩者的差別，他擔心可能會有其他職業公會提出抗議。

其實從這點可以看得出有趣的問題，勞工局局長的說法，其實代表了整個政府，或者說是官僚系統的保守。政府機關其實害怕冒險、犯錯，因此，哪怕只是一個積極的行動，對於他們來說都是一個不穩定的「風險」。局長在與我們談話

時不斷使用「我們非常樂觀其成」、「我們非常同意、讚同你們」等等詞彙，但是在談話之中，其實也聽得出局長對於這個破壞「和諧狀態」的組工會行動有相當多的疑慮。不過，其實局長也必須考量許多後續的問題，例如：其他職業團體抗議、上層機關要求解釋等等。政府機關最害怕的就是突然冒出很多不同、彼此互相衝突的意見，因此，政府機關害怕在行政中做出太積極的行動，因為這些積極行動可能帶來許多價值、政策的爭議，但政府機關往往又不太有能力或權限處理這些爭議。這導致行政機關可能有一種「鴛鴦心態」，認為「能不要出事就不要出事」，盡量做一些例行性工作，而非嘗試開發更多更新的工作內容。

第二天我們在台中市區借了場地，舉辦教保人員勞動教育的說明會。說明會當天來了許多第一線的教保人員，還有許多教保科系的學生，說明會中由瑞蓮、明旭、秀彥輪流上台向大家介紹教保人員組織的重要性，同時說明為何組織團體很重要。秀彥姐放了幾個卡通短片，裡面都是「小蝦米」如何團結起來抵抗「大鯨魚」的故事，這個卡通雖然看起來很有趣，但實際上蘊含著許多道理，藉由卡通傳達出：「勞工唯有團結起來，才有可能保障自己權益」。

瑞蓮則舉了一個例子：有一個幼教老師之前沒有加入工會，但是到了因懷孕而被雇主惡意解雇時，才體會到工會的重要。瑞蓮半開玩笑地說到，幼保人員其實是一群「很乖」的人，整天與小朋友相處，心地太善良；但也就是因為太乖、太善良了，幼保人員遇到勞資相關爭議時往往不願意站出來面對、解決問題，反而選擇自己承受。如此一來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可能還會使事情惡化。明旭也鼓勵大家參與組織，或許有些人會覺得很麻煩，但是在組織中和朋友、同事互動可以更增進彼此的感情，也能培養個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能力。

途中我們還演一齣「行動劇」，劇裡面的幼教老師辛苦的灌溉樹木、培養台灣的下一代，不料有一天勞委會發出「自願加保」的解釋函，與惡質的資方拿著斧頭砍斷整棵樹木——這象徵著政府錯誤的政策使教保人員及台灣的下一代受

到嚴重的傷害。這齣劇演得相當生動且有趣，也用簡單的方式傳達訊息，使在場的觀眾更能輕易了解事件，同時也傳達出：唯有每一個人自己站出來，才能發揮團結的力量來改善錯誤的政策。

說明會的最後還請到許多觀眾分享參與的心得，其實很多觀眾是現在幼保科系的學生，他們受到老師的鼓勵前來參與組織活動，此外，也有很多第一線的幼教老師，也分享在工作過程中曾經遇到的困難。聽完這場說明會之後，觀眾認為組織非常重要，應該在台中當地創設一個真正屬於幼教人員的職業工會，為大家爭取權利。

這場說明會其實也開展了我們對組織想像的新視野。在學校的許多課程中，我們學習到工會組織的重要性，以及工會如何與政府部門互動，其協商過程與結果又是如何，課程雖也會教到當今工會的組織運作情況，例如參與率等面向，但是，我們幾乎不知工會實際到底如何成立、運行。若沒有實地的觀察，我們可能會把工會當作理所當然的存在，反而不會去探究這些工會組織為何組成、如何組成，彷彿工會組織就「存在在這邊」，工人會「主動的團結」、「主動凝聚力量」，自發性的與資方、政府溝通。但是今天的說明會讓我們直接進入田野，實地了解工會的籌組過程。

我們覺得，這場說明會為台中當地教保人員組織的成立打下了一個基礎，畢竟有很多當地幼保科系的學生、第一線幼保人員共同參與。不過可能由於場次限制的關係，我們也無法在一時之間將所有的資訊傳給台中地區的所有幼保人員，事實上，參與說明會的成員有一大部分是「自己人」，可能是彼此已經相當熟悉、有合作經驗的教保人員組織，而這可能限制了與會人的網絡。不過，今天第一次的說明會，難免需要許多背景相近的團體相互幫忙，我們因為初次來到台中籌組，人生的不熟的，確實也需要其他團體支援。總歸來說，雖然參與這次說明會的成員並沒有太多勞權運動上的「新血」，但這次經驗是一個開端，可以讓相近的團體共同學習，方便下一次可以招募到更多參與者，或嘗試舉辦更大的勞動權益說

明會。

儘管整個實習的經驗早已經印證許多課堂上的理論及名詞，但第一次完整的聽到系統性且簡潔的理念、透過對話進行簡單的討論，並參與社會團體拜訪政府部門、進行遊說的場合，又是另一種參與體驗。

面對幼教科長的保守以及勞資爭議科科長的官僚氣，我們感覺到政府部門所謂的「樂觀其成」，其實相當具不確定性、無保障，對民間力量的議題推動似乎是坐壁上觀。公部門不以自己的權責賦予民間團體資源，故而結果好壞、成功與否都不會對部門造成負面影響——若最後真的成功推動議題，則可以享受最後的成果。或許是因為公部門的科層制限制科長決定的權力，也可能是科長不希望背負著太多改革的期望，在這樣的環境下，著實讓民間組織必須要付出更多的心力。

從零星的對話中，我們也更了解教保界的社會現狀，例如教保業者成立的「全國教保總會」訴求提升幼保人員的導師費（由九百元調至二千元）的案例。乍聽覺得很好，但是經過分析後，我們才了解，改善勞動條件的政策必須整體性的提升教保人員勞動環境（例如：勞、健保的保障，及正常勞動時數等等），若非顧及整體的勞動環境、改善勞動場域的資源分配，教保員仍然處於被壓迫的狀態。那麼，我們要如何期待教保員以健康的方式及心態照顧好我們的小孩子？此外，政府推行的非營利幼兒園法也在 2012 年 8 月上路，期望以更平衡的私幼、公幼及非營利幼兒園比例，提供家長更多選擇，並且改善托育環境的品質。

真的很幸運與教保工會這群人一起做事、討論並演出行動劇，並參與工會的行動，我們也觀察到社會中各式的角力關係。此外，我們在研習會議中認識其他面臨不同問題的教保人員，期待能在大台中繼續共同協力，凝聚第一線的幼保人員並得到發聲的力量。

再啟程：反思與未來

- 創新，不是複製

經歷了七年，從停滿車子的廢棄空地開始，五甲自治幼兒園逐漸營造出不同的社區氛圍。這裡的小朋友沒有課業壓力，不需要握筆寫字，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玩」，在玩耍中學習。小朋友不再是個受協助者，反而有能力「自己做自己的事」，於是小朋友會摺棉被、盛餐點、為自己行為負責；家長們只不是接送小孩的直升機父母，也不只是一個孩子的父母，而是在大家彼此協助與關心的互動中，更共同成為幼兒園的「大家長」。走出幼兒園「踩街」，小朋友將色彩與活力帶入社區，也拜訪老人日照中心，連結在地的老小的關係——五甲的孩子、家長與老師們串聯了街坊鄰里，使彼此成為「有關係」的共同體。

五甲社區自治自幼兒園的改變成功，成為一個互惠、共同協力的幼兒園典範，而許多人想透過研究五甲成功的重要元素，來「複製」這樣的模型，以套用在各地幼兒園中。這次實習，參與改造美濃幼兒園及鳳山園區的體察過程中，我們得出與之不同的想法：必須在既有的環境下與不同社群文化中，「再製」適地適人的社區自治幼兒園。

每個幼兒園在歷史與地理環境交互作用下，有不同的特色及故事，故而成功的經營應該納入在地不同的樣貌。少子化的問題衝擊第一線的幼兒園，許多園區因為經營不善而面臨倒閉、品質不佳的問題，因此，改造更不應該是「從頭開始」地複製某一個目標，徹底接手既有的園所規劃。而美濃社區自治幼兒園就是這樣開始的。

進入美濃幼兒園，不同於前兩個園區是由基金會全權規劃，接手一個舊店鋪是宛如基金會的新挑戰。首先，最簡單的空間與環境的改造已經花了不少時間，同時，也進行著教保人員的訓練與培力，並且取得有關教學的種種共識。然而，在與美濃的家長及老師溝通時，對於課程安排（課本的有無）是一件最分歧的部分。美濃是較為偏鄉的地方，家長們由於擔憂孩子們會輸在起跑點，似乎更為關注幼兒教育的內容，特別以實際的教材數量為標準：越多課本越好。但是教科書

真的是學習的關鍵與必要元素嗎？其他彭婉如基金會旗下的社區自治幼兒園，皆不使用課本，而是以角落學習及各項創意活動來引領孩子們，使之可以自然而然在生活中學習。但為了因應美濃家長的不安，而且幼兒園正處於單位交接的磨合期，最後還是決定繼續保留課本的使用，僅改加入更多生活化的實作來進行教學。

● 總結與反思

邁向未來的每一個腳步都奠基於過往的基礎，老實說，我們是生活在自己安逸世界，而不知外界疾苦的人。雖然並不是家庭背景非常好、富甲一方的顯赫家族，但總體而言，仍生長在氣氛溫馨且物質上不虞匱乏的環境。考上大學，懵懵懂懂地進入社會學系，卻意外成為人生的轉捩點。隨著課程安排，接觸不同的想法並擾動著既有的刻板印象，開啟我們其他眼光，看到不同與以往的視野。社會學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基礎點，一個更為開放的想像可能。

一路走過五甲、鳳山、愛群、美濃，這是我們未曾設想到的實習方式，在每一個站，儘管待的時間不久，卻都得到無以倫比的體悟。五甲幾乎是成熟的幼兒園典範，在這樣的氛圍中，人與人的關係互惠的進行，實踐了新社會經濟的可能；新穎的鳳山在空間設備不足以及多元的組成中，也努力營造另一個友善的幼托環境；愛群以瑞典開放性幼兒園為藍圖，轉化為適合台灣的家庭支持資源中心；最後，美濃是基金會第一個「二手接案」，一切的調適與磨合都是身心的挑戰，從零開始，但最後又完全展現自我的風格。

第一線的實習過程中，我們對於教保產業的生態有進一步的認識與體會，對教保人員的勞動價值，也發現更多值得探討的層面。從早到晚的情緒與勞力勞動、承擔規劃課程、記錄孩子們成長狀態等諸多事務，教保人員不僅辛苦，其知識價值更同時被低估。同時面對著資方壓迫以及家長各式各樣的要求，這些再再都直指出教保產業當前的困境，也使孩童照顧的品質受到疑問。以上，仍是必須不懈

努力的改革之路。

離開台北、離開熟識的親友，來到高雄，結識一群全新的陌生人。我們也像是從零開始的個案，重新創造出幼托場域回憶與經驗。曾經覺得世界很大，自己很渺小，而一個小小的個體能夠對結構造成什麼影響呢？會不會如同小蝦米對抗大鯨魚般、螳臂擋車，只是不自量力？

走出舒適圈才能看到世界更多的樣貌，這個暑假，認識了 153 位小朋友，以及有意識的行動者們，更豐富了對托育的想像——儘管圖像東拼西湊的，但是從中看到了更多可能性，進而開始思考：一切都是可能被改變的吧！我們曾經在校園的保護網下肆無忌憚地做自己，這次才覺察到社會中有許多人許多身不由己。但這些限制同時也可以促成改變的機會，「做，就對了！」是我們實習中最大的收穫。走出自己封閉起來的心牆，發現世界上有許多人，不畏艱辛、不計代價、沒有退縮地為心中的烏托邦想像付諸行動，這就是一股團結又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吧！有著這些力量，實習終曲才能成為新開始與啟程的助跑道，未來，帶著多一分的社會體悟，以及對自我的期許，我們想像著自己或許可以讓世界更好，躍出迎向未來的一步。

台灣現今的托育環境遭遇到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可能不是我們的視野可以摸清楚、解決的。城鄉教育資源的差距、幼保人員的低薪高工時、昂貴的育兒費用這些問題可能都是盤根錯節。但是透過這趟旅程，我們對於這些相關的議題有進一步的理解，也使自己設想些許的藍圖去改變這個結構。我們時常認為整個大環境，或者是「結構」的複雜，使得問題好像難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不過只要願意跨出第一步，實地走入現場並且了解狀況，那就是整個社會改變的開始。

五甲自治幼兒園 - - 在童趣中學習溝通

是那樣小心翼翼卻又充滿期待地踏上了這片土地。

伴隨著認床失眠的黑眼圈、高雄晴空萬里的好天氣，一大清早踏上了寄宿阿姨的機車，出發前往離家不遠的「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約莫七點鐘，直通通的大馬路上，熙來攘往的車潮，再再凸顯自己的渺小，我享受著異於天龍國的烏煙瘴氣，同時也映照著內心亂糟糟的複雜情緒。機車緩緩地停在路邊，阿姨不斷耳提面命告訴我要如何有禮貌地應對進退，在指引我方向後就揚長而去。沿著羊腸小徑前行，有別於馬路上的喧囂，花草香和寂靜緩和了不少緊張情緒，是一個有溫度的社區。充滿花花草草的平屋矮房，走幾步路就可以看見居民種的荔枝、芒果、芭樂樹，是伸手即可摘取的高度，但自己心裡冒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難道不怕被偷嗎？

周遭的新鮮事，陪伴著我走到了幼兒園外的竹籬處，躲在一角偷偷往內窺視這個將與我共處一個月左右的地方，除了占地約有三分之一個幼兒園大的沙地(土地)外，遊樂設施、教室的樣子，似乎和一般認知的沒有太大差異。我慢慢地沿著竹籬繞至正門，已經有一些小朋友背著書包、提著餐袋一搖一擺走進校園，我默默地跟在後頭，即將展開實習的「第一天」。

嘗試全新的角色

在門口處有位值班導師，熟悉地幫小朋友量體溫、看喉嚨、噴洗手酒精、登記出缺席與特殊細項，像是吃藥的時間、身體狀況…等等。在說明身分後我便四處走走看看，同時等待另一個夥伴的到來。

當時間來到上學的尖峰時刻，我越感到自己像個木頭人般一無是處，頓時希望自己的體積可以小到足以徹底忽略，或是鑽了個地洞埋起來也無所謂，呆站在那兒僵硬地笑著，點頭示意迎面走來的家長、小朋友們，老師無暇顧及我的尷尬，

手足無措的心情瞬間升騰至最高點。害怕陌生、害怕被忽略的難過不由自主浮了上來，拼命地壓抑，但始終無法排解。或許抽離舒適圈是一個脫離逃避性格的契機，我這樣不斷說服自己、鼓勵自己，最終嘗試開口問了值班導師「我現在可以幫忙什麼嗎？」這些過程的掙扎像是過了一個小時之久，我慶幸跨出了這一步，慶幸自己開了口，打破了無言以對的沉默。

開始試著詢問小朋友的名字、跟老師閒聊幼兒園的狀況、協助量體溫等例行公事，這些事情若放置在自己原先的生活，如同芝麻小事般容易，但在一個新的環境下進行，並成為一種學習時，才會意識到自己有多麼笨拙。此時此刻，我褪去了所有先前附加於己的身分，現在的我，是一張新的白紙，一個不折不扣的菜鳥。

小孩子永遠是幼兒園裡最核心的人物，所以當一個小朋友站在角落時會有人主動詢問、關心，但當這個角色換成一個即將成為完全行為能力人的我時，這樣的結果並不會發生。抱持著反正已經夠「菜」的心情，即使做錯了、被當成笨蛋也無所謂，總比永遠做木頭人尷尬地笑著得有意義。

在協助完量體溫等例行工作後，老師指示我們到遊樂區幫忙留意小孩的安全，總覺得四肢還是那麼不聽使喚，走起路來輕飄飄地不真實感，我默默站在不遠處待命，經過的小朋友們總會留意一下這兩個「陌生人」的存在，我瞬間像個稀有動物般被大家上下打量、欣賞。「你是誰？」我露出微笑但始終吐不出什麼字句，直到一個小女生緩步走來，與我四目相接許久後，開口問了我：「你是誰？」才打破了一陣面面相覷的寧靜。

「我.....，」頓時腦中浮現著各式各樣的答案，但卻無法組織完整的自我介紹，只好回答「我是李少彰啊！」。

我明白，這個簡短回答肯定不能滿足她的好奇心，接著，一萬個為什麼你問我答遊戲，便毫無疑問地展開。在這樣的對答過程中，周遭的小朋友也湊了過來，有的拿著他喜歡的東西與你分享；有的就在你身旁繞來繞去，當你注意到時便會

害羞地躲起來；有的則用著疑惑的眼神看著你不發一語。或許是小女孩的開口，讓我想起那些和小孩互動的過去，暫時忘卻自己的不熟悉，童言童語的過程中，我們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就像與小時候的自己對話，我從她身上發現自己的影子，長得肉肉的、有點沒自信，但卻有著大姊姊般的氣勢。聊聊天、拉拉手、摸摸頭，她說：「我喜歡你。我喜歡你瘦瘦的，還有你的捲髮。」我也毫不猶豫地告訴她：「我也喜歡你，你好可愛。」

主動在他們的世界裡是如此單純，因為好奇、想認識所以開口跟你說話、問妳問題，反觀自己卻總是想得太多，害怕說錯話，反而錯過些什麼。此時此刻，我感受到那股天真帶來的暖流，當願意踏出第一步，似乎沒有什麼可以阻礙得了。

資訊爆炸的時刻

- 「園長好！」

中午時分，看到一位瘦瘦高高的女人從外頭走進園區，環顧四週環境，整理花花草草，小朋友大喊著「園長好！」如果沒有意外，她就是我們的精神總導師——簡瑞連園長。

我的似乎腦袋有點錯亂，印象中的幼稚園園長總是穿得高貴華麗，化著濃妝帶著名牌包，偶爾才會來到幼兒園巡視。但眼前的這位園長穿著十分樸素，簡單的T恤搭配牛仔褲，但仍不掩那股懾人的氣勢，完全顛覆先前的印象。當內心還在讚嘆的同時，園長朝著這兒走來，充滿活力地叫了我們兩個人的名字，有點訝異我們竟然被記得了！先前透過簡歷傳遞訊息的我們，被另一頭的接收者認真閱讀與了解的感覺，是溫暖的，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和力瞬間上升。

不管是幼兒園還是我們，幼教與社會學領域的結合，都是第一次。園長大致列了接下來可以做的事情，了解我們想在這次實習中想看到哪些面向，接著再調整計畫中的行程，讓實習與社會學更加貼近。其實自己對於「學到什麼」並沒有

設限太多，單純帶著喜歡小孩、學習的心態看待這次的實習，希望從過程中更認識自己，甚至帶回一些可能的經驗，有朝一日能夠在他處萌芽。所以我喜歡每個可能的挑戰，想要嘗試從未嘗試過的東西。

園長大致介紹了整個幼兒托育的現狀、五甲幼兒園的定位，以及與幼保工會組織交流合作的關係，我們也到附近社區參觀。這是我們對教保體系初步的認識，對於毫無經驗的我們而言，要在短時間內消化這些資訊其實相當吃力，但幸運的是，我們遇到了一個好園長，算是美好的開始吧！

● 實習好夥伴

這次的實習除了我之外，還有一位壯丁，他是黃裕宏，和我一樣是大二升大三的社會系學生，在實習之前我們就已經認識，對於彼此的習性也算了解。他在人群和活動中，是個稚氣未脫的大男孩，但內心隱藏著一顆大叔般的老靈魂。在團體裡是大家的開心果，十分擅長處理人際關係。幼教領域的性別劃分相當明顯，女性教師的比例幾近百分之百，在充滿著女生、女人的環境中，裕宏算是萬紅叢中一點綠，小朋友對於大哥哥的來到，像看見稀有動物般，每個人興奮地黏在他身旁，有時還當成大樹來攀爬，裕宏成了園中不折不扣的「吉祥物」。

在五甲實習的過程中，他像一種調和劑。在工作上，我算是個完美主義者，對於交代的事情總希望做到最好，但有時也會因此過於急躁；然而，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慢活主義者，行事風格比較隨興，對於細節並不特別在意。他常會要我「慢慢來！冷靜！」，或是乾脆在一旁哼著歌，雖然明白他的好意，但內心仍會萌生一把無名火。因此，我們在合作時常有摩擦，有時候氣到不想再和彼此溝通，乾脆各自完成進度。但每次事情過後，便會回過頭反省自己的態度，畢竟在實習中我們是一個「團隊」，而這些彼此協調、彼此合作的過程，也是一種學習吧！

除了工作外，在處理人際關係時，我們也是兩種完全相反的性格，但我要感謝他的地方往往比較多。有時候，大家互動的語句中穿插著玩笑話，而我總是認

真看待每字每句，當大家都在談笑風生時，我像個外來者只能在一旁微笑，總覺得老師好像在嫌棄我什麼、覺得自己不夠好。但看著裕宏與大家互動，我更了解當地的風俗民情，也提醒自己改掉斟酌字句的習慣。他慢慢帶著我進入話題，讓我習慣主動參與，不再像個冷冰冰的木頭呆站在一旁。很慶幸實習時有好夥伴的陪伴，讓我實際經歷了團隊中衝突、磨合、互補、合作，進而珍惜共享、共患難的那些時光。

接下來就讓我帶著大家一起進入五甲自治幼兒園的實習生活吧！

入境隨俗的生存之道

我們的實習內容包括：看完歷屆幼兒園的資料，整理出可能的問題；進入班級參與小朋友的生活、協助老師班級事務；大致整理自己的心得，星期五與園長開會。看似簡單的三項目標，實際內容卻是五花八門。回想起小時候上幼稚園，每天就像去和朋友們玩樂，學校有點心可以吃、有拼圖可以玩，無憂無慮地到處活蹦亂跳，有事情只要叫「老師！老師！」便有人協助你處理。相隔十五年後，我不再是當年稚嫩的小女孩，不會有人再給予我的懵懂無知無限的包容。再度踏進幼兒園，我是五甲自治幼兒園的新生，但這次，我是不折不扣的實習新生。

「上午進入班級，下午看資料」的每一天，都和我的體力奮戰。看著老師從早到晚進進出出、帶活動精力充沛的，不由得打從心底佩服，和夥伴每日的例行公事有澆花、澆沙地和協助量體溫，對我而言，澆沙地應該是最困難。沙地佔地面積約是園區的三分之一，是一塊開放式的遊樂區，需每天澆溼保持沙地的黏度，避免小朋友奔跑時塵土飛揚。起初，這項任務是由裕宏壯丁擔任，但當他被派遣其他任務時，我必須遞補這個位子。

第一次嘗試時，我一拿起厚重長水管，頓時覺得自己的動作好笨拙。之前自認從小被媽媽培養做家事的能力，對於生活起居打理算是上手，但到了五甲，粗重的幹活對我來說都是挑戰，加上手和腰先前受過傷，有些使不上力。回想著裕

宏之前示範的步驟，我好不容易打開水龍頭，對著四周噴灑，雖然不斷嘗試讓噴出的水形成兩滴狀，但手指頭仍然不聽使喚，只好暫時作罷。小朋友又在倒 U 型的水柱下穿梭，我只能喊著：「不行喔！你們等一下會濕掉，聽話！」分身乏術的我，只能不停望著門口祈禱夥伴的到來。

最後，水管接頭分離、水量控制不佳，地上形成一個個小水窪，泥濘弄髒褲子又忙到灰頭土臉，只有一個「慘」字足以形容我前幾次澆沙地的經驗。每次結束工作都有如釋重負之感，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個「溫室花朵」，生活在都市裡，鮮少有機會直接接觸粗重的工作——即使過去有機會，可能也不願意做吧！或許是因為這樣的挫敗，激起我完美主義的性格，媽媽說：小小的工作，才更需要注意與學習細節，那才是真正對待事情的態度。記得之前看著老師澆沙地，是那樣的輕鬆自在又不失幹練女人的氣質，我深深被那樣的背影吸引，也期許著自己。

「捲起袖子動手做」是幼兒園一直以來的信念，事實上，幼兒園當初的成立，就是一群重視幼托的人們從無到有的成果。籌備之初，面臨過資金不足、政策更動、園區占地種種問題，但也是因為堅持不懈，才能一步一腳印從草創雛型發展成今日的模範。在幼兒園裡，看似不疾不徐的生活步調背後，老師們一刻都不得清閒。記得專門處理園區行政業務的永芬老師，接近中午時分，便會到處詢問老師們要不要訂咖啡，「喝咖啡」似乎已蔚為風潮，成為疲倦暫時的解藥，甚至象徵著幼教老師辛苦勞動的另類文化。

我從看和聽的過程中，模仿、學習如何互動，進而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位置。進班是實習中自己最期待也是最具挑戰性的任務，園長將我分配到中大班混齡的班級，是由翁媽咪和霓霓老師負責，裕宏則進入中小班混齡的班級。起初，我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對小朋友而言我是陌生的，他們會好奇、頻頻靠過來，在課堂活動中分心。我盡量靜靜坐在角落，以不打擾課堂為原則參與其中，害怕造成老師教學上的困擾。但也因為這樣的沉默，自己漸漸開始感到彘扭，就在內心膠著之際，那位主動和我說話的小女孩跑過來抱住了我，她像小大人似的，慷

慨地把她的好朋友介紹給我，話匣子一打開，便影響到老師的秩序管理。我委婉地要小朋友先專心，角落時間再一起活動，看著他們乖乖回到位子上的同時，我的手不自覺顫抖著，是緊張也是興奮。

「我被注意到了，我被注意到了」心中不斷喃喃著。

和小朋友相處最久的時候，應該就是角落時間了。教室裡的四周切割成四至五個區塊，有益智角、故事角、積木角、家家酒角等，幼兒園平時沒有固定的書目教材，故事書算是唯一的文本教材，小朋友能夠天馬行空，擁有許多自行想像的空間。小朋友自行創作出的東西，在這時也會興奮地與我分享，此起彼落叫著「姊姊，你看！這是我畫的花！這是我畫的女生！」有的也湊過來邀請我去看他的積木「老師，這是我的車子！這是我的城堡！」。給予鼓勵的同時，我也拋出問題反問他們創作的源頭，以及背後的故事。

在日常生活面向上，老師們相當重視小朋友的日常習慣、禮儀與生活能力。園長告訴我，大人只是從旁協助的角色，在教導過後便要孩子獨立執行，而混齡的用意，也是希望不同年紀的孩子可以彼此相互照顧。在相處的過程中，可以明顯發現小朋友比同齡的孩子成熟許多，有時自己有不懂的地方，他們都會像個小大人似的告訴我要怎麼做。在這些活動中，老師不僅是個教育者，也是個敏銳的觀察者，需要不斷觀察、評估每個小朋友的身心發展狀況，並回報給家長。

這樣的互動提供我學習溝通的機會，學習如何正確傳達訊息。因為沒有受過專業的幼教訓練，在處理小孩子的情緒、與小孩應對時仍有許多需要琢磨的地方，上課時，我一邊觀察老師，一邊演練著剛學到互動模式，不斷修正自己，希望在短時間內，能找到適當的融入方式。

起初以「平平姊姊」角色進入班級的我，在老師們正式介紹後，我有了新的身分：我是一位實習老師，因為名字中有個「彭」字，所以老師們都叫我「彭彭老師」。其實一開始對於稱呼沒太多想法，想說只要好記就好，便用了沉寂已久的乳名「平平」，有些小朋友已經習慣這樣的叫法，所以「平平」、「彭彭」這兩

個名字就被大家交替使用。對我而言，最受寵若驚的就是「老師」這個職稱了！就像平民被加冕般的光榮，畢竟我沒有任何幼教的專業背景，也沒有受過什麼訓練，總覺得自己沒有資格擁有。但當每個人異口同聲地說「彬彬老師好！」時，瞬間發燙的身軀，一股暖流流竄至每個細胞，我興奮地不知所措，就像嬰兒初次喊著媽媽時，那種難以言喻的感動。而這一聲似乎滿足了心中曾有過當老師的小小悸動！

「彬彬老師」的稱謂，似乎成了融入環境的神奇助力，或許，實習老師的身份給了我穩固的立足點，把自己當成老師的左右手，在他們無法抽身時協助一些繁雜瑣事。彆扭慢慢褪去，主動詢問幫忙，便的沒那麼困難了，和大家相處起來也相對自在許多。

幾近一個禮拜的相處，感覺自己整整消瘦一圈。雖然每日只有九小時的工作時數，但活動量難以計數。在疲憊時，總會對老師投以欽佩的眼神，望著仍不停穿梭的老師們，也是督促自己奮鬥的動力。有時下午回到辦公室看資料時不小心睡著，有時哄小朋友午睡時，他們依舊精力充沛，圓滾滾的眼珠轉啊轉地看著你，手雖規律地輕拍著他們的肚子，說著：「快睡喔！乖乖睡！」，但自己的眼皮已經不聽使喚黏在一起。

雖然每天都是與體力抗衡的拉鋸戰，但小朋友們此起彼落的歡笑聲、童言童語的模樣，與紛雜世界隔絕的單純，是我取之不盡的精力湯。尤其看著他們的睡臉，就算平時再怎麼頑皮，此時此刻的每個人都散發著童貞的光輝，讓人不自覺地想把每位孩子捧在手心上呵護——我頓時能體會老師們，那種又愛又恨的心情了。

真的是一張空白的紙——雖然喝了點墨水，可是在實務操作上依舊從零開始。

這幾天下來，慚愧自己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年輕人，有那麼多的不足。我很喜歡小孩，但以前都是無止盡的溺愛，沒有一定的界線，或許他們當下會喜歡我，

但那是立基在能夠從我身上獲得好處、不會被我糾正的狀態下。一面之緣的相處不難，但長期下來，卻是考驗著彼此的原則、信任、互動模式。在這裡，只有不斷投身其中才是最佳的生存之道，沒有學不會、辦不到的藉口，就算事項的處理有明確 SOP，仍可能遇到從未經歷過的事情。我深覺自己是懶惰的，雖然要求完美，但當事情瞬間襲來，又容易陷入「這樣就好」的心態；然而照顧小孩的工作，卻不能容許「這樣就好」的消極，我現在面對的，是不同家庭中的小生命，因而多了更多的責任和使命，我必須做到的最好。

現實與衝擊—我想要和你們說

五甲幼兒園雖然是我們最主要的實習場所，但因幸運地碰上兩個棘手的教保議題，分別是「竹田鄉托事件」和「教保人員納入勞工法§18-1 事件」，園長毫不吝嗇帶著我們一同參與。這些出乎預料的學習，反而是更深刻了解教保場域的美好契機。

● 竹田鄉托事件

這是我實際接觸公共托育的議題開端。簡園長平時必須來回奔波各個工會處理其他地區的幼托相關事務，因此過了一個禮拜，我們才再次見到她，不但分享了實習過程與心得，也從觀察和互動中，漸漸組織起園區的運作輪廓。

在前往竹田之前，園長大致說明當地鄉托情形，讓我們有個概括性的脈絡，作為參與會議前的準備。

竹田鄉托屬於地方公立托兒所，起初為了因應當地婦女就業所衍伸出的托育需求而設立，以平價收費方式，讓大多數人能夠負擔。當初收托人數將近兩三百人，托兒所的收支狀況大致維持平衡；然而，因公托性質容易充斥冗員，加上聘請的公職人員相對高薪資（例如技工、護士、正式教保員等），占了人事總支出的二分之一，其餘七名臨時教保員薪資待遇卻不到整體人事支出的四分之一，長

期下來，造成鄉托財政大幅虧損，進而突顯人事編制混亂的問題。上述困境加上近年來推動「幼托整合」計畫，竹田鄉托必須汰換老舊設備以符合新上路法規，原有龐大人事開銷形成的虧損，加上新制度規範的雪上加霜，導致鄉公所最後做出停辦決議，並決議以公開招標的方式委由民間繼續承辦托兒所。

這樣的決議引起家長們關切，屏東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也積極介入其中，畢竟，若托兒所最終變成民營，學費必然增加，也失去了原本以半補助方式營運的意義。瑞連園長、明旭、秀彥等等教保工會的成員們，在事件發展膠著之際，四處奔波研討竹田鄉托的未來，力求這間對居民意義非凡的公共托育機構能夠保留。

歷經一個多月的碰撞、協商，考量多方意見與竹田鄉托的必要性，竹田鄉托最終幸運地免於停辦命運，教育部也表示將編列預算，以專案的形式補助鄉托的虧損。這樣的結局不禁讓聽故事的我們會心一笑，但對教保工會而言，即使竹田鄉托目前脫離停運危機，固有的人事問題依舊存在，臨時教保員仍受到不公平的薪資待遇。

簡單來說，一切都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更大的改變，這也是工會人員再度下鄉的原因。

這次同行的成員，除了我和裕宏外，還多了小小的攝影訪問團隊，他們長期與瑞連園長合作，對教保領域也有一定的理解，這些日子中，他們上山下海跟隨教保組織的腳步，廣泛蒐集影音資料，作為紀錄片素材。

說明會的目的，直到組織與當地教保員互動的過程中我才漸漸理解。起初，只是帶著一絲好奇與懵懂來到遠離喧囂的鄉村，不見高樓大廈，遠方雲彩層層疊疊映照著，平地矮房清晰可見，被夕陽簇擁著的屏東顯得脫俗。或許，是自己的心情五味雜陳，即使懷抱美景，仍忘卻不了竹田鄉托散發的幽微黯淡。大夥兒選了一家露天咖啡館吃東西果腹，飯桌上你來我往的分支話題，頗似世界咖啡館般的討論模式，不時充斥著豪邁歡笑聲。除了我似懂非懂的圈內事，席間也聊到幼

教產業近期發生的種種大小事，他們時而戲謔的語氣其實潛藏著無比擔憂。

頓時，覺得自己渺小，離他們好遠又好近。

時間來到晚上八點多，說明會正式展開。地點是在屏東當地籌組南洋姐妹會的會長—錦繡家，他是今晚的靈魂人物，也是令我眼睛為之一亮的崇拜對象。參與說明會的教保員總共五位，工會組織陣仗相對龐大許多。一開始，瑞蓮園長述說著來到這裡的緣由，為活動展開序幕。

竹田鄉托的來龍去脈，以及教保員長期處在弱勢的情境，工會成員們就自身經歷娓娓道來，接著，逐漸帶出希望集結當地力量籌組工會的議題，形成教保員為首的自救團體，爭取、保護教保員工作的權益。一開始，當地教保員是被動的，他們安靜聆聽，時而皺眉時而面無表情，不太表達自己的意見。那股沉默如一堵牆，防備著，難以突破。或許，我們過於激動的表達訴求，那份「We can be better！」的強烈希冀形成一股無形壓力，凝結了溝通氛圍。直到一位幼兒園家長意外現身，表達家長對鄉托的期許，錦繡也緊跟著用鏗鏘有力的聲音補充著自己的觀察。當緩下腳步，給予與會教保員足夠時間和空間，他們道出自己的遭遇時——我其實可以感受到他們並不是不願意說，而是「選擇說」的背後有太多顧忌，不僅牽涉個人，更擴及整個家庭。

年資七、八年以上的教保員佔了與會者的半數，領著一般勞工最低薪資，他們為了家計、為了工作，選擇默默承受。「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勇敢面對這些事情的。」一位教保員無奈地說。

台灣的幼教體系以私立幼兒園為大宗，雇主即幼教老師的老闆上司，雇主會彼此相互聯繫，以掌握整體幼教體系的動態，教保員如果得罪他們，不僅可能失去現在的工作，同時賭上將來受聘僱的機會。這一個個不由得的苦衷，從教保員口中說出，他們仍然帶著恐懼，不時提醒攝影大哥不要錄影。

但，此時此刻，他們肯定也更勇敢了些。在一旁看著、聽著的我，並不屬於哪一方，卻感到莫大欣慰。我們常常直觀地認為「有困難就要說出來！」多麼豪

爽闊氣，卻犯了站在自己大鞋上度量他人的謬誤。有時候，難以啟齒不代表不願意說，而是被那些不得不如此的考量牽絆著。

說明會到了尾聲，我突然被園長點名發表心得，當時還未理清頭緒，情緒依舊停在置高點，只能一股腦兒將自己所有感受拋出。看著每個人使盡渾身解數講解，教保員們從防備到認同，從漸露笑容到微微點頭，即使我的實習時間不長，沒有切膚體會教保員的掙扎與難處，但看著一來一往互動、遊說，尋找彼此共通的記憶，沒有誰想要說服誰，也沒有誰想要放棄誰，只是不停在困境中挖掘一線生機——剎那間，這些畫面觸動了我，不自覺哽咽到說不出話來。

在這裡，是那樣不分你我，純粹在乎學齡前幼兒的教育環境、在乎教保員的職場狀況，車程再遠、地區再偏僻，只要事情一發生夥伴就如救火隊般迅速現身。對許多人而言，教保工作只是照顧小孩而已，但完美的背後，必須有人願意默默耕耘，促使整個體系不斷修正、進步。

● 教保人員納入勞基法 30 條之 1 適切性

這是實習日子裡接觸到的第二個教保人員權益問，給了我最深感觸與震撼，我漸漸體會，原來現實是多麼殘酷。先前瑞連園長已大致將爭議的梗概告訴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機會讓我們更快了解議題，進而實地參與抗爭過程。

教保人員納入勞基法 30 條之 1，即所謂的「變形工時」。法條大致如下：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或勞工半數以上同意後，其工作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一、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不受第三十條第二項之限制。二、當日正常工時達十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三、二週內至少有二日之休息，作為例假，不受第三十六條之限制。四、女性勞工，除妊娠或哺乳期間者外，於夜間工作，不受第四十九

條之限制。但雇主應提供完善安全衛生設施。本法第三條修正前已適用本法之行業，除農、林、漁、牧業外，不適用前項規定。」

若該法條適用後，雇主將擁有實質權力，調整教保員的工作時間。許多人常常將「彈性工時」與「變形工時」混淆，事實上，前者是在規定的工作時數下，依受僱者的狀況自行調配工作時數；後者的決策權則是在「僱主」手中，法條雖提及「應經由工會或勞工的同意」，然多數教保員所屬的工會仍在僱主權力所及的園內組成，工會整體利益傾向理所當然以僱主為準。在高壓環繞的工作環境下，為了生存飯碗，勞工根本不可能站出來提出與僱主相違背的意見。有人說，他們超額的工作時數依舊可列入加班時數中，不影響應有的權利；但在幼教的場域裡，往往無法直接將權力地位、照顧耗費的心力直接量化成冰冷數據。法條適用之後，一天工作 12 小時對高勞心高勞力教保人員有何影響？對家長在意的教學品質會產生何種衝擊？這一切都是未知數。

我們更無法確保僱主是否真會依照規範安排上班時數、給付一定的加班費用，因此，在沒有完整評估和配套措施之前，不應趕鴨子上架般如此草率地適用該法條。雖然官方理直氣壯說是為因應幼托整合上路，先前經教育部評估與審核、最終由勞委會採納建言，配合政策施行改革，但是，若真是政府美意良善，為何依舊忽略站在幼教最前線的教保員？那些實際在基層、執行照顧工作的人們，為何沒能參與整場修法的方向？這個改革的背後，變形工時真正的獲益者又是誰呢？

北上參與公聽會前，瑞連園長邀請我們參與說帖撰寫，希望將我們實習兩個多禮拜的感受，透過與會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開會前幾天，大致閱讀了與法條相關的文本及網路資料，努力惡補空洞的我們，腦中也不斷幻想著開會時的景象：想像著可能有一兩位律師負責法律專業諮詢，之前一同下竹田鄉的工會成員們也紛紛到來，共同組成小型工作團隊集思廣益。

這些虛無飄渺的美好想像，在開會當天，現實毫不留情將它一一戳破。當針

緩緩指向七點，幼兒園再度恢復一片空蕩，被靜謐黑夜籠罩著的五甲，辦公室明亮的燈光顯得特別耀眼，園長指示我們把桌子挪一挪，待會兒要在這兒開會。我內心愣了幾秒，但身體仍熟練地依照指示完成任務。帶著疑惑等待，大明哥、淑芬姐、小彥姐陸陸續續到來，辦公室裡頓時熱鬧起來，隔壁教室正在進行校務會議的園長，抽空走來指示大家開始動工。我似乎明白了，環顧周遭人事物，打回那浮誇的可愛想像。

這就是現實啊！你還期待什麼呢？

原來那些訴求，都是他們一點一滴拼湊出的。面對法律問題，如小蝦米對抗大鯨魚，大家無法直接切中要點提出質疑，必須不斷上網翻閱法律資料、工時演算實例，尋找著對手論點的可攻訐之處。坐在一旁的我們，總覺得自己不應該只有這樣，趕緊埋頭苦搜線索，希望對討論有所貢獻。時間不知不覺來到十點多，在骨幹大致底定後，我們和明旭一起填補說帖內容，將論述有力呈現。訴求如下：

- 一、變形工時不等於彈性工時，勞委會不應便宜行事。
- 二、讓幼托照顧步入正常軌道，不在於變形工時，關鍵在於人力配置的不足。
- 三、變形工時的實施將損及教保工作者勞動權益，更漠視幼童的照顧品質。

會議過後，我和裕宏也持續追蹤議題，並將說帖重述，張貼在臉書上，希望利用群眾連署力量，給予勞委會壓力。原本高度期待有所回響，結果卻不如預期，心情因此更顯失落。但仔細思考，我們周遭幾乎都是年輕族群，教保議題推廣具有一定侷限性，畢竟教保議題既非切身相關，亦非已獲高度社會關注的議題，想要一蹴可及獲得廣大迴響，似乎是我們急了點。我們卻藉此明白，部分弱勢團體即使面面俱到、完全掌握訴求，面對群眾時依然有著難以克服的難處。

公聽會當天，我們獲得教保工會製作的一件寶藍色制服，拓印的腳印旁寫著「ㄎㄧㄩ出來！」的字樣。我興奮地換上制服，頓時覺得神采奕奕，此時的我，

好像不只是個實習生，更是組織的一員。

一路上大夥兒快速移動，立法院戒備森嚴顯得格外肅穆，許多人都是第一次進到這神秘機關，想盡情表達，卻又必須按捺住那份澎湃情感。公聽會開始前走進會場，看見寫著「台大社會 李少彰」的立牌，才漸漸意識到場面的重大。

「其實，這只算是一場小型公聽會。」瑞連園長熟稔地說。

我們站在一旁看著園長不斷進進出出，向其他關心教保議題的與會者打打招呼，簡述今天的訴求和議題近況。她的舉手投足都散發著懾人氣質，卻不失那份親和力。

當來賓陸續到齊後，公聽會隨即展開。正反方輪流上台表述意見，立法委員屆時統整、發表自身看法。一開始，情勢一面倒向我方，教育司司長如打太極般將問題推托給勞委會，話語間充滿著「我不知道」、「可能」等不確定語氣；課長起初上台發言時氣勢凌人，看似沒有絲毫協商餘地，但台下也不時傳來反對噓聲。大致了解事件梗概後，我再仔細聆聽論述內容，總覺得針對爭議的各種說法總是話中有話，兜了一圈卻沒有回答問題核心。膠著之際，現場突然冒出一位「私立幼兒園總幹事」，在台下大聲嚷嚷著開會程序不公、沒有邀請私立幼兒園園長等等。大家開始竊竊私語，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意外」感到不知所措。依照公平原則，立委留給這位總幹事一些時間陳述意見，雙方一來一往，似乎沒有誰占上風；直到翁媽咪舉手發言那一刻，感動了在場的我們。

這是翁媽咪第一次參加公聽會，也是第一次站上台替同為教保員的大家發聲。她就著自身經歷，鏗鏘有力地表達論點，表達心中對變形工時實施後的害怕，喊出對制度的無奈，但仍不忘帶些詼諧口吻，我深深記得她在下台前的一句話：「我不是金剛，更不是金剛芭比」。這一刻，我與有榮焉的看著台上的翁媽咪，腦中浮現了與翁媽咪相處的畫面——真的就像打不倒的勇者，總能臨危不亂處理幼兒園發生的各種大小事，她很累，一天從早到晚沒有停下來過，但她永遠蹦蹦跳跳地出現在小孩面前；除了園內事物，她與同事們更努力突破傳統教學窠臼，找到公共

托育的特色並推廣出去。十幾年的教學經歷，我感動讓她有機會站出來的這一天，我感動，在這一天她願意站出來，為那些已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教保員發聲。

謝謝你們給我

這次的實習，一半時間在外走走看看，透過實地參訪，逐步描繪出屬於自己的圖像；另一半仍是以幼兒園為重心，參與課程活動，時而打打雜，時而當個小助手兼保母，每一次的經歷，都是場奇幻冒險旅程，讓我們盡情闖蕩。

● 看看另一組人

時間來到實習的第三個禮拜，課堂指導老師與助教一行人來到了高雄，和園長打聲招呼，看看我們是否安好。這天，除了我們這站，屏東的部落托育小組也等著老師們前往。我和裕宏像個小跟班似的告了假，跟隨著惠敏老師(指導老師)的腳步驅車前往屏東平和部落托育。

我抱著滿的好奇心，同樣是托育，但看著部落托育小組同學的實習日誌，總覺得和五甲有著很大的差異。一路上窗外景色綠意盎然，聞到田野間散發出的花草味，不一會兒就來到如世外桃源般的美麗境地，走在巷弄街道微傾的柏油路上，兩旁一覽無遺的坐落著平屋矮房，有的門戶敞開，傳出此起彼落的吆喝聲。手邊相機不停地閃啊閃，一邊大口呼吸新鮮空氣，一行人像極了劉姥姥進大觀園。有些居民在路旁隨意搭起棚子裡談天說笑，看見我們走過，便停止嘻笑聲，開始交頭接耳些什麼。對他們而言，我們是個外來者，雖然沒有著實表達些什麼，但對於陌生人油然而生的距離感，不明自白。

三個部落托育班的小朋友，對我們的到來感到好奇，熱情跑來擔任嚮導，一路上蹦蹦跳跳介紹著平和部落，弄得大家哭笑不得。逛著逛著，大家在附近涼亭下歇息，分享彼此的實習歷程。

聽著同學們的分享，真切感受到都市、鄉村這兩個天差地遠的蹲點。在資源有限的發展過程中，部落托育保有了珍貴的原住民文化，傳統舞蹈、遊戲、故事

等等，他們將這些融入在課程和生活中，這一切並非刻意經營。我很喜歡佶茜，一位自馬來西亞的可愛女生，她很勇敢、心思細膩，總用著圓圓的大眼看著你，炯炯有神地述說好多故事，來自不同國度，不同的生長背景，進入不同實習場域的我們，各自發展出一套生存之道，反映出彼此性格與生命歷經過的種種。實習生活裡，遇見的並非每每盡人意，人與人合作共事偶有摩擦、爭執或是抱怨，這過程中的掙扎、猶疑，最終化作一次次打開心胸的契機。

始終沒有說出口的感性，透過話語，我們依稀心靈相通。為了相同目標努力的一群人，不僅照顧著平和部落，對於初來乍到的年輕人，也給予相同的關懷和鼓勵。五甲和部落托育，細膩處理著擁有不同特質的我們。

畢業生回娘家

回到五甲，這是我們親手策畫的第一個活動，從企劃、文書到宣傳等工作，都是新奇的體驗。「畢業生回娘家」活動希望讓畢業生回到母校，和同學聯絡情感之餘，也一起回味幼兒園的童年時光。起初接到這個任務時，有些忐忑不安，畢竟參與對象是歷屆學生，即使熟悉部分學家長，但幼兒園前前後後也有百位畢業學生，我們仍必須透過電話與信函牽線，才能全面掌握畢業生的近況。此外，由於這是學校歷年傳統，家長也會一同出席，我們第一次站在大家面前主持活動，深怕表現不夠完美。

這些顧慮在點頭答應後就得暫時煙消雲散，我們開始執行「不可能的任務」。籌畫期穿插在實習的四個禮拜，我們利用空檔將前置作業逐步完成。其中最艱困的，應該就是地毯式搜索的電訪，有的家長聽見五甲興奮地聊上幾句，也有的家長懷疑我們是詐騙集團，還特地打回學校詢問是否真有我們所說的活動。

當站上舞台的那天，拿起麥克風顫抖的手，四肢不聽使喚的擺盪，所幸老師、小朋友、家長熱情回應，讓場面頓時活絡起來，而那一句句的回應，一股股注入血液，漸漸轉換成我的信心和動力。活動順利告一段落後，我們和一位小學六年

級的女生聊上好一會兒——她是五甲自治幼兒園第一個學生，分享著當初就讀的情形現在的生活。一來一往的短暫互動，我感受到那份真心交流的心靈相通，沒有說太多自己的內心世界，但她卻懂得我需要什麼，那股成熟氣質，不吝嗇給我鼓勵，即使是一面之緣，卻深刻難忘。離開時，是那麼有默契地沒有提起，未來是否會再相遇，只將它化成小小擁抱拍照留念。

樹苗滋長的養分

- 種子、發芽、茁壯

選擇了一塊遠離舒適圈的境地，毫不猶豫將自己埋進土壤裡，展開新的人生。

在這裡，吸收著陽光、空氣、水的滋潤，周遭不時出現素未謀面的過客，彼此聊聊天、分享當地的種種。慢慢的，我認識幾個深藏十八般武藝的好夥伴，擁有師者風範指引我方向，此時的我，依賴著外界不斷注入的養分，溫潤而美好。但聽著聽者，對土地上的風景越來越感興趣時，也漸漸自覺這單向度的施與受似乎不夠了。

「你必須成長」有人說。

只有自食其力，克服不斷推拉壓擠的痛苦，最後奮力鑽出土壤，才能深刻體會到，為自己用力呼吸著是多麼幸福。隨著風擺動身軀，時而含蓄、時而瘋狂。帶著那股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摸索著。

過程中總會遇上岔路的，當手中緊握得來不易的自由時，因為想要的太多，而迷了路。希冀那些完美，如海市蜃樓始終捉不住，但我從中學會了放下，有些東西帶不走、學不來；當自己越長越高，度量的角度開始改變時，往往忽略了底下那些花花草草，也在經歷各自的人生。試著彎下腰，說說話、輕撫他們，如同曾擁有過的那些陪伴，相互滋養的過程中，我們會一起茁壯。

不定期和小朋友們手牽手一起校外教學，充當木工敲敲打打重組書櫃，期待每天豐富多變的營養午餐，早上七點上班、五點下班……看似千篇一律的生活，在枝微末節處卻充滿著挑戰性。離開台北熟習的步調，代辦事項裡只剩下實習，少了「應該做什麼」、「必須做什麼」，沒有既定包袱，也沒有外務叨擾，雖然勞動不比念書輕鬆，但當什麼事情都變成一種嘗試時，即使忙得暈頭轉向，也樂此不疲。

一個月下來，我確信自己不會突然轉行成為幼教老師，因為光是體力早已被判出局。但在這兒打滾的時光，喜歡小朋友的心情依舊不變，反而多了為人師、為人母的氣息，除了尋回那份得來不易的童趣，也慶幸自己真真實實的踏上一片土地，拋開所有，盡情俯瞰、眺望，用各種角度細心體會它。

這些都是美好的一切，但美好不會直接向你袒露。

所有心情轉折，驚喜、憤慨、雀躍、失落，甚至有時會不小心失足而慌了陣腳。望向單純無憂的世界，能夠暫時忘卻紛雜，但很多時候，不想面對的事情，就算閉上眼睛，仍然擺在眼前不會改變。但如果不是這些顛簸，可能一輩子都在姑息自己，活在如同童話故事般美好幻想中。五甲給我的，除了那些令人懷念的純真年代，也提醒著我不要忘卻做人的根本，擁有這段深刻的體會，我必須跨越各種窒礙難行的現狀，將這些學習在往後的人生中生生不息傳遞下去。

實習近尾聲，幼兒園活動也幾乎告一段落，翻著行事曆，著實感覺時間飛逝的可怕。躺在床上回想幾個禮拜以來發生的點滴，看看相機裡索性紀錄下的畫面，開始捨不得離開高雄艷陽高照的好天氣、充滿嘻笑玩鬧的幼兒園，還有一群小鬼頭不時湊上來黏著你不放的甜蜜負荷。行前工作坊時，曾自不量力地說著，希望藉由實習帶給五甲些什麼；如今，儘管已使盡全力，依舊沒有勇氣回應當初無知的自己。或許，我唯一做到的，是毫不保留地給予感情，只有拼命釋放能量，努力學習如何照顧人，並在當任何人有需要的時候，能成為那個分憂解勞的角色。

在這裡，教育不僅是課本上死板的字句，互動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為感染

他人的力量，老師的用心也是，小朋友的回應也是。或許，這當中，我付出百分之百真心，只有百分之一的回饋；但誰也不知道，這百分之一對當事人有多重要，甚至有一天能擴展為更龐大的能量，進而讓更多人受惠。看著幼兒園、教保工會的人們，不計較付出成本，毫不猶豫衝鋒陷陣，帶著一股無私熱情，單純希望所愛的環境能夠變得更好，這股熱忱，或許是最真實、最能讓我帶著走的東西吧！

● 認識你和我和他

我想，我更有自信了。

其實，從小到大因為個性使然，是一個容易陷入自卑的人，總覺得不如別人，有很多缺點，擔心別人不會認同我、喜歡我，所以變得多慮。當初進到幼兒園時，和老師們並不熟悉，老師每天繁雜的例行公事，常常忙進忙出，即使知道有兩個實習生到來，也沒有機會能進一步了解。我們進班協助課程時，老師一開始並不會主動要求我們什麼，往往必須上前詢問，才會分配到拖地、擦桌子等庶務性工作，所以有時會像個冗員待在一旁，坐立難安。但隨著時間過去，參與班級、全校性活動，小朋友逐漸認識我們，開口閉口喊著「平平老師」、「綠燈老師」時，我們似乎也是可被依賴的一方，而這樣的轉變，成為與老師建立起信任關係的契機。

當初許多誤會、不解和挫折，以為自己不被接受，不值得信賴，常常鑽牛角尖往負面情緒思考，進入反反覆覆的焦慮狀態。看著實習夥伴悠然自得，有時也是奇妙的壓力源，我對自己發脾氣，不小心影響到裕宏，也影響了實習心情。下班後到附近走走看看，已成為自然的心情轉換模式；回到家，坐下來撰寫實習日誌，就像無聲地自言自語，不知不覺成為重要的抒發管道，陪伴著我度過每個難熬十分。

田野研究需要時間，實習也是。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們，每個人個性不一樣，因為相處，映照出彼此的不同，才看見自己的缺失，而這樣的發現，在和裕宏的

相處過程中特別明顯。記得接近「畢業生回娘家」的活動前夕，事情多了、細節問題一一浮現，按耐不住的急躁，悄悄地上心頭，常常壞了氣氛。以前，讀書、寫報告只要按部就班就能夠安然度過；但辦一個活動，現實中永遠參雜許多不確定因子，就算不斷事前設想、演練，仍難達到完美無缺。以前的自己，過度追求成果，努力過程像個刺蝟，刺傷他人卻毫不自知。裕宏委婉提醒、園長在聊天中一語道破，還有對老師們處事風格上的觀摩，一次次成為我反省的借鏡。此時的我，像是吸飽養分的海綿，帶著所有人給予的祝福和指教，踏上歸途。

我相信，讀書是重要的，尤其身處考試教育體制下，埋首於書堆中，在字裡行間來回啃咬，汲取各種理論知識，從中認同、批評、啟發進而成長。然而，我們常常就停在這裡，沒有回歸反省所在的場域。有時候，太過功利主義設定想要從中獲得什麼，拼命探究蛛絲馬跡，反而錯過了周圍的花花草草，最終一無所獲。做一件事，如果將目的退居第二，得到的，可能不完全是當初所預設；同時享受著沒有設想太多得到的自由，不再畫地自限，更能輕鬆擁抱迎面而來的——所有。

回首來時路

停 下腳步思考

看 到他人需要

聽 見別人聲音

在打草稿寫到綠燈哥哥（裕宏）這一段時，突然覺得人生就像過馬路，除了看紅綠燈外，停和聽也很重要。想起當初對自己的要求和提醒，化成這三個字雖然淺顯易懂，但完美實踐卻很難。

人生遇見的每一個人，在某些面向上，我們映照著彼此的同與不同、喜歡與不喜歡，這些都是一種主觀上難以言喻的感受。但若試著開啟感官、放慢腳步細品周遭的人事物，或許有些事真能因接觸因而改觀，或許有些事真的不合，但我

期許自己縮小飛舞的翅膀，輕撫著身旁需要溫暖的人。期許自己能吸取各種正向能量，讓內心成長茁壯，不帶刺地，打從心底付出關懷。

時間過得很快，從實習結束一晃眼到出社會，兩年過去了，很多人問我：你後不後悔念社會系？其實對這個問句背後的意涵至今仍感到含糊，但無論如何，我的答案很確信：我不後悔。雖然沒有主流所仰望著、汲於追求的功成名就，也沒有明確的一技之長，但在這裏，我接觸了不同階層的人們，用我所有的感官與這個世界共處。或許，社會學依舊有理論，但理論背後不可或缺的是「實踐」，它是一段長程的學習，必須用盡全身力氣去體會、經歷，且隨著年紀、階段的不同會有新的體悟。

我喜歡社會學散發的那股「人味」，理解事情的態度和脈絡是以人為本的，雖然五味雜陳，但也是它可愛的地方。當望出去的角度不只有一個，我開始思考、質疑以前認為理所當然的人事物，同時，也開始反省自己是否始終以同樣姿態待在熟悉的位置上。即使重新拆解、翻轉、建構這個社會，或許我們最終都會發現，其實不管待在什麼領域，有互動、有人的地方，都與社會學很近很近。

新頭殼——在現實中守護真實

網路在公民運動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毋須多言，也許茉莉花革命在時間和空間上離我們尚且遙遠，但是這一輩台灣的年輕人能有多麼微小的機會去忘記為了洪仲丘上街的白衫軍？社交網站做為媒介所串起反體制的力量不容小覷，這一次次的抗爭反駁了早先廣為流傳「萬人按讚，一人到場」的奚落，在螢幕背後宛似不可知的群眾，實際上擁有改變的物理性力量。虛擬的串流化為實體的抗議行動，正是這種過程的寫照。

在此同時，網路媒體在體制內的長征也在進行——是誰傳遞了抗爭的消息，讓一波又一波的援軍得以趕赴現場？是誰挖掘了檯面下的波濤洶湧，那些政府和企業不曾吐露的真相？網路媒體與公民社會，尤其是它們與年輕群眾的互動和彼此回饋的相輔相成更甚傳統媒體，甚至是因為這樣的連結而賦予它們力量。對於網路媒體來說，甚至是它們對己身的探索也成為標的，探究網路媒體有哪些呈現方式，它們和閱聽眾的互動將要把它們帶到哪裡？這是一個新聞可能的新時代。

在媒體的新舊分野之間，使用網路工具與否幾乎成為辨別的最重要指南。對新媒體而言，「讓讀者看到」這件事情本身常就是內容，是傾力達成的課題。在中國大陸屢屢遭禁的《陽光時務週刊》主編長平曾說過：「我們把發行口號定為『你一定能讀到』，在我的觀念中我會把反封殺本身當作內容之一。」中國大陸與香港新銳媒體與官方的角力以繞道而行，藉由人脈與網路工具實踐傳遞訊息的理想，而在臺灣，政府的介入不以暴力查禁，而以更迂迴的方式呈現，這究竟使得發聲空間廣納多元，還是使得橫亘在新聞前的障礙益發幽微難解？

本文介紹屬於社會企業的網路媒體——新頭殼，透過四個社會系學生的實習日誌，呈現網路媒體在這個時代的力量和局限，不可迴避的中心課題乃是：即便

呈現和應用的媒介不同，新聞的產製過程仍是端賴記者使用傳統的方式勞動，親臨現場、訪談和寫稿，多一付鍵盤並不意味著新聞產製所需的勞動時間縮短，正因為這種無法以機械替代的勞動，而使記者的勞動與網路媒體的發展空間緊緊相繫。

在這群學生的實習期間，旺旺中時集團擬併購系統台，自 NCC 審查，旺旺中時槓上大學生，乃至學生大規模的反旺中遊行，反映了網路媒體和傳統媒體之間的角力，以及網路媒體與公民運動之間的連動，透過學生的實習日誌呈現出站在媒體內部的思索，本文同時希望能將這個值得思考的議題帶給讀者：媒體屬於誰，為誰發聲？

實習記者手記

我所實習的單位——新頭殼，於 2009 年 9 月 1 日記者節上線，推動新聞改革，著重於三個部分：公民記者、開放編輯室和公評人。（詳細說明請參考新頭殼網站：<http://newtalk.tw/>）

新頭殼的成員秉持著自身理念，大量報導時常在主流媒體缺席的社會運動與人權議題，而新頭殼也多次因為與主流相異的價值觀甚或揭弊等實際作為而捲入紛爭中。另一方面，新頭殼仍保持了報導的多元性，顧及了主流的新聞事件，有利於自身的曝光。

我將實習中幾個大事件按時序排列，分別探討組織、事件與人之間的互動，以及節選當時實習日誌中的字句呈現實習記者在組織中的所見所聞。

- 林益世事件

此事件爆發於《壹週刊》披露了陳啟祥提供了當時聲勢如日中天的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貪汙的事件，是我們這批實習記者投入後最早發生的重大新聞。對於實習記者來說，這個事件呈現出媒體彼此追新聞的景象：這條新聞的背景是記者買壹週刊回來，根據壹週刊內文所提供的資訊完成的。聽起來非常令人激動的新聞，基本上卻可能是在行政院記者室桌子上看著雜誌寫成，這對於我們這些新手來說，是一件與想像有所差距的事。

在這個事件中，我看到的是新頭殼要分配各條新聞線人手是一件明顯有困難的事，為了保持新頭殼每個類項的主要新聞都能有所詮釋和呈現，它不像苦勞網只選擇了勞動和社運相關的新聞來做呈現，相反地，文化、科技和政治都各占去了一部分，幾乎每條線都只有一個專職記者來負責，因此，在這類新聞上，它很難做到獨家或是全天候的專注跟蹤，所以也幾乎不可能去到處堵人。在我眼中，人手不足卻意圖涉獵每個領域得出來的結果就是永遠過勞的記者們。

更進一步來說，新頭殼因為人手不足而固守臺北是可以預料到的，即便個別記者因為個別事件而出差，仍屬於較為罕見的狀況。

- 馬祖博弈公投

此新聞是我們投入後第一個與開放編輯室結合的新聞事件。在馬祖博弈公投舉行前夕，新頭殼邀請反賭博合法化聯盟何宗勳老師及其學生來開放編輯室分享他們在馬祖與居民對談的經驗，學生所分享的是馬祖人怎麼看待外地的老師與學生傳遞賭場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這件事，對這些當地居民而言，最頻繁出現的反駁論點就是，你又不是這裡的居民，你根本不瞭解這個地方，也沒有資格告訴我

們這樣好不好。面對這樣的反駁，通常是很難有結論的。我們可以看到何宗勳老師及其學生如同任何一個對社會學有所涉獵的人一樣，帶著對於經濟發展想像的反思進入這個場域，針對政府與開發商承諾的真實性提出質疑，但在一般大眾眼中，這些論據似乎很容易就被居民的一句話打倒。

開放編輯室提供一個平臺，類似於談話性節目的對談，大約半小時來呈現一個議題，並且提供一篇近乎逐字的文稿，透過這些資料，閱聽眾自然能自行對這些議題做出判斷。並且網路媒體的彈性也在於此，不侷限於呈現的媒介，甚至也不在乎是否能被第四台上架，它們能是文本、能是影像也能是聲音，它們與社交平臺和視頻網站串接。所有的一切都讓此新頭殼得以自由，回歸新聞唯一的要求，也就是資訊內容。

- 鍾鼎邦事件

這個事件是臺商鍾鼎邦在中國宣傳法輪功遭到逮捕囚禁，家屬透過國際組織和民間力量發聲，這個事件橫跨了七月至八月，在這個事件中除了政府之外，也可以看到媒體如何引介國際組織的力量與民間團體結合，更在於媒體在一項抗議或是援救行動能夠扮演的角色能到何種程度的積極。

回辦公室我聽開編打稿，是鍾鼎邦事件的詳細內容，其實我大多都熟了，可是第一次打到接近逐字稿的詳細程度，我一邊打一邊問自己，除了這個我還能做什麼呢，主流媒體真的不關注這件事，政府又只是口頭關心而已，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會有抗爭，可是啊，鍾鼎邦這樣一個台灣法輪功學員在中國會面臨什麼的處境呢，我讀國際關係時曾很仔細地讀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過程，我對鍾鼎邦可能會面臨怎樣的酷刑和虐待感到很憂慮，這不是第一例也不會是最後一例，除了打稿子和寫信，我還能做什麼呢。不過，令人欣慰地，我查了一下，自由時報

有跟進報導了，最後一段與我週五寫的稿如出一轍。

……走在雨後濕潤的馬路上，這是實習以來產出最少的一日，可是我衷心希望，有更多人瞭解這件事情，套一句賴中強（是時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在營救鍾鼎邦的記者會上多有發言）的話，我們須如冬江的魚，不斷游動阻止自由的江水結冰，等待春天到來。

開放編輯室：國科會報帳

這是七月的五個實習生嘗試從設定議題開始，到邀請來賓彭明輝，主持節目完成此次對談，乃至於放上線，新頭殼的編輯們完全放手讓我們去嘗試。

桂蘭姊姊走進來跟我們說，7/31 中午給我們五個人一起弄一次開編，真好都不用另外開口了……可是腦中真的沒什麼議題。我覺得彥瑄說的找陳東升老師坐在社會企業裡面聊社會企業好吸引人 XDD，不過既然我們的組成那麼多元，總覺得議題不要太偏一般人接觸不到的社會學區域好像會比較適合？芮菁說的影視相關的我還頗有興趣，不知道最後會變成什麼呢？……我覺得我一定會懷念這段日子的，不管最後到底可以觸發我多少東西。

雖然五個實習生來自不同的學校和科系，相同的是社會科學的背景訓練注定使選材上限定於某個特定範圍，最後決定選定國科會報帳為主題完全是學院趨向似乎是可以預見的。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原先預料彭明輝會就教授身分抱怨報帳制度的僵化，但實際上他認為國科會所給予的空間已屬寬鬆，在提問時就必須朝向這個方向追問而不能抓著原本的腳本演出，在現場轉播中有太多可能的突發狀況，我意識到如果媒體想呈現出某種特定觀點，是需要經過諸多事前安排或是事後製作的，但也並非是不可能的任務。

PPT 劣退新頭殼事件

今天結束得早，帶著這樣的心情慢慢回公館，看看相關新聞，吃著難得時間正常的晚餐，就看到了八卦板那篇文章，劣。退。新。頭。殼，因為新頭殼是公民新聞。真的傻眼，新頭殼是獨立媒體，而就算是公民新聞，又憑什麼封鎖呢。

PTT 引戰了，就這樣不知不覺看了三小時，其實我心裡是驕傲的，因為鄉民們找不到什麼焦點攻擊新頭殼，頂多什麼綠吱吱之類的，那沒關係，沒有媒體沒有立場的，我驕傲，他們找不到點攻擊我尊敬的這群人。

後來，看到有人說，旺中被中國置入性行銷的新聞，是新頭殼跟中時的仇恨，我才知道，阿北就是那位打電話給中國官員套話的記者，我覺得很驕傲，真的驕傲。

我們讓這群有理想，在媒體界強大立足的人這樣耐心的提拔，看到媒體的堅持，即使是守備姿態，在這樣的時刻，這樣的站得穩，真的很驕傲。

媒體做為媒體不可能毫無立場，選擇哪個角度去看和去呈現給讀者正是媒體存在的意義，這個事件是 PTT 八卦版版主之一的 hateOnas 發布公告，禁止轉錄公民新聞如新頭殼、卡卡洛普之新聞，並開始刪除之前的相關文章，因此引發版眾討論，在往來爭辯中呈現出網友對公民媒體的想像。

「綠」是相對何種價值產生的？部分網友的想像中綠象徵著「反對馬英九政府」而非對網路媒體存在意義的討論，而在新頭殼內部，編輯們第一時間討論的是「太久沒登入了，誰還記得 PTT 帳號，誰會操作？」，各種網路社交工具不管多冷僻，網路媒體工作者必須確保自己會使用，才能在第一時間親上火線，而身為新血的工讀生和實習記者通常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一定份量的角色。網路媒體藉由網際網路而賦權，獲得與主流媒體抗衡的力量，但同時，網路上也有潛在的異

議者，在網路媒體開啟新戰場時，他們所面對的主要挑戰者也迥異於主流媒體。

反旺中遊行

此次報導所有的實習生皆到現場參與，媒體做為社會運動參與者。這是七月結束的高峰，在旺旺集團收購中國時報後，又欲併購有線電視系統台，歷經與NCC的角力後，旺中成為媒體巨獸似乎是必然之事，而它大篇幅地動用報紙版面詆毀反對者成為了挑起此次社會運動的最後一根稻草。

搭了一小時的車到時報廣場，拿了發給學生的雨衣、隨手撿了玉山銀行前的垃圾，我的第一場社運呢，雖然身分是個記者，但從昨晚就開始緊張了。

豐嘉跟我們會合，叫我寫全場白描，賴義中寫學生發言，芮菁就變成旺中官方。站在台階上面對抗議學生，風雨交加，人群卻漸漸湧入，這樣的場合太煽情了。喊口號、唱戰歌，一面想要加入台下揮手抗議，一面為自己的角色驕傲，角色要分清楚。

握著錄音筆、溼了相機，用油性原子筆在溼了的筆記本頁面不斷記錄時間點與事件，有許多戲劇性的片段，例如中天訪學生，被要求自清；例如發言人在遊行空檔冒出。看到了純熟的動員手法，聽到了動人的學生宣言，這是媒體界的大事，熾熱的在眼前，意義非凡。

媒體做為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面對與己身相關的議題，要如何在報導上呈現，既保持相對客觀的口吻，又能堅定地反映自身立場，管理自己的情緒成為必要目標。在多個記者同時在現場時的協調，決定了一項媒體是否能做出專集或是僅能做單篇報導。

後記

- 隱而未顯的勞動條件

一般記者的所得略高於工商服務業受雇者均薪，身為社會企業的新頭殼，受雇記者的薪水則約為一般記者的三分之二。然而，這樣數額的薪水卻不足以反映媒體的隱藏勞動。

追新聞這件事情意味著永遠不可能固定的工時和勞動量，畢竟新聞在哪裡，哪裡就是必須趕赴的現場，筆者在做 NCC 與旺中案的追蹤時，一直到晚上九點都無法回家，而這卻是一個記者每日的日常。

身為記者無法控制新聞發生在哪裡，比較大型的新聞媒體也許配有汽車和 SNG 車，但是新頭殼這類小型媒體，記者大多騎自己的機車或仰賴大眾運輸工具，大量的移動卻沒有交通補貼的情況下，亦是一筆額外的開銷。更遑論記者們往往沒有時間找地方吃飯，若新聞發生在物價昂貴的市中心，記者可能得吃速食或是自帶食物解決。

- 水平組織內的垂直階級

在新頭殼內部約只有五到六位正職記者，並不形成一般公司組織內森嚴的階級，但乍見之下扁平的組織仍遵循著上對下的運作型態，但是記者和編輯間的權力平衡，似乎更仰賴他們彼此的人格特質如何磨合，而不單是倚靠他們的年資或寫作能力，這使得他們之間的互動更顯得因人而異，固定的規則難尋。

新頭殼的總製作甚少干預記者寫稿或發表的情形，所以正式記者乃至實習生皆是向總編輯彙報，總編輯時常會介入決定發稿與否，甚至是形式和頻率，在新

頭殼這個乍見之下非常寬鬆自由的組織在發表上的控制，初見之時不免令人訝異。筆者在觀察時抱著這是溝通討論過程的眼光去看，相信記者會有反駁或是另尋管道的機會，然而，就筆者個人在新頭殼實習一個月的觀察，記者即使不滿總編輯的決定，也只是私下抱怨，筆者從未見到記者反駁總編輯的決定，翻閱其他實習生的日誌亦可充分證明這點。

因為除了彭愛佳被偵訊沒有其他大新聞，H 給了我一篇身心障礙新制的新聞稿讓我修改。中午的時候，H 跟我講，早上她跟主編桂蘭姊姊在 MSN 上有一點衝突，因為主編覺得 H 讓我寫太多沒有用的新聞，可是 H 跟我說，我才來第三天而已，政治新聞又怕我還不夠熟悉會寫錯。主編姊姊說「這就是資深記者的問題了。」讓她有點不爽，「不知道是誰惹到她了。」

新頭殼的記者大多是資深記者，以本段發言的 H 為例，就曾在自立晚報跑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黨外線，不難想見專業能力被批評可能會引起的反彈，並且這個時間點引起爭論的甚至無關乎組織的存續，只是一個要安排實習生寫哪些報導的簡單決定而已。當然，衝突不全是負面的，組織內的衝突有時可以推展成員間的溝通，然而從 H 的反應看來，這類的衝突對她們之間的溝通毫無幫助，H 對於這個衝突的反應是「主編心情不好」，可見主編的批評不足以讓她認為自己的專業能力有問題，但同時 H 也完全沒有對主編的批評做出回應，而是對成為她們之間爭論點的實習生 W 抱怨，面對一個是組織的領導，一個是現下與自己關係最密切的成員，想當然耳，W 也不可能對此做出任何實質回應，對「組織往後如何分配稿件給實習生」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資深記者如此，組織中更為弱勢的成員就更飽受這類衝突所苦，最資淺的記者 L 受到的「主編訓話」就明顯多於組織內的其他成員，而 L 的反應就是在自己的臉書上抱怨以抒發情緒，然而 L 與主編對稿件風格的看法仍無法達成一致，最後 L 在持續的衝突中只能求去。除了薪水偏低外，筆者認為這些狀似隨機的衝

突，也是造成新頭殼記者流動率不低的原因。

為每個明天選擇立場

在旺旺中時違反了作為媒體該有的道德倫理，將媒體作為工具修理異議者時，許多身在旺旺中時系統裡的記者和作者選擇離開，游婉琪這位因此而廣為人知的年輕記者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即使現在上網搜尋，仍可找到相關報導。

當我們將這個名字鍵入 GOOGLE 搜尋，我們看到游婉琪在自己的部落格以〈人生總有非賣品 我拒絕旺中老闆保衛戰〉為題發表了她在中時攻擊黃國昌走路工事件期間寫下的日記，描述她署名的稿件如何被長官更動，她不願意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抹黑黃國昌而求去。作家馮光遠讚美她「台灣還有像游婉琪這樣年輕、正直的記者，我們擔心什麼呢？」、「我相信許多跟游婉琪一樣正直、有才華、有勇氣的年輕人，日後會一一在不同的事件、時間、場合站出來，因為台灣的民主價值已經深入人心」，她畢業的政大新聞系在網頁上稱呼她為傑出院友至今不到兩年，她在聯合晚報寫下了另一篇在社運圈引起軒然大波的〈燃燒吧！熱情社運圈不能說的秘密〉。

文中從頭到尾未見名姓，充滿臆測。不僅寫到男性學運領袖「很容易就會有女生主動示好。比較有道德一點的男生，頂多女友一個換一個；但也有男生跟每個女生都保持『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曖昧關係，一口氣跨足好幾名。且通常這些主動倒貼的女生，幾乎個個都年輕貌美，羨煞不少男性同胞」，又寫到抗議學生夜宿社運會場擦槍走火，「據聞男學生們放縱過後，隔天醒來，臉上難免帶著些許尷尬。潔身自愛的女孩更會相互提醒，沒事千萬別透露過自己夜宿過社運現場，否則容易無端捲入桃色風波，甚至引來莫須有污名」。這篇文章經過社運圈的轉貼討論後，許多讀者感到不明白的是，游婉琪離開中時是因為記者的道德

感使然，而這種影射的文章又難道有證據支持嗎？許多人留言表示自己感到訝異甚或惋惜游記者「淪落至此」。

在新頭殼的實習經驗教會我的就是，如果因為這樣的轉變感到晴天霹靂，那麼反而要檢視自己閱讀時是否投射太多理想在記者身上。每個人都是灰色的，記者也不例外，一個在勞動議題上開明進步的記者可能全然缺乏性別平等的意識。記者每天面對新湧入的各式題材，在每篇報導寫作上選擇了立場，每一天每一天這個立場可能都會改變，平時寫在報導前面的署名多麼被忽略，一個記者通常只有在最燦爛或最失意當下那個立場會被偶然地記住，而這個「記住」概括了她每天無止無休的訪談和書寫，她被記住的是停格的一剎那，某個截稿日前敲下的報導，而不是立場漫長的轉換與形成，甚至是與上司和讀者妥協的過程。

從另一角度看來，當我們走在社會經濟組織的創新道路上，試圖完善我們心中的社會正義，我們又何嘗不是走在這條漫漫長路上，我們不知道我們會在哪個時刻被觀看，哪個行動會被偶然地記得。我們就跟這些記者一樣，為了「長官」，為了閱聽眾，也為了能夠說服自己，選擇一個當下的立場，然後依循著行

四川社會科院五一二辦公室 - - 在國家與 NGO 之間尋找自我定位

課堂上教與沒教的事

來到社會學系，面對的第一個大哉問便是「社會學是什麼」？社會學使我們了解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如何運作、互相影響以及產生何種可能性。它可以是一種工具，在分析觀察之時放入社會學的思考與觀點，我們敏感於種族、性別、階級、國族等社會類屬對一個人的生活處境所產生的影響。

它可以是一種關懷與實踐的方式，從分析與觀察社會的過程中，社會學提醒我們個人煩惱與社會公共議題之間的關聯。因此在社會學的視角下，我們了解個人與社會之間複雜的關係，而在個人遭受國家的壓迫、制度的排除、他人的歧視時，我們能以社會學的視角看見議題背後有哪些社會因素影響著。正因個人煩惱與公共議題之間有所關聯，所以社會學鼓勵我們起而行，透過個人行動改變與對抗來自個人、社會與國家體制的壓迫。

社會學也是一種反思的能力，在社會學的視野下我們關懷且試圖改變這個體制，與此同時，我們仍要回頭看見自身。批判觀察與分析的過程中，社會學讓我們思考自身所佔居的體制位置處，該反省的是自我在資源分配不均的體制中擁有何種資源，而現下我們所做的每一個選擇，都與自身所擁有的資本、生命機會有所關聯。透過社會學的思考，才能使自己反思個人選擇背後的限制與影響為何。

在此次公共社會學的實習機會中，我所關注的是中國政府如何透過（男）同志 NGO 組織進行在地的愛滋治理，並且與台灣公共衛生體系與民間團體於愛滋議題的對話進行比較。在這次實習之中，雖然只是短期的田野觀察，但社會學的思考、實踐與反思仍舊讓我重新看待與分析議題，並讓我找到一處進入觀察的位置。或許，在社會學的學思歷程中，我們最終仍必須回到自身，探問著自身為何與此議題相關，思考著體制與個人之間的多種可能。

問題之初：愛滋議題與我

- 在農安臥⁸之後

農安臥發生於 2004 年的年節期間，警方破獲一起臺北農安街同志性愛派對，過程中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放任媒體記者進入現場拍攝，在當時無重大事件期間，於各媒體中大力放送，聳動的標題聯結著男同志、愛滋、藥物、轟趴的標籤，自此男同志與愛滋汗名便難以劃開。

報導中粗暴的拍攝僅身著內褲的男同志或坐或蹲在地上，透過畫面效果報導中標示出照片中愛滋、梅毒、菜花等性病的感染者身份。這些裸身男子在畫面中被標定為感染者的身份，在媒體不斷報導下刻印於人們心中。然而事件過後的追蹤名單中，28 名愛滋感染者並未增加，即在過程中並無新的感染者出現，但記者卻對這些數據未加以報導。

整起事件對於男同志社群的影響深遠，有人難以承受感染者身份的曝光而辭職，有人與家人之間產生衝突，甚至有人難以面對曝光之後的壓力選擇自殺。農安臥之後社會串起了男同志與愛滋之間的關聯，但卻未更進一步討論，因此留下社會對愛滋的恐慌與道德批評。

- 愛滋，與同志運動

台灣九零年代解嚴之初，各種社會力量醞釀著突破體制束縛的力量，準備大力訴說自己的故事。在此之間許多社會議題藉著媒體倡議、公開抗爭等體制內與外的手段對抗加諸於個人的壓迫與排除。同志運動也在當時逐漸形成一股力量，對抗著異性戀社會的不友善與歧視。

台灣首次同志公開進行抗爭事件為 1995 年抗議涂醒哲事件，事件導因於台

⁸ 農安臥事件：2004 年 1 月 17 日警方查獲一起同志性愛派對，由於報導時間於年節期間並無重大事件，因此大力在各家媒體放送。警方搜索過程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讓記者隨同進入取得新聞媒材，為該年重大同志侵權事件，報導中充斥男同志、藥物、愛滋、轟趴等詞語，自此愛滋汗名與男同志社群劃上等號，同時影響往後新聞報導同志議題的形式。

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涂醒哲教授接受衛生署委託之〈同性戀者流行病學研究報告〉之計劃。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將同性戀視為愛滋高危險群，並以統計數據推論男同志與愛滋感染率的高相關性。然而其研究數據卻有量化方法上的問題，例如：統計樣本僅有 107 份（問卷回收率為 2.61%），在這薄弱的數據基礎上，該研究卻「大膽地」推論出結論⁹。因此後續引起大專院校同志社團、同志團體、婦女團體集結與串聯，共同發起「同志串聯—反歧視之約」遊行，抗議醫學研究粗暴且惡意地將同性戀社群指為愛滋感染的高危險社群（高穎超，2013）。當時的社會氛圍與現今截然不同，那是一個校園同志社團草創初期、社長仍擔心曝光而請異性戀女性友人擔任人頭才能申請成立社團的時代。這一場台灣首次同性戀公開抗爭，使站在第一線的運動者承受了同志身份與愛滋感染的雙重汙名。

此事件中，醫療單位透過草率的研究方法與粗糙的資料將同性戀社群指涉為愛滋的高危險群，使得民眾只接收到「同性戀為愛滋感染高危險群」的資訊，排除了其他危險性行為的感染可能，在政策中，則是以恐嚇的方式引起社會大眾對於愛滋的恐慌。而這些，都無助於愛滋防治。

涂醒哲之後陸續出任衛生署署長、台灣紅絲帶基金會董事長，對於台灣愛滋防治政策影響甚大。從抗議涂醒哲事件中可以看到醫療學術如何透過研究將同性戀社群貼上汙名標籤，該事件為同性戀首次公開抗爭，愛滋議題同時也成為同志社群內部重要的議題，因此，即使到現在愛滋議題仍是台灣同志運動所處理的重要議題之一。

- 社會學、愛滋與我

1995 年的涂醒哲事件、2004 年的農安街事件相關新聞我皆未親身經歷過，然而這些資訊所造成的同志愛滋汙名卻連同著我的同志身份，不斷在旁人口述、大眾傳媒、學術論述中再再提醒著我，在這個社會認為「同志」與「愛滋」兩概

⁹ 資料引述自：高穎超，同性戀與學術調查（一）：楔子／樑子。資料來源：
<http://socioequity.blogspot.tw/2013/05/blog-post.html>

念之間大有關係。過去的我，面對自己的同志身份的同時也面對著社會對於同志的「認識」，然而這些事件以及相關新聞訊息，與過去的我都有著一段距離，我甚至一無所知。

開始熟悉農安街事件的始末以及影響是在大一修「性別研究」課程時，當時的我選了這一系列新聞事件進行分析。我開始了解大眾傳播、新聞如何在當時大力放送那些赤裸的男體，藉此陳述「毒品」、「愛滋」、「性」與男同志之間的關聯性。媒體的窺探、強硬涉入的偵查過程皆粗暴的灌輸人們這些關鍵字之間的關係，因此，我開始意識到國家機器如何透過警察與大眾傳媒聯手將男同志視為「高風險」社群，並貼上種種汙名標籤。而農安街事件後也形成了某種新聞播報男同志轟趴的範本，形成現今傳媒中既定的「破獲男同志轟趴」SOP 程序。

涂醒哲事件則是在研究方法課程中論及數據資料推論與學術倫理的議題時，才開始有所認識。深入了解後，我看見國家透過公共衛生、醫療專業的介入，使得男同志社群被指認為高風險社群，同時承接著來自國家的篩檢、個管機制進行揪出與管制感染者的暴力。

這兩件事是台灣同志運動中重要的兩項愛滋汙名與男同志侵權事件，這些事件背後所代表的是國家、社會對於男同志與愛滋疾病汙名的勾連，以及這些勾連所導致的傷害。社會學的思考使得我們將個人煩惱中連結至公共議題，這些在新聞媒體、學術研究中對於男同志社群貼上標籤、強化刻板印象，並將男同志視為高危險群、作為愛滋防疫政策中的論述基底，影響台灣愛滋防疫的政策操作。而身為一名男同志，國家與社會對於男同志的刻意標籤與劃分，都使得任一名男同志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承接著這種汙名與指控，也因此選擇社會學系並且關注同志與性別議題的同時，自身男同志的認同亦不斷提醒自己愛滋議題與自我的靠近。

三、災難與重生

救災的弔詭

民間組織過去在中國並沒有太多元的發展，原因為中國官方的控制。然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之後災情嚴重，政府的科層體系難以迅速地延伸至在地救災，因此開始藉著民間組織在地發展的特性，組織性的由下而上進行在地問題的協助與資源整併，是故汶川地震為中國民間組織興起之重要背景。

隨著課程實習機會來到四川成都時已是 2012 年夏季，距離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已經過了五年。此時四川北方許多縣城已經停止救災行動，由於部分地區災情過於嚴重，部分縣城在政府指示下進行遷都的應變措施。可見當時川北歷經巨大鎮災後，居民與社會之間的連帶在一繫之間被震碎，社會失去了既有的生活秩序，川北縣城中歪斜的災區景象彷彿讓時間停在劇烈搖動的那一刻。

汶川大地震被視為是中共建國以來歷經最嚴重的自然災害，震央位於西南內陸的四川省北部，造成超過七萬人的傷亡、失蹤，是唐山地震之後最為慘重的一次天然災害。川震造成的損失難以估計，四川、甘肅、陝西等省災區的經濟損失估計約 8451 億元人民幣，災區中通訊、交通、衛生、居住、少數民族文化等皆受到嚴重地破壞¹⁰。台灣位於太平洋火環帶之上，921 強震的記憶仍刻畫於許多人心中，突如其來的巨大災難，切斷原有社會既有的連帶關係與生活秩序，帶來了生活的失衡、秩序的瓦解，同時考驗著國家政府的災變能力與市民社會對於生活劇變的適應。

在災難相關研究中提及，巨大災難降臨後，社會中原有的連帶關係被破壞，因而陷入暫時性的混亂與失控中。而人們對於失序狀態往往存在兩種迷思：第一是對災民心理的錯誤預設，認為災民將會陷入失控混亂的狀態，甚至開始趁火打劫；第二是期待國家政府扮演重建秩序的角色，在媒體與民眾的想像中，國家政

¹⁰ 汶川地震發生於 2008 年 5 月 12 日，震央位於四川省羌族自治州汶川縣映秀鎮附近。其造成四川、甘肅、陝西省巨大損失。相關資料引自 wiki 相關條目。資料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B6%E5%B7%9D%E5%A4%A7%E5%9C%B0%E9%9C%87#cite_note-people_sept-4

府被賦予「控制大局」(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的全能形象。

然而事實上，民眾面對災難時傾向堅守家園，而這也提高災難撤離的困難度。災民其實比想像中堅強、理智；相反的，政府則是陷入資訊殘缺、領導混亂的行政崩潰狀態，暫時性的失靈使得政府投入救災工作的速度緩慢，因此民間團體進入災區救援的速度往往先於政府的救災團隊。面對災難降臨，政府的失靈 (state failure) 拖延了進入災區搶救的時間，民間團體反而較具機動性且能在第一時間了解在地需求，因此救災工作多是由民間團體展開。川震之後，中國當局面對的救災限制是四川省北方縣城地理位置偏遠，使救災工作難以迅速推進，國家欲掌控全局但卻礙於地理位置、交通網絡、資訊殘缺等問題而遲遲未能有所進展。中國當局因此開始著手民間公益性組織的設置，改變過去由上而下的統治操作手法，換以自基層做起、由下而上地統整災區的在地需求，以進行更為靈活的救援與資源調度⁴⁴。

- 孵化園：串連在地與政府

川震使中國當局意識到國家力量難以迅速且有效率地進入災區進行搶救，因此原先長久經營在地議題的非政府公益組織成為中國政府分憂的援手。而川震重大災情也促成大量物資與捐款投入，使許多公益性組織相繼成立，也因此 2008 年被中國政府稱為「中國公益元年」¹²。

至四川成都之後隨著林宗弘老師的帶領，我們在 7 月 19 日來到成都市中心

⁴⁴ 本段參考自林宗弘老師於〈中央研究院〉週報第 1386 期—知識天地：認識災難、治理災難—社會科學的新視野一文。文中提出災難研究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密切關係，並提出經典災難研究中的發現。

¹² 「中國公益元年」：川震之後，中國官方改變對公益性組織態度的轉變，投入資源促成民間公益性組織的成立。引用資料：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lax_14/24144128/article-%E5%B7%9D%E9%9C%87%E5%BE%8C%E7%99%BE%E8%8A%B1%E9%BD%8A%E6%94%BE--%E5%A4%A7%E9%99%B8NGO-%E6%94%B9%E9%9D%A9%E8%B7%AF%E4%BB%8D%E9%95%B7

的公益性組織孵化中心：「芳草益州」。芳草益州主要負責連結在地組織與政府資源，使得草創的公益組織能夠在初期掌握資源並系統性地組織化，如此才能合法地進行註冊、被編入政府轄下，藉此取得更多的組織資源。孵化中心的組織宗旨為串聯地方公益團體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使其能夠在地生根、穩定運作，而這些透過孵化中心與政府串聯以取得資源的公益性組織在中國被稱為「恩派」(None Profit Incubation, NPI 取其音念做恩派)。恩派的運作模式首先始於 2006 年上海浦東，透過連結地方與政府，培育出新的組織與專業人才，使中國政府看見恩派模式對社會問題與社會需求敏銳的觀察力及行事效率。因此當局開始進行恩派模式的推廣，之後陸續成功複製其運作模式於上海、北京、成都、深圳等地。

08 年川震之後，芳草益州成為「南都公益基金會 512 災後重建資助項目」的四川聯絡處。並在 09 年後於成都政府的資助下正式獨立註冊，成為成都地區連結地方組織與政府資源的樞紐。

隨著社區服務需求的湧現，恩派發展出「社區服務平台」，進入在地社區，與其共同發展公共空間。芳草益州的外觀就如同高級社區中心一般，建築物內部是運動場、電腦教室、圖書室等空間，透過公共空間的設計，使臨近社區能夠與孵化中心一體化，以空間的友善取得民眾與公益性組織之間的信任。

這股由下而上的社會力量可以視為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這股力量凝聚、組織、串聯在地資源，並經營各地區的社會問題。政府透過恩派與公益性組織建立資金與處理社會問題的關係，雖公益性組織能夠藉政府的資金補助與行政相關程序更進一步的進行組織化，然而也因與政府之間的資金補助關係，過程中勢必與政府有所協商與斡旋，形成一種「政府提供資金，組織拿錢辦事」的關係。組織對於特定議題的關注往往必須在政府的審視下進行，因此當政府認定特定議題需解決時，該組織才能開始取得政府的資源。

因為選擇與政府機構合作，資金與議題的關注需要有所妥協，所以部分在地經營的公益性組織寧可自行籌備款項，也不願意在政府的掌控之下進行相關活動。

他們不透過孵化中心合法註冊、取得資源，因此這些組織不如透過孵化中心成立的其他公益性組織科層化、資金來源穩定，但卻有更為彈性的組織共識討論，與對於議題更彈性的操作空間。

起而行：田野中的開展

- 「嗨！你打台灣來的？你好啊！」

這次實習在初次到四川成都時，其實一開始並未決定未來會將何處作為田野¹³進行觀察，但是在下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的當晚，手機中的交友軟體¹⁴便傳來了訊息那是來自宿舍房間的斜對角房的問候訊息。C 因此意外地成為了我在四川成都的第一位朋友，同時也成為未來我在滾雪球認識其他受訪者與串聯在地同志資源¹⁵的重要報導人。

當晚我便與 C 至社科院頂樓聊了一陣，話題中除了提到各自的社會學與傳播學等所學專業，對於「台灣」、「國家」的看法也是話題之一，我也問及中國與台灣同志運動的脈絡，想要了解兩地同志運動的狀況。在話題之中，最有趣的便是 C 觀察到我的語調帶有「台灣腔¹⁶」。由於四川位於中國西南方，因此當地人多屬於體態纖細、皮膚白皙的南方身體樣貌，而這剛好與我的外貌有些相似之處；

¹³ 田野：在此使用「田野」而非實習是因為起初透過申請來到四川進行在地組織的訪調，然而參與計劃的學生仍舊要尋找新的議題進行觀察、分析，作為實習日誌的內容。因此最初進入的實習單位與後來透過交友 APP 認識的受訪者、機構田野是不同的場域。因此另以「田野」一詞表示。

¹⁴ 交友軟體：男同志社群間的人際網絡從過去聊天室、交友網站到現今智慧型手機中的交友軟體越來越便捷。由於同志身份較難曝光，因此發展出許多社交網絡的管道，所以在來到四川成都之後，意外因為交友軟體認識了一位在地人 C。

¹⁵ 同志資源：此指在地同志機構、社團等提供社群連結、衛教、議題培力的資源連結。

¹⁶ 台灣腔：所謂台灣腔被認為是相對於普通話語調短、急促、剛硬的「陰柔」語調，C 所認知的台灣腔是一種溫柔、綿密、引人酥麻的陰柔語調。如在台灣的語境下，「我們去吃飯吧！」與「去吃飯唄！」台灣腔的尾音往往會拉長，而普通話則是急而且短促地收尾。

若再加上我的語調中帶有所謂台灣腔的口音，在四川當地會較有可親性，較容易與當地人較易建立起關係。

在往後的日子中，我的台灣腔的確不斷被成都的男同志朋友們提及。由於台灣腔的溫柔、酥麻特性，當地不少同志朋友很主動地認識我，在進入田野與認識朋友時，我的身體樣貌與說話口音都使我在當地具有一定的可親近性，為我減少許多結識新朋友時需付出的成本。

與宗弘老師來到四川成都時，主要循著老師的研究興趣關注成都當局的社會保險與川震、公益性組織的議題。川震造成的社會失序與中國政府對於 NGO 的納入治理策略，亦是思考中國愛滋 NGO 運作的重要背景之一。

來到芳草益州孵化中心，是我了解成都當地公益性組織運作的開始。首先我透過機構工作人員英子的介紹，認識了成都同志組織的志願者 C H，他是「成都大學生同志聯盟（簡稱成大同盟）」的志願者。C H 向我介紹成都目前同志組織如同樂、愛白的狀況以及主要處理的工作項目。

成大同盟為跨省份的大學生同志社團聯盟，關注校園同志議題，如親子關係與出櫃、Money Boy¹⁷、愛滋汙名去標籤化等議題，其中著重愛滋干預¹⁸的項目中。其組織形態類似大學學生會，透過培訓的經驗累積進行參與者培力，倡議同志議題同時滿足社群內交友的需求。C H 認為這樣的組織可以視為青年團隊爭取權益的表現。如同台灣校園中的同志社團¹⁹，除了透過社課進行議題探討、聯誼外，也在校內辦活動進行議題倡議，因此同時具有學術性、運動性與聯誼性的性質。成大同盟於校園中的倡議手段則是透過校園沙龍討論青少年同志議題，並且

¹⁷ Money Boy：消費客群主要為男性的男性性工作者，透過社交網絡、交友軟體等管道尋找客人，並提供伴遊等情緒勞動服務，同時依據著客人的需求與付出金額給予不同的性服務。在中國多被稱為 MB。

¹⁸ 愛滋「干預」：為中國官方使用的詞彙，意指透過教育、倡議等方式使人們了解愛滋的防治議題與如何保護自己。

¹⁹ 台灣校園中的同志社團：此指台大、政大、師大等校的同志社團，較有固定社課與聯誼性活動。

透過媒體曝光達到宣傳效果。

在愛滋議題上，由於中國人口基數大且青少年人口比例高，因此成大同盟主要針對校園中的青年進行愛滋干預的沙龍討論，著重於感染者法律權益、身體營養、藥物申請等主題的探討，並且在成都地區的酒吧、浴池（三溫暖）提供保險套與潤滑液，並進行衛生宣導。

成大同盟過去的資金主要來自於全球基金，然而這筆資金將於 2012 年結束補助，因此成大同盟開始透過至孵化中心尋找相關資源，以使組織能夠繼續穩定的運作，而其他同志運動組織則也是透過關注愛滋項目以獲得政府的資金補助。

透過英子與 C H 的介紹，我開始認識四川成都當地的同志組織與愛滋議題的發展概況。在中國，同志議題仍是一個敏感議題，因此並無法直接以同志組織的名義直接進行組織註冊，這也連帶影響組織所能取得的資源多寡。然而愛滋議題卻已被中國認為是重要的社會問題，因此政府反而投注資源於關注愛滋議題的組織，相關的男同志組織也連帶開始著手相關的愛滋干預項目。在與 C H 的訪談中，我注意到愛滋項目在中國的社會問題化，使得同志組織能以關注愛滋的方式得到政府的資源。

台灣關注愛滋議題的組織訴求，在「公衛防治」與「感染者權益」兩方向，呈現光譜般的分佈。疾病管制局與紅絲帶是以公共衛生視角進行愛滋防治，而其他組織則是依「公衛－感染者」的立場靠近進行排序，如關愛之家、露德、權促會、熱線等組織則是從感染者相關權益的保障與愛滋去污名的議題方向出發，這些組織面對愛滋議題有著不同的倡議方式與議題立場。台灣的愛滋機構現況呈現多樣且異質的發展，隨著路線與立場的不同，連帶也影響了尋求組織資源的方式，如熱線較多從個人捐款與募資中獲得資金籌備，而紅絲帶基金會則是有政府提供的資金，而資金取得方式則又影響了組織面對議題的態度與方向。而此現象在四川成都的愛滋組織中可以見到，但由於同志議題本身的爭議性，影響了資金取得方式和立場倡議的方式。在中國政府力量高度介入的社會情境下，公益性組織若

欲註冊並取得資金，便與政府形成「我（政府）提供資金，你（組織）拿錢辦事」的關係，而這也影響組織如何處理議題的態度立場。

中國成都與台灣愛滋組織的發展狀況有些類似，同時也因為政府對社會之間的介入程度而影響組織運作。隨著與政府資源的靠近，議題倡議的立場與手段就會受到政府的審核與限制，也因此相對於靠攏政府的機構，民間組織則較能有自主的空間進行議題的推廣與倡議。透過芳草益州孵化中心的工作人員英子與C H的介紹，我開始了解中國愛滋組織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況，而愛滋議題也與我自身的男同志身份切身相關，因此，我想要進入成都當地愛滋組織的田野中，同時探究中國與台灣的爱滋運動與同志運動發展是否有相近或相異之處。

● 同樂

起初我透過在田野中累積的人脈，進行滾雪球的訪談，以了解不同組織的運作方式與志願者、同志議題的操作策略究竟為何。

透過同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中的C聯繫介紹，我認識了在「成都同樂」擔任志願者的W。與W的訪談過程是對於成都同志組織認識的開始，我從組織志願者的分享與介紹中建立對於同志組織與愛滋議題的圖像。

「成都同樂」組織的主要理念為「同伴教育、關懷、自主發展」。組織透過志願者的培力、校園中同志社團與公益服務社團的串聯，進行校園據點的拓展，以「同伴教育」、「談情、談心、談性」的方式深入、貼近學生社群網絡之中，進行L G B T、健康權益、同志文化、愛滋與感染者議題的倡導。其中愛滋為組織主要的工作項目，如同志健康關注、愛滋篩檢服務、陽性關懷、藥物取得等議題，皆為倡導的重點。

W以河南愛滋村、媒體形塑愛滋汗名的例子說明中國當局對愛滋議題的態度轉變，從過去的隱瞞到開始投入資源關注，在政府面對愛滋議題態度的轉變中，同時也看到衛教在中國地方的推廣不易，以及愛滋在中國的嚴重性。W以國家疾

管局的公共衛生的數據說明成都當地的愛滋擴散狀況，而其中可能還有隱而不報的感染者群眾，因此實際感染人口應高於官方所公佈的數據。所以安全性行為與感染者健康的倡導便顯得更為重要。河南愛滋村的例子讓W意識到安全性行為推廣的重要，也因此對於同樣在強調安全性行為、男同志衛教的成都同樂較能夠有所共鳴進而投身組織工作中擔任志願者。

過去，同樂其中一項資金來源是與中國政府合作才取得的「全球基金」，但2013年同樂已不再和中國政府合作，因此也中止了這筆資金，這卻仍不影響同樂組織的運作。「同樂組織將會從中國政府取得另一筆資助基金，而這筆基金在中國僅有具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士能夠申請，同樂CEO絕對有這資格。」W有自信地說著未來組織的資金該要如何籌措，同樂便透過與中國政府交好的關係，在資金籌措上省下不少氣力。

在組織結構方面，同樂是以科層系統運作的公益性組織，因此層層分級與陞遷制度是組織鼓勵志願者在工作項目中努力的方式，以支薪、工作陞遷等動機促成志願者為組織推廣工作項目，這是與其他同志公益性組織最大的不同。而這也是W最引以為傲的一點，在同樂擔任志願者能夠表現自己執行事務能力，藉此獲得陞遷以換取更高的薪資，因此同樂的組織目標便透過科層分工達到更有效地成效。對於W而言，其他同志組織內部並非科層式的運作，同時也因為資金較少而不對志願者支薪，這是他認為其他組織難以穩定運作與處理工作項目的原因。

- 愛白

與W的訪談中，除了對透過政府基金運作的組織有初步了解之外，也從W的口中注意到其他愛滋組織所面對的工作限制與困境。組織運作與資金籌措是最主要的困境，同時，中國政府對於組織的政治經濟影響也是原因之一。

因此我循孵化中心工作人員英子的人際網絡，認識了在「愛白」擔任志願者的朋友D。D目前於四川大學就讀，過去從學校活動中得知愛白的資訊後，開始

參與相關沙龍討論，並進入愛白擔任志願者。愛白組織是由民間發起、關注同志項目的組織，主要透過沙龍討論的方式進行認識同志、親密關係、伴侶關係、感染者關懷等項目的倡導。

在組織架構上，愛白是一個以工作人員為核心，並往外擴張、各自帶領志願者的組織，其中只有核心工作人員有支薪，其餘志願者多是透過各種管道得知愛白資訊後才主動參與的成員。面對不同的志願者，愛白一開始並不會給予特定的執行項目，而是透過不同的沙龍講座使志願者了解不同議題後，再從中挑選項目負責人帶入組織中正式執行項目工作。愛白這種非科層組織的架構主要透過觀察志願者參與沙龍講座的程度，再拔擢志願者成為相關項目負責人，如此操作是希望能留下有熱忱對組織付出的志願者，然而卻使得志願者的參與情況流動不定，進而影響組織項目執行的靈活程度，且該項目在負責人離去後，往往無法繼續進行。這也是民間發起、缺少穩定資金來源的公益性組織時常面對的限制與困境。

D在組織中主要負責的項目是愛滋議題，由於有醫學相關的背景，他因此能處理許多公共衛生與醫學對愛滋議題的相關討論。愛白在愛滋議題上，主要關懷感染者的身體健康與生活處境，因此，感染者日常生活中可能面臨的工作歧視、家人之間的親子關係、醫療照護上的權益等等，都是愛白主要處理的執行項目。比起其他組織著重於感染者在統計數據上的多寡、有多少感染者能接受藥物治療，愛白組織更加關注的是感染者本身的生活處境與自我認同。

D認為鼓勵個人進行篩檢、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在執行上是有困難的，「降低風險的做法是安全性行為」這樣的想法往往在認知上是一回事，在個人執行上卻又是另外一回事，D因此認為安全性行為的宣導關鍵在於同志身分自我認同的建立。在缺少性教育的國家教育下，個人也失去認識愛滋的機會，因此在防治上若只是從鼓勵篩檢、自我約束的安全性行為著手，未能使個人願意執行安全性行為。所以必須透過建立自我認同之後，願意接受自己的同志身份，才會提高個人執行安全性行為的機會。之所以如此認為，來自D過去在愛白擔任志願者時對身

旁朋友的觀察，雖同志身分自我認同與安全性行為之間的關係仍需更仔細的推論，但是D的想法卻也表現出愛白組織更加重視個人處境與認同的理念。相對於重視愛滋感染的擴散程度與感染者是否進入醫療體系中接受個案管理的愛滋組織，愛白則是從個人認同與生活中所面對的歧視處境中著手愛滋議題的倡議與推廣。

在中國公益性組織的發展過程中，08年的川震被視為是重要的轉捩點，重大的自然災害影響中國社會甚巨，政府難以迅速而有效的進入在地從事整建，因此透過在地公益性組織的地方深耕，由下而上回應在地的社會問題。透過孵化中心等機構提供資源，公益性組織能夠註冊、申請項目基金，但公益性組織的扶植與開展，同時也是一種收編。

在與成都同志組織志願者的討論訪談中，我初步的了解成都同志公益性組織與愛滋項目工作的概況。在成都同志組織的發展中，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影響著項目基金的申請以及工作的立場與態度，因此我們可以說，政治與經濟資源分配的狀態影響男女同志組織所能取得的資源與發言位置。

是否仰賴政府所提供的項目基金影響了組織對於項目工作的立場與態度，如同樂主要透過政府提供的項目基金維持組織運作，同時透過組織領導人有意識地靠攏政府，以公共衛生角度進行愛滋項目工作的防治。但自民間發起的愛白則是以自籌基金為主，資金取得較不穩定，但也因為較不依賴政府的項目基金，項目工作的立場與組織型態則能具特色風格，以實驗性的沙龍講座進行項目工作倡導。在愛滋項目上，愛白較關注于感染者本身的生活品質與處境問題，不同於站在國家公衛防治的立場。由此可見，公益性組織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除了影響資金來源以外，同時也影響相關項目的立場與做法。在這些志願者的受訪經驗中，可以看見仍具爭議性的同志議題因為愛滋而獲得了政府的關注，得到了政治與經濟上的支持。一方面，法律制度的鬆綁，使得組織的註冊較過去容易，但另一方面，孵化中心的中介，卻也使得組織項目操作方向與資金來源受到牽制。

在愛滋項目中，資源與政治資源在中國政府的分配下，有意識地投注於男同志組織中，然而由於女同志社群在中國尚未成被關注的社會問題，直到 2004 年才開始有獨立設立的女同志組織。掌握較多政治與經濟資源的男同志組織也因此 在運動策略中位居主導性位置，影響運動的方向。

在運動策略中男同志以科學實證的基礎建構了「先天論」的說法，以對抗保守宗教團體的治療論述，然而女同志的身份認同經驗卻不同於男同志的先天論調，情慾流動說法更能接近女同志的認同經歷。但此又與為了對抗「治療說」論調的先天論說法有所衝突，因此在男女同志之間有著科學實證的先天論與情慾流動的後天論說法彼此在角逐同志運動的論述位置的有趣現象。

同志、愛滋與田野中的回饋

最初透過公共社會學的實習機會來到四川成都的田野時，其實並未有太多直接而明確的問題意識，許多觀察的想法與視角都是逐步累積起來的。與宗弘老師一同參與了成都在地公益性組織的田野與訪調，開始了解川震之後中國政府如何回應在地的社會問題。隨著公益性組織的設立，象徵著中國地方社會的在地力量也開始凝聚，同志與愛滋議題便是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取得資源與註冊的機會，也在成都各同志空間與校園中進行同志與愛滋項目的干預工作。在此之中，公益性組織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為何？而不同的政治與經濟關係是否也產生了不同的組織形態呢？這些提問逐漸在隨著宗弘老師的機構參訪、志願者受訪過程中慢慢在心中浮現。

在社會學系的學習與訓練過程中，老師總會玩笑地說「做研究其實是很無趣的」，因此我們總要從自己關注的議題著手，才能在研究觀察中找到更多樂趣，也更能夠在田野之中發展出有趣的提問與觀察視角。在這次的四川成都田野之中，我從最初尚未有清楚的問題意識，到最後決定了解、比較成都當地的同志與愛滋公益性組織，選擇這項議題的原因，一部分來自於自己在校園同志社團、同志諮

詢熱線等團體中擔任幹部與義工的經驗，使得我有機會透過實際的組織參與了解到台灣同志與愛滋議題的面貌。這些來自於個人的參與經驗，一方面開啟我對同志與愛滋議題的認識，另一方面，則回應了因自我的男同志身份認同而開始關注的諸多社會議題。因此進入田野之中，這些來自於個人的經驗也成為觀察背後的知識基礎，構成了與此次成都觀察的重要對照經驗。

台灣與中國兩地之間由於政治、經濟等條件的不同，形塑了不同的社會樣貌，但同志與愛滋議題都同樣被認為是需要回應與處理的社會問題。在台灣，許多不同的組織關注著愛滋議題，他們因為與政府的關係不同而有著不同的議題立場與操作策略，如由前衛生署長涂醒哲所創立的紅絲帶基金會，是較傾向以公共衛生角度進行愛滋防治的機構，而同志諮詢熱線則較關注於感染者個人生活與權益的問題。從台灣的經驗中，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連帶影響組織對於愛滋議題的操作策略，若將此經驗放在成都之中，也同樣可以看到類似的發展，但由於中國對於公益性組織的管制與收編，不同組織的政治與經濟資源分配便隨著與政府之間的距離而有所差異。

在這次成都的田野經驗中，透過與同志、愛滋議題相關公益性組織的志願者訪談，了解中國與台灣兩地愛滋、同志運動開展的起點。兩地的經驗參照中，能夠看見愛滋、同志運動的相近與相異之處，希望這次觀察與書寫，能夠作為未來兩地間愛滋與同志運動互相學習與比較的初步資料。

卡債受害人自救會——聽他們的故事，探究自己的心

卡債與卡奴：個人欲望或結構歸因？

大三下學期，系上緊鑼密鼓的準備公共社會學系列課程：暑期實習。也經常在同為系列課程的社會運動課堂上，宣傳暑期實習的單位。當時僅僅抱著想了解的心態選了卡債受害人自救會，原因說來羞愧，正是因為它在臺北，不需要往中南部下鄉，對我這個都市小孩，付出的代價並不那麼多。

第一次接觸卡債受害人自救會，是在社會運動的課堂上，聽著輔大社會系吳宗昇老師提出各種數據來佐證他對卡債族的想法——卡債是結構問題，不能單純以個人行為與生活態度為歸因，解釋為個人無止盡的購物慾望帶來的禍患——簡單的幾句話，道盡卡債問題與一般人對卡奴的印象。對我而言，卡債問題相對遙遠，我個人沒有學貸，家庭也沒有其他的貸款，所以對於卡債問題是陌生的，甚至必須承認，自己原先對卡奴也有些許的誤解。過去對卡奴的認識僅來自於新聞媒體的報導，往往呈現個人消費慾望造成自己的債務問題，而沒有能力改變時，又往往以自殺的方式解決。在我看來，卡債問題的每個環節看起來都充滿了個人抉擇，怎麼會有結構的因素呢？

經過吳老師一堂課的解釋，我對於卡債問題有一個初步的認識，至少從數字來看，可以看到許多卡奴是中低階層的人口，獨自面對著巨大的金融集團。此外，透過追蹤卡奴陷入債務循環問題的後續生活，也發現卡奴是一群在社會中「消失」的群體，他可能是任何人，但我們往往沒辦法準確地掌握他們的現況，他們過著與一般人相異的生活：為了逃離債主的追趕，他們少有固定的工作、居所。儘管知道這些，我對於卡奴個人的道德標準、生活態度的道德還是有些許的疑慮，我瞭解到他們的生活困境，也明白他們面對的難題未必是個人的選擇造成，有極大的可能是整個環境帶來的壓迫，好比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筆意外的支出（例如：

生、老、病、死等各種突如其來的變故)都有可能讓生活不穩定的人陷入債務的危機。然而我始終無法放下自己內心的高道德標準，沒辦法完全被數字與論述說服，「難道卡奴不應為自己的行為完全負責嗎？」我不斷問著自己。因此，我想更瞭解這群人背後的故事，我想去卡債受害人自救會實習。

自救會概況與學生角色

卡債受害人自救會，以下簡稱自救會，是一個由律師、學者領導的倡議型組織，透過立法、修法，改變對受害人不利的現實處境。自救會的例會於每個月的第二個禮拜的週三晚上、第四個禮拜的週六早上召開，第一次參加時，除了本來已熟識的吳宗昇老師之外，還看到人權律師林永頌律師、長期關注貧窮問題的反貧困聯盟招集人簡錫堦先生，自救會的組成以這三個人為領導，搭配幾位長期參與的律師，以及負責行政庶務的幹部們。每次開會討論的內容不盡相同，除了律師報告修法進度、實習生提供近期法院裁決個案，供大家討論修法的效益之外，最重要的是讓每位新來的受害人講述自己的經驗，由律師給予法律上的建議。由於受害人工作、居所的不固定，他們往往無法定期開會，此外，也有許多受害人抱著「解決問題」的心態來參加自救會，一旦自己眼下的問題獲得解決，則實在沒有理由繼續待下去，種種原因使得自救會的成員流動性很大。

觀察到自救會高流動性，實習生試圖透過一些方式來改變這個情況。首先我們將自救會幹部分組，把新來的受害人打散進入不同的組別，由熟悉各種法律程序的受害人來告訴新人可以如何處理問題，這麼做有以下幾個好處。第一，許多受害人不希望自己的情況在公開的場合被討論，透過比較小的小組討論編制，可以扭轉受害人的心境。第二，在公開的場合述說自己的情況，必須相當有條理地組織自己的話語，好讓在場的所有人，尤其是律師，能夠在最短的時間瞭解個別受害人的情況；然而這對於處在極大精神壓力之下的受害人來說，相當不容易。透過編組，除了門檻相對低的話語能力，更重要的是，與自己有相同處境的人分

享，在我看來具有很好的培力效果。大家分享的不單單只是法律的程序，更多是如何面對債務、面對生活，如何重新站起來。

實習生在自救會的角色是不帶立場的組織參與者，我們的定位是學生志工，進來自救會是觀察、學習。透過耙梳每個受害人的生命故事，我明白自己過去將卡債受害人汙名為「卡奴」的不恰當。吳老師常常說，有卡債問題的受害人會來自救會，債務問題通常已經到了「沒有救」的階段，因為社會的價值觀認為欠錢還錢是天經地義，他們往往羞於承認自己有債務問題，自然就不會求助於他人；等到必須尋求幫助時，往往已經是迫不得已的「最末期」。在這個階段，我們要注意的，不應局限於錢的問題，卡債族由於各方壓力所造成的精神問題更是我們必須細緻處理的。從我的觀察來看也的確如此，受害人呈現焦慮、緊張，大多沒有辦法清楚描述自己的狀況。

學生在自救會的工作，簡單來說可以分成幾個組別：論述組，負責生產論述，將卡債的問題介紹給社會大眾；法律組，主要搜集法院判決，並統計債權雙方成功協商的比例，另外一部分是法律轉譯，將消債條例製作成淺顯易懂的懶人包；最後是訪談組，負責跟著吳老師一起訪談、追蹤受害人。分工基本上是按照科系來區分，論述的工作自然由我與另外一位社會系的學弟共同承擔，法律系的同學負責作判決追蹤，訪談則是有興趣的同學都可以一起承擔。

在自救會的實習，相較其他組織，不需要長期蹲點、密集付出時間與心力，但在這半年多的時間，我的價值觀改變很大，看到與以往認知的社會運動很不一樣的社會實踐方式。

討論實況

卡債受害人自救會是兩周開一次例會，不需要密集的實習時間，所以選擇卡債受害人自救會的實習生從五月就開始進入自救會實習。第一次實習是參加臺北律師公會的講習，當時因為《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剛修法，所以由自救會的周

漢威律師向卡債族介紹新舊法的差異，會後也將與會的卡債族分組，由不同律師個別諮詢，而我們學生也一併分入組中，藉以了解不同卡債族的狀況。在諮詢的過程中，卡債族分別講述自己的問題，他們在社會上所遭遇到的壓迫往往超乎我的想像，還記得當下的自己，因過去對於卡債族抱持諸多誤解而感到羞愧。不過我渴望聆聽卡債族故事的心，不停被律師打斷。往往發言者敘說到一半，律師就會開口問：「請你講重點。」、「到底欠多少錢？」、「名下有無財產？」等問題，雖然這些才是律師在處理案件所需要的資訊，但在這段對話中，我深切地感受到雙方專業知識的差距，及其可能帶來的壓迫。由於是第一次參加自救會的活動，看到自己小組的律師對卡債族的提問感到不耐，讓我對未來在自救會實習抱著戒慎恐懼的心態。

正式進入自救會實習後，學生必須參與兩周一次的例會，每次的例會除了律師、幹部之外，成員基本上是不固定的。多數人大多參與二至三次，解決自己的問題後就會離開，這也造成自救會掌握個別成員的工作有些許的困難。一般來說，開會的流程進行有跡可循，雖然偶爾會有突發的事情必須優先處理，但多半是由新進的卡債族介紹自己開始。自我介紹對一般人來說並不是個問題，來到新的環境，讓大家認識自己本來就是天經地義，但這個過程對卡債族非常不容易。通常會來到自救會的人，常常由於自身的債務已經不堪負荷，被債主長期騷擾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在這種龐大的精神壓力下，他們願意尋求陌生人的幫助實屬不易，自身的精神壓力以及強烈的自我否定情結，使得在公開的場合講述自己的經驗變得極為困難。在我參與例會的經驗中，就多次碰到只願意說自己名字的卡債族，對於自己為什麼要來自救會則是三緘其口，甚至在自我介紹場合當場掉頭走人的情形也曾經發生過。

自我介紹完之後，由會議主持人開始這次的修法討論，不得不說，這部分的討論對卡債族來說有些困難，畢竟瞭解生硬的法律文字對一般人來說需要相當高的門檻。然而在討論的過程中，林律師不惜犧牲會議進度，努力解釋法條間的箇

中差異，力求在場的所有人了解法律條文，進而加入討論。所以自救會在設定修法的內容時，並不只有律師的專業意見，卡債族自身的意見表達也占有一定的分量。

將第一次參加臺北律師公會的講習與之後在自救會的實習相互比較可以發現，律師個人如何看待卡債族是影響雙方交流的關鍵，當律師抱持著專業的知識，對卡債族的提問、意見充耳不聞，對雙方的信任關係都是傷害；反之，如果律師並不總是將專業知識奉為圭臬，則彼此的交流將會相輔相成。對於自救會的倡議、修法都有極大的幫助。

自救會修法目標之一，是修改民法夫妻財產制的相關條文。以往卡債族的債務問題僅限個人與銀行之間，但銀行在發現債務人的還款能力已經被榨到極限後，轉而將目標移轉到債務人的配偶上，而能夠這樣做的原因，只是因為過去民法規定夫妻的婚後財產是雙方共同擁有，離婚時各分一半。但除了離婚之外，為了保障債權人的權利，債權人也可以要求法院宣告夫妻財產為分別財產，使得債務人在婚姻關係中獲得的財產瞬間在違反夫妻雙方意願之下，分為兩半。在修法之前，民法 1031-1 條規定婚後不管是男女雙方都外出工作，又或者是一人工作一人在家，婚姻關係中取得的財產基本上為共有財。如果法定財產制消滅的話，就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過往這麼規定的原因，乃是為了避免在家主持家務的女性因為離婚，失去了經濟基礎，同時也肯認在家的一方對家庭的貢獻。該法雖屬立意良善，但在現代社會中卻與現實脫節：因為在民法 1009、民法 1001 同時肯定了婚姻雙方以外的人，代替兩人做出分別財產制的決定。法律沒有與時並進造成了銀行、資產公司濫用這個條款。

實習當時就遇過一些離譜的例子：有對夫妻因為丈夫積欠銀行債務，銀行為了迫使配偶還錢，向法院要求宣告分別財產制，太太因為心生恐懼，竟然決定跟丈夫訴請離婚，以為可以不用幫丈夫還錢；結果這麼做卻是幫了銀行一個大忙，銀行反而可以逕行代位請求剩餘財產。另一個例子是，夫妻已被宣告分別財

產制，銀行決定拍賣他們的房子，再拿走一半的費用以償還債務，太太很著急，因為除了房子之外她什麼都沒有了。

站在債權人的角度來看，這麼做似乎有點道理，但仔細想想可以發現，假使今天夫妻其中一方淪為卡債族，銀行可以要求法院對兩人宣告分別財產制，這麼做不是變相懲罰卡債族的另一伴嗎？在現今社會中，婚姻中兩人的財務狀況，似乎不宜受到如此僵化的法條所限制。每次例會，幾乎都會有新的個案因為這個問題來向自救會尋求協助，儘管問題相當類似，自救會還是會讓每個人將自己的問題講一遍，不會因為狀況雷同而打斷發言者。

修法討論結束後，例會大約剩下一小時左右的小組討論時間，讓新進成員能夠藉由小規模的討論增加群體歸屬感。當初這個構想只是有感於自救會的培力效果似乎限於幹部，一般成員往往來來去去，雖然解決自己的問題，但長期下來對修法與相關運動的發展並不好；此外，透過這種形式的討論，可以讓每個人都能夠充分發言，避免話語權集中在少數人。不過分組的構想實行起來也有困難，畢竟多數人來只是要解決個人問題，並不是來與他人建立關係，因此保持小組討論過程的流暢，除了依賴幹部個人的聊天技巧之外別無他法。以至於在實行了幾個月之後，小組討論往往成為大家留下來聊天交流的時間。

認識他人、認識自我

回想自己參與公共社會學的暑期實習的動機，稱不上偉大，甚至可說是有點無賴，只是貪圖時間地點之便，選了一個符合自己需求的單位。暑期實習課程的安排，除了學術與實踐的結合之外，更重要的是讓社會系的學生明白未來畢業之後，自己可能的出路。不能否認，這些課程目標當時都沒在我的考量中，只是抱著「到處看看」的心態向卡債受害人自救會提出申請。因此，我在實習前並沒有在心態上作太多的調整，也不確定自己要的是什麼。除了自己的心態不夠成熟之外，當時正值課業繁重的學期，在學期中同時兼顧課業與實習令我有些頭大。此

外由於自身的學習習慣偏愛較抽象的理論思考，除了過往社會系必修課的田野經驗外，我的實際參與田野的經驗少之又少，遑論進入這種倡議型社團長期蹲點、與他人建立關係。

儘管還沒開始實習就有這麼多的問題待我克服，但多虧老師、律師以及眾多自救會成員的幫助，讓我順利度過實習。實習給了我非常多的啟發，讓我重新看待自己課堂所學的知識與實踐的關係。每次參與例會，一開始的自我介紹總是帶給我強烈的震撼，因為每個卡債族口中所說的，都是他們真切的生命經驗，透過他們的話語，我不只明白他們為何成為卡債族，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間關係的建立。我認為這是社會學實踐的過程中，不可迴避的重要一步，如果沒有這種實際的關係的建立，任何的實踐都是虛假的。

自我介紹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即讓卡債族自我重新認識自己，透過將自己的經驗分享給一群有相似困境的人，當事人獲得的絕不只是取暖而已，而是一種對自身處境的重建。自我的重建對於弱勢者非常重要，一般人成為弱勢者之後，接觸到的訊息往往是個體而非結構的，這是因為社會普遍的輿論往往將弱勢者塑造成一群沒有道德感、缺乏能力的人，久而久之，弱勢者認同了這些論述，進而開始否定自我。為幫助弱勢者破除這些迷思，組織必須透過各種方式幫助弱勢者，讓他們了解自己為什麼會成為弱勢者、還有多少人跟自己一樣。

有時候會有不願意談的卡債族，這時候其他人就會以自己的經驗為例，給予他更多的支持。在我的觀察裡，這些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都是真切的，他們共享著彼此的經歷，而這也是學者、律師、學生所沒辦法給予他們的。在社會學的課堂上，我們常常討論如何分析社會，但卻缺少一種同理他人處境的實作方法，所以我覺得社會學常常有一種毛病，一種將自己的「知識」壓迫他人的毛病。這種壓迫或許不像階級壓迫那麼強烈，但卻是將對象彌平的大軍壓境，往往看不到差異，可以很輕易地告訴卡債族說：「你會陷入卡債，是因為這個結構不公平，是因為資本主義過度的發達，你在這個快速運動的金融機器中被丟棄了」。這些

分析都沒有錯，卡債族用這套論述重新定位自己也沒有錯，但我從觀察卡債族彼此之間的互動發現，他們重新認識自己的方式，不來自於任何由上往下的加諸給他們的「知識」，而是透過雙相的溝通，讓他們與自救會的領導共同尋找答案。

吳宗昇老師如何看待自救會也給我很大啟發，他總是說，我們不是來幫助卡債族的。原先一直不能理解到底是什麼意思，頂多只是提醒自己不要有施捨、救助別人的心，直到後來閱讀《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我才理解老師的意思。《受壓迫者教育學》是保羅·弗雷勒談教育弱勢者的經典。他提到：「無論是探究者或民眾(一般都被視為是探究的對象)都應該是共同探究者」(保羅·弗雷勒 2003：149)。我們與卡債族的關係，應該是共同、互相的，一起努力解決卡債的問題。另一方面，他的提問式教育指出：

所有人們都可以發展出來其對於存在世界之方式進行批判覺察的力量，而他們正式以此力量並且在這個力量中去發現他們自己；他們開始不再將世界當成是一種靜態的現實，而是當成一種不斷進行改變之過程中的現實。(保羅·弗雷勒 2003:04)

我反思實習的過程，我們除了要幫助卡債族解決卡債的問題外，另一方面也是要促使他們覺醒、認清自己的處境。卡債族往往依著以銀行與金融機構為中心各種由上而下的宣傳，將自己的卡債問題歸咎成個人的理財不善，社會中普遍的觀念也是如此，既然如此，自救會需要做的，就不單只是幫助他們解決債務問題，更需要重建他們對自己的認識，不再以銀行所給定的標籤否定自己。

在重建的過程中，其實自救會可以透過更簡單的方式，由律師、學者不停灌輸「你們不是這樣的人！」、「不要這樣看待自己！」就可以了，但如此一來又複製了銀行的作為，卡債族從頭到尾似乎只是一個容器，只能被動地接受大家對他們的看法而已。所以如果自救會自認為與銀行與一般主流媒體有所區別，首先需要被破除的即是一種上對下的關係，在自救會中人們不因為身分而有所區分——所以自然的，老師相當忌諱學生有幫助卡債族的心態。

在實習時我也常常反思自己是否能完全接受眼前的卡債族，不諱言的，答案不總是肯定。進入自救會前，自己對於卡債族的想像完全來自於報章雜誌，自然對於卡債的問題缺乏深刻的理解，然而在實際接觸他們的時候，又往往會因為不同的個案，動搖我對於卡債族的想法。我可以同情因健康、工作因素成為卡債族的人，但除此之外，還是會有一定比例的人是因為消費習慣、過去的投資失敗等。這裡出現一個明顯的斷裂：我個人可以接受那些因為不可抗力的原因成為卡債族的人，但面對那些因為自己可以控制的原因、卻不小心失控的卡債族，我沒辦法說服自己不懷疑他們的個人道德操守，自然也無法完全同情他們。

在不停思考這個問題之後，我嘗試將道德成分抽離這個問題，只專注卡債族現下所面對的問題。改以這個方向切入之後，我漸漸重新認識卡債的問題：卡債帶來的問題，不是單純的欠錢還錢，它伴隨著對卡債族身、心靈的折磨，如果我們還相信人能夠擁有第二次機會，我們就應該試圖幫助他站起來，再給他一次機會，並試著改變原先將人推入谷底的各種制度設計。

檢視自己在自救會的實習，我總覺得自己踏上一條尋找的路，這條路不是單純只是認識卡債問題，更像是認識自己。實習的過程面對各式各樣的人，帶給我相當多的思考，也開始反省自身過去課堂所學的社會學知識是否能切合自己眼前觀察到的社會現實。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一個注重知識培力的團體，並不是由精英領導就必然走向權力集中的情形。這些經驗對我後續參與不同運動發揮影響，同時，我在實習前的各種困難，也在這場尋找自身定位的過程中，得到了解答。

後記

在卡債受害人自救會實習的時間，對我來說，就像把社會學的理论知識，搬移到課堂外實踐，然而當時的心態與現在回想寫出文章的心態已經大不同。猶記得當時對審議民主具有莫大的信心，相信任何問題透過理性、溝通、包容總有辦法解決。然而隨著後來在自救會的實習、參與紹興、華光的反迫遷運動，我開

始思考到底何謂理性、溝通、包容？

本文的寫作是我在反思審議民主過程中，閱讀左派教育學家保羅·弗雷勒得到的一些想法。自救會實習的反省，除了個人與理論實踐的反省，我想更重要的是理論與理論之間的思辯。審議民主雖然強調多元、開放，但在討論過程中要個人放棄自身特殊性，要求具備類似的話語能力，這種討論方式如果帶到自救會，將會是一場災難。卡債族不擅長律師的語言，也沒有教授的知識能力，如果講話還必須具備這些條件，我想這樣的討論將不再是一個討論，而是一個壓迫的場域。

另一方面，組織者與被組織者之間，也帶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組織的精英主義問題要如何處理？我想在任何組織中，最令人詬病的，多半是「決策如何產生？」、「憑什麼是這些人決定？」等問題，自救會雖然沒有這個問題，卻不是因為卡債族受到律師的感召、相信律師的一切決定所行成的團體。雖然這個組織裡有精英，而且菁英與群眾的知識有很大的差距，但律師並不以自己的專業知識為武器把持整個自救會；相反的，律師總是徵求不同卡債族的意見，然後提出自己的想法，同時也會將法律的專有名詞改為口語、淺白的語言。究其而言，組織應該極力避免精英主義，而人的能力本來就有不同，刻意降低或拉高某一種姿態對組織的運作都不利。

本文是一反思性的寫作，包含個人、組織、理論三者的相互關係，為了保留保羅·弗雷勒如何看待受壓迫者的問題，文中強烈的字眼，諸如覺醒、壓迫等將不做更動，一切文責自負。

女宿異性訪客規範公民會議——

在理念與現實考量中求得公因數

簡介：校園內的審議

此次女宿異性訪客公民會議，可能是我國的校園學生自治歷史上，第一次使用審議民主的方式面對校園公共議題。這次會議舉行在 2012 年的 11 月 29 日，以一個晚上的時間討論女生宿舍的異性訪客應該受到哪些規範，再由參與討論的成員相互推舉出代表「整理」當天會議的共識與歧見，並相約 12 月 6 日再同聚一堂，共同確認代表們整理的結果，是否真的符合當天的討論情形。

以下我們會先介紹為什麼要審議，再來說明我們這個小組當時決定辦這場公民會議的經過、舉辦的過程、舉辦後的檢討。最後，提出一些關於審議民主的反省。

女宿異性訪客公民會議緣起

「我們拒絕一切形式不合理的規範、未經舍胞討論後達成共識的規範。門禁沒問題、鞋子不落地沒問題、不能在宿舍做愛沒問題。有問題的是：是誰訂出來的？是要共同生活的舍胞因各自的生活習慣、需求、背景的差異，經討論而決定，還是單方面由校方因管理方便，由上而下單一方向所決定的呢？再說一次，男五生治會，拒絕一切形式不合理、未經舍胞討論達成共識的規範

——節錄於《PTT：NTUDormM5》進板畫面

● 宿舍自治的現況與困境

往常，台大宿舍法規皆是由校方制定，統一實施於各棟宿舍，學生自治的空間極為有限。過去幾年來，一些關心宿舍自治議題的行動者意識到：「若

一棟宿舍的管理辦法，是由學校所訂定、學校說了算，舍胞怎麼能依據彼此的共識來訂定生活規範？」因而發起了一些行動，這些行動的目的是鬆動校方對宿舍強加的不合理規範。此外，他們也希望能夠帶動宿舍舍胞參與公共事務的氛圍。

2009年12月30日，在寒氣逼人的深夜裡，總圖書館的草地前搭起了一座座繽紛顏色的帳篷。他們主張：「以單一性別為劃分，並且設下重重異性壁壘的宿舍，已經無法滿足所有學生的需求。如果學校不為我們設立『性別友善宿舍』，那麼我們便自己打造。」在這棟由帳篷組成的「性別友善宿舍」的交誼廳中，人們熱烈地討論著彼此冀求的宿舍自治規範，共同畫下心目中的美好宿舍生活藍圖。

在2011年，陳柏杙任男五舍生治會長期間，推動修改宿舍管理辦法。他主張：沒有住宿經驗或是住宿經驗極為過時的人們所制定的宿舍法規，顯然無法適用於現今的學生宿舍。正因為每棟宿舍的客觀環境不同，才應該將制訂法規的權利還給個別宿舍，讓各宿舍的舍胞與生治會制定出屬於自己的宿舍規範。

如此一來，規定就不再是由上而下、校方單方面制訂的，而是由每個舍胞共同討論後決議的，這樣的規範始擁有實質意義。陳柏杙認為，當宿舍內部生活規定的可能性從現行法規枷鎖中釋放出來後，每棟宿舍便能夠發展出因地制宜的生活方式，而惟有當學生感受到自身擁有相當的權力和權利時，才会有動力起身關心公眾事務。

但是實際上，法規層面的放寬，並沒有使舍胞參與公共事務的動機變得更強烈。例如一年一度的舍胞大會，出席率多半不過七分之一，且根據往常的觀察，女性參與校園學生自治事務的意願較男性低落。

- 現行之女宿訪客規範

台大宿舍法規中關於訪客的規範，明列於「國立台灣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與「學生宿舍進出及會客辦法」中，此二者對訪客的規範內容，沒有提到

性別，對同性或異性都一視同仁。前者僅規範訪客不得留宿，而後者也沒有規定確切的訪客停留時間，而是將詳細規則的制訂權立交由各棟宿舍。同時，目前的女生宿舍異性訪客辦法，也沒有經過舍胞的集體民主程序（舍胞大會）同意。所以說，現行執行的女性宿舍訪客規定並沒有法源依據，也沒有民主基礎，極可能只是輔導員規定的行政慣例，久而久之變成習以為常、難以撼動的內規。

現實上，「男賓止步」已經成了女舍胞對女生宿舍的不二想像，其實也是廣泛社會大眾的想像。男性訪客要進入女生宿舍，必須受到層層嚴謹的規範：除非是特定理由（例如搬重物、修電腦）、男性訪客在進入宿舍前須於傳達室登記換證、一次最多拜訪兩個小時，且必須於五點之前離開。

議題選擇與籌備

- 要審什麼？

我們其實一開始組內對議題方向沒有一致想法，各自本著不同校園生活經驗與公共事務參與的脈絡，提出各式各樣的審議議題，例如：住在醫學公衛校區的組員比較關心跨校區校車班次爭議，而在學生會服務的組員則對當時學生會正在進行的校園公共空間規劃議題有所關注。最後之所以選定女宿訪客規定與性別友善宿舍相關議題，主要是因為組內有一位夥伴長期耕耘校園性別平等議題，同時也擔任宿舍生自治會的總幹事，長久以來實際處理相關爭議，且他本身也是議題正反論述的搜集者與論述撰寫者。此外，選擇校內宿舍的性別議題辦理審議會，原則上有四個好處：

第一是節省資料蒐集成本。辦理審議活動相當講求正反議題的資料完備，選擇組員長期投入的議題，讓團隊不用從零開始了解極為陌生的領域、不必從頭開始搜集與整理提供公民閱讀的議題資料。在修課學期內有限的時間下，這個主題

讓第一次辦理審議的我們可以更有效率的分配規劃籌備的時間，更精緻於審議會議本身的程序設計與手冊編纂。第二個好處在於，能更有效率地招募公民，以及更熟悉如何與有關當局溝通。辦理團隊內部有在該議題耕耘的行動者，在公民招募時對該議題相關群體有一定的動員能力，宣傳時也有既有人際管道可以運用。在面對主管機關住宿組時，也比較能夠以局內人之姿，遊說住宿組承諾將會議結論作為宿舍規範的參考依據，或者更有立場要求住宿組提供相關資料。第三個好處是，可以延長議題被討論公共討論的效果。即便這次辦理審議的結論不被住宿組等相關單位參考、採納，本有耕耘相關議題的人，也可以將具有公共慎思共識性的結論，轉化成具體的訴求、政見，擴大支持。唯有持續用不同路徑的參與方式努力深耕，才能使這個議題不會在審議活動後隨時間流逝而被淡忘。最後，有鑑於女性在校內自治議題上經常缺席，舉辦與女同學切身相關的議題，應該能增加女性的參與意願。我們期待有更多女性因為自身與議題切身相關而參與審議，並在審議過程中培力效果，並在往後有更多動機參與公共事務。

我們因此聚焦「性別友善宿舍公民會議」這個大議題，並形成三子題，包括：女宿異性訪客、性別友善宿舍、單一性別宿舍中的性少數。性別友善宿舍是指不限定住宿者單一生理性別的宿舍。因為有些人無法單純以「男生」或「女生」來定義，這種「性少數」在申請宿舍時會遇到困擾，所以不限定單一性別的宿舍是尊重性少數的宿舍，這也是性別友善宿舍名稱的來由。

針對三個子題，我們又基於幾個原因，決定只留下「女宿異性訪客」。首先，三個子題差異性太大，不好同場討論，若硬要放在一起討論，時程很難安排。再者，性別友善宿舍違反目前的住宿法規，而違反法規的討論與結論不太可能被校方採納，我們的初衷是希望主管單位支持、期待會議共識，以免傷害審議在校園民主方面的公信、阻礙未來的審議推行。第三個原因是性少數議題過於敏感，審議時公民和專家都需要公開露面，再加上宿舍的人際圈相當狹小，為了保護性少數住宿生不會因為參與審議而身分曝光，進而影響其在宿舍裡的人際關係，

我們決定取消這個子題。

- 誰來審議？

經過審慎評估後，只剩下「女宿異性訪客規範」這個議題。決定議題後，接下來是「誰能參與」的問題。參與者會直接影響會議的結論，還有結論可以被採納的程度。「女宿異性訪客」牽涉到住宿生、訪客等等行動者，所有可能被影響的人都可以參加嗎？如果訪客可以，那所有的台大學生都可以參加嗎？非台大學生的訪客呢？抽樣、宣傳招募、與會公民的代表性等操作上的各種決定，是不是都會產生很大的爭議？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真的符合政治平等（受政策影響者對政策有同等影響力）的精神嗎？

對此，我們認為住宿生不只直接受到異性訪客規範內容的影響，也是真正長時間在宿舍生活的群體，應以之為活動主體，所以這次審議活動的參與者只限「女宿在宿生」。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我們將參與對象聚焦於「住宿生」，住宿生也不應被當成一個同質的群體。在台大，每個宿舍有不同的物理空間配置和治理規範，例如：現況下的女宿與男宿訪客規範有很大的差異，而即使同為女宿生，不同棟女生宿舍也有不同的正式、非正式訪客規範。這些規範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不各宿舍有不同的物理空間。那麼，到底要不要讓所有的女宿在宿生都可以參加會議？這種辦法有什麼優缺點？如果只限定某個舍區²⁰又有什麼優缺點？限定單一棟宿舍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思考辦這場會議的目的是什麼。

假如以「原則性規範」和「實質性規範」兩種性質來定位議題，越是原則性規範的議題，可招募的公民越多、與會公民的背景越多元，但產出的結論會是原則性的，不一定能配合具體的宿舍空間，討論也可能太發散、不易聚焦，可能只是在空泛原則上打轉。具體來說，參加的公民可能因為有不同的住宿經驗、受到不同的既有規範所限制，所以有不同的住宿想像，卻不一定能順利對話；另一種

²⁰ 臺大女一、二、三、五號宿舍有相同的物理空間格局，所以同為一區，女八、九則為另一區。

可能是，某些宿舍沒有人報名參加，那麼會議的結論，就沒有考慮到那些宿舍的空間，讓結論無法普遍適用到各個宿舍，也因此缺乏民主正當性。如果聚焦實質性規範，討論可以非常具體，但可以招募的群體將會減少，不僅很難招到足數的公民，也會讓會議結論太細節、技術性，讓其他宿舍難以參考。

最後，由於我們預期產出的結論是具體、可以被住宿組採納的，所以我們把議題再聚焦、把討論的目標群體範圍再縮小，至少要縮小到討論群體享有共同的宿舍物理空間，這樣才能夠想像規範要怎麼制定、如何落實。但縮小到「以單棟宿舍為界」又會招募不到足數公民，因此「以舍區為界」，是詳細討論和比較上述優缺點後，團隊內形成的共識。舍區選擇上，我們選擇女二舍區，這區有四棟女宿，公民的招募對象也是該舍區的舍胞。之所以選擇這個區塊，一來是因為該區輔導員對公共討論的接受意願比其他舍區的輔導員來得高；二來是，這是我們組內那位生自會總幹事夥伴所屬的舍區，走行政流程和宣傳會比較方便；其三是那四棟宿舍雖有各自的門禁，但共享同一道圍牆圍成的空間，異性訪客經過同一道大門的門禁。第三點在預想異性訪客門禁管制時是很重要的，物理空間與舍區規範一致，才可以有效對話。

- 誰是專家？

議題設定好了之後，我們即著手展開籌備時程設定與議程規劃。一開始我們希望用「公民會議」的形式，即時間最長、最嚴謹，給予最高議題設定自由度的形式來辦理。然而在招募了將近三個禮拜後卻發現，幾乎沒有人有意願來報名參與！可能是要求一位住宿生為了宿舍事務花上共一天半的時間討論，在缺乏誘因時，動機絕對不足。我們錯估宿舍生對議題感興趣的程度，誤以為與切身相關的議題很容易引起共鳴。由於報名狀況不理想，我們後來將討論時程縮小為一個晚上，只辦公民審議會議。因公民會議需要專家到現場為公民短講，主辦團隊旋即尋找正反方意見專家。

我們原本希望可以邀請幾位具有性別友善宿舍推動經驗的老師來擔任正方代表，由住宿組立場較為堅定的舍監或舍區督導擔任反方代表。然而正方代表所邀請的老師都沒有辦法出席，甚至有老師認為審議就是在「吵架」，於是拒絕參與；另一方面，由於住宿組認為這場公民審議會議有可能發展出不符校方期待的結論，同仁出席會議將行同為討論結果「背書」，因此，臨時要求所有主管同仁一律不准參與這場公民審議。

遭遇到了這些來自講者、與講者有關的權力單位的拒絕，再加上我們的時間緊迫，最後逼不得已只能親自仔細地搜集議題相關資訊，讓工作團隊裡的兩位夥伴，分別擔任正、反方意見專家的角色，對公民做「專家」簡報。

活動實況

女宿區異性訪客規範公民會議最後決定於 2012 年 11 月 29 日晚上於台大女五舍活動中心舉行，先由三位專家分別進行事實說明、正方（支持開放）立場、反方（支持保守）立場的介紹，接著是公民對專家的提問時間，休息時間後進入討論規範、凝聚共識的階段。「討論規範」的時段又可分為公民依序發言、交互討論二個部份。詳細流程表如下：

| 11 / 29 (四) 女宿區異性訪客規範公民會議活動流程 | |
|-------------------------------|----------------|
| 填寫前測問卷（與後測對照觀察立場變化） | |
| 專家簡報 | 10/07:00~07:10 |
| 正方立場 | 10/07:10~07:20 |
| 反方立場 | 10/07:20~07:30 |
| 提問 | 10/07:30~07:40 |

| | |
|------|----------------|
| 討論規範 | 60/07:45~08:45 |
| 凝聚共識 | 50/08:45~09:35 |
| 後測 | |

當天共有十四位公民參與這場會議，3 男 11 女，全為台大住宿生。為了討論方便並節省時間，我們依公民的座位分配數字編號，以公民一、公民二、公民三……稱呼與會公民，並在會議開始前宣告，除依序發言時間外，提問、討論時間的發言方式採舉手後獲得主持人同意始可發言。討論過程中由打字較快的籌備人員擔任記錄，將發言的逐字稿立即呈現在投影幕上，方便公民回顧意見交流之情況。在「凝聚共識」階段，則由主持人確認在「討論規範」階段迴響較高的意見，詢問公民有無遺漏掉的意見或細節後，逐項討論全體公民是否均同意該項決議。全體公民一致舉手同意即通過決議，如仍有意見分歧情況，則再花時間討論；若仍無法討論出共識，便會以無共識做結，不會強要公民作出共識，並在結案報告中列出不同意見。當天會議的最後，公民們推舉了兩位公民撰寫結論報告，並約定於 12 月 06 日晚上同一地點進行共識報告確認會議，無法出席的公民以信件詢問有無意見。

辦活動最常碰到的問題之一便是時間掌控，這次的公民會議事前已安排半小時的緩衝，然而會議仍然延誤開始，又因許多關鍵議題的討論難以斷然中止，故結束的時間兩度延長，近十點半才結束會議。其中兩次延長時間均有徵求全體公民的同意，幸得公民們都能夠配合，無人提早離席。此外，籌備時由於多天的活動報名狀況不佳，萬不得已之下，只好將整個會議濃縮至一個晚上，也因此出現了時間不夠用的情形。儘管是為了提升參與意願，卻仍然對審議的品質有所斲傷。

當天的另一個問題是立場不平衡。由於女舍輔導員無法出席會議擔任反方專

家，只能由籌備同學出任，而擔任正方專家的同學本身長期在女宿服務，嫻熟宿舍實務並倡議開放，故形成兩方在論述資源上的不對等。這一點我們在事前便有注意到，但因實在沒有其他可代替人選，故也只好勉強接受此一程序瑕疵。

在發言狀況方面，十四位公民的發言狀況均屬踴躍，儘管仍然出現少數公民較不常發言的情形，但每位公民都有表達自己的立場以及態度，並向他人提問、回答。不過由於多數意見傾向更加開放既有的異性訪客規範，導致部份認為私領域不應開放的公民欲言又止，加上公民們對私領域的界定無法取得共識，於是在私領域規範部份，最終訴諸無共識。

散場後的反省

今天上公民審議，話題圍繞在女性在公共討論的弱勢處境，女性比起男性較少發言、發言時間較短、較容易受忽略、較不會開新話題、然後又容易好心的幫大家統整意見……。

每次談這個像無底黑洞一樣的話題都感到撕心疼痛，以及對「這個性別」的難堪與疏離，上完這堂課後，第一次覺得總算抓住了一點點東西，一點點「好像還是可以期待的」微小亮光。

對比之前強烈質疑公民審議「假理性」的心情，我現在反而覺得它誠實且誠懇的面對這「必然，且無時不刻存在」的不平等，並透過程序的修正，把發言者本身的不平等因素產生的影響降到最低。

想起許多社會運動與知識份子，做為有主見的人，往往更傾向於當知識與信念的灌輸者而非聆聽者。最積極的鬥士，往往也就是強權本身。

深深反省自己對外言必稱尊重，對內(對女性)卻也是強勢甚至輕視的那方，罵了千萬次情緒化、不長進，不如認真聽妳一回。

(組員王若帆寫於 2012 年 12 月 03 日)

- 學會溝通很重要

舉辦女宿異性訪客公民會議，最困擾的是公民報名狀況不踴躍和專家邀請不順利。本會議透過 PTT、臉書和宿舍生治會宣傳約半個月，報名的女宿舍胞卻連最基本的 12 人都不到；即使正好 12 人報名，「有報名就能來」在程序上也可能落人口實。公民報名狀況不好，可能是本組有成員長期推動宿舍性別友善議題，讓一些人認為會議主辦單位已經先行預設立場，故不參加是避免替「開放異性訪客」背書。另一方面，因為我們原先預期與會者多是持開放態度者，為求更多元的立場，故意以危言聳聽的方式宣傳，好「刺激」反對開放者積極與會抗議，但這樣反招致一些舍胞杯葛，甚至收到一封言詞銳利的抗議信。最後，女性在成長過程中，不常被鼓勵參與公共事務，所以本就容易自願或非自願地遠離公共事務，這可能也是公民報名狀況不佳的原因之一。為解決招募困礙，我們大幅減少審議時程，讓數日晚上壓縮成兩晚，以減少與會的時間成本。

我們以「與女性舍胞息息相關的議題」召開審議，本想吸引更多女性參與學生自治，進而讓與會的女性有機會接觸公共事務，卻效果不彰。如果在「大學」舉辦「與大學生切身相關」的議題都沒太多人響應，那麼我們要怎麼在台灣社會「引起關注」並「啟動公民參與的開關」？這個問題，在辦活動的過程，甚至是活動結束後，一直在我們心頭縈繞不去。

邀請專家方面，因受邀的老師繁忙，還有一位不喜衝突的老師誤認本會議是「正反方辯論」而婉拒，最後只得由本組組員擔任支持開放的專家。反對開放方

面，本想邀請較接近此立場的舍區的輔導員，但原本答應協助會議的住宿組、督導和輔導員臨時反悔並表示完全拒絕參加會議，也不願參考本次會議結論的結論，導致反對開放方的專家最後亦由本組組員擔任。專家是讓公民知情的重要管道，深深影響公民討論走向，專家邀約不理想在程序上絕非好事，實際上，也確有公民認為反對開放專家的論述較不穩健（儘管這顯現公民有能力辨別專家提供的資訊是否可靠，卻也暴露審議程序的瑕疵）。住宿組反悔不僅妨礙專家邀請，也阻滯輔導員向舍胞宣傳本會議，於是影響我們的公民招募。從這事件，我們發現審議會如果成功，一定要與有關當局持續且良好溝通，不能因主管機關給過口頭承諾就大意疏懶，如果因為與主管機關的關係生變而影響會議結論落實的可能，甚而有可能會傷害一般人對審議的信心。

- 當理念遇上現實

程序主義的審議希望透過一定的程序，確保審議活動能忠於慎思與溝通的理念，進而補足代議民主較無法顧及的公民充分知情和有效參與之缺陷。另一個附帶效應是迫使政府公開資訊，特別是本來不被揭露的資訊，這不但讓課責更可能落實，也產生充分知情的公民，總結來說，公開討論公共議題，是對代議政治的有力監督。不過，審議的理念和實際層面有可能相互拉扯，在這次實際辦活動的經驗種，我們覺得可以把問題整理為兩方面的限制：首先是理念上的限制，是指審議追求的理念排擠一些同樣重要的目標；此外，還有實際面的限制，是指落實審議理念時遭遇的現實阻礙，特別是有關於社會條件的部分。

實務上，為求活動成功舉辦，時常需要配合現實而有所取捨（譬如減少討論時數、由主辦單位成員充當正/反方專家）。這些現實包括人們對公共參與沒興趣、有關當局反對人民參與、經費不足、缺乏特定立場的專家、不同立場的專家有不同言說能力、某些立場的專家不信任審議而杯葛會議等等。同時更需要注意擁有不同社會條件的人，可能會自願或非自願地放棄溝通——塑造那些社會條件

的力量包括性別不平等（譬如女性不被鼓勵公共參與）、經濟不平等或資訊不平等（譬如有些人缺乏資訊管道）。這些實作層面上的問題，不僅干擾會議報名，也可能干擾會議過程中的溝通。

理念上，審議民主強調知情和慎思，這樣的堅持可能會排除特定群體，特別是女性還有低社經地位的人。審議要求參與者充分知情和深入參與，但人們卻可能因不同的生命經驗而有不同的理解能力和論說能力，即使簡化討論資料（例如：使用日常語言或以影像呈現來替代文字說明）、接納各種言談形式（例如：不強求參與者一定要理性發言或寓理於情），仍有可能排除「自願或非自願地缺乏溝通能力或意願」的人。有些人終究自認無法順利表達和捍衛意見，傾向認為自己的意見不正確，或消極地認為各人有各自的立場、不必多加討論，這種種的排除，可能使得公民審議會無法符合政治平等精神。人不是生而會溝通，溝通能力涉及許多「社會化」的經驗，擁有特定社會條件的人，確實比起沒有條件的人，更可能擁有自信、溝通能力和言說技巧。

另一方面，越深入的討論能容納的討論人數越少，否則將缺乏充分表達自己立場的時間——因此以公民會議為形式的審議設計，可能至多容納二十五人——可是，如此一來可能衍生意見提出與結論形成缺乏統計代表性的問題。儘管統計代表性的問題能以生命經驗的代表性回應²¹，但仍無法保證以同樣方法舉辦數場公民會議，每場的結論都一樣。雖然大規模的民意調查也有類似的問題，但民意調查能以「信心水準」和「信賴區間」來評估誤差狀況；審議民主要怎麼評估會議共識的信度與效度呢？審議的結論既然沒有信度和效度，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到底能不能參考呢？該參考到什麼程度？政府一定要「尊重」審議結論嗎？或許我們該更積極的問：如何讓公民審議產出的共識被尊重和參考？

審議相信「人民不冷漠，只是缺乏參與管道；人民不無知，只是缺乏充分資訊」，也希望透過審議參與而讓與會者更關懷公共事務，但公民會議與會者不過

²¹以二十五人的會議規模為例，只要二十五人的性別、地區、教育程度等人口特質，類似於全國人口結構，會議結論多少能反映全國人的立場。

二十來人時，我們該怎麼促成更廣泛的審議參與？

從校園到社會

審議活動不是真空的，而在具體社會情境中舉辦。我們遇到的困難包括公民冷漠²²（參加者多是本有熱忱的人，甚至會看到同樣幾位公民到處參加不同主題的審議）、不同立場的專家質量不一，不過我們也有特別警惕自己不要為操弄程序而喪失了審議信念、虛應故事，也警覺到審議的理念有可能會排除特定群體的人。

最後，我們還覺得，審議民主不能只侷限在審議會場。如果參與審議的公民在會後沒有繼續散播審議的理念和關懷公共事務，那麼人民對公共事務的普遍冷漠仍不會轉為普遍的熱情，也不會形成持續監督政府和國會的公民社會。要切記，實質民主的促進從來沒有萬用公式或解方，審議民主也絕非解決臺灣民主問題的唯一萬靈丹。不是所有事務都能透過審議民主解決，譬如價值方面嚴重衝突而難成共識的議題，可能難以透過公民審議取得共識，此外，審議活動也難在公民普遍冷漠的環境得到響應。甚至，審議民主有時也可能成為政治菁英穩賺不賠的生意：當推動政策遭社會團體杯葛時，政治菁英遂召開審議會以杜爭議，若結論支持政策立場，則可堵社會團體之口，若不支持，也只是回到起點，繼續與民眾溝通，未必要採行公民審議會會議的結論。

儘管審議確能改善代議民主無法處理的問題，但其理念與實際上的可能缺陷，實務上必須謹慎受到公開評估。這個評量是審議有效與否的關鍵，也是將理念從天上落實到人間時，對理念應有的必要堅持，以免審議不小心淪為浮濫、空泛、惡狼身披的羊皮，最後讓人們草木皆兵、誤會有羊毛的都是惡狼。

²²這次審議動的參加者多是本來就對相關議題有熱忱的同學，甚至有幾位公民到處參加不同主題的校園審議活動。